

目 录

学术研究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冯达才

总校对

黄荣显

•学苑聚焦•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社会科学期刊改革发展研讨会”开幕词

..... 谢自立 (5)

市场取向改革与人文品位追求的结合点探寻

——“社科期刊改革发展研讨会”综述

..... 本刊记者 韦前 (6)

•经济学•管理学•

也谈知识经济学 黄德鸿 黄丹 (10)

近20年知识经济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王华春 (15)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分析 ... 沈志渔 (18)

论“垄断中性”与产业组织合理化

..... 廖伟权 邓伟根 (24)

坚持改革开放, 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 张根生 (28)

•哲学•

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

..... (美) 沃野 (32)

辩证推理模式初探 王经伦 李燕 (38)

•历史学•

近代中国政体模式的转换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

..... 罗嗣炬 王鹏 (42)

1998年第7期 总第164期

试论帝党与维新运动的兴起 王亚芳 (4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革命报刊述论 ... 梁 烈 (53)

•文学•

当代马华小说的主体建构 马相武 (57)
关于文学鉴赏理论建构的思考 吴俊忠 (62)
鲁迅《药》与屠格涅夫及波特莱尔有关作品比较
..... 薛 伟 (66)
论唐代墓志撰作特色及其研究价值 罗维明 (68)
魏晋南北朝词语札记 王小莘 (71)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及早期特征 章权才 (74)
精神凝聚力论纲 刘学谦 (79)
中华学：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论思维掌握 ... 肖君和 (83)

•书评•

《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简评
..... 裘汉康 (87)
评彭立勋《美学的现代思考》 程文超 (89)

•学术动态•

广州市举办社会科学成果展 史宣理 (9)
穗深学者在深座谈增创广东学术研究新优势 (14)
广州、深圳学者座谈《文化深圳》 (23)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83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Opening Speech of the Symposium on“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Xie Zili(5)
A Symposium on“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Held in Zhaoqing, Guangdong	(6)
Another Opinion on Knowledge Economics	Huang Dehong and Huangdan(10)
Influence of Knowledge Economics on Economic Structure in Last 20 Years	Wang Huachun(15)
An Analysis on the Market Structure of Natural Monopoly Enterprises	Shen Zhiyu(18)
On ‘Neutrality of Monopoly’ and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Liao Weiquan and Deng Weigen(24)
Insisting on the Reform and Open to Develop a Synthetic Productive Force of Agriculture	Zhang Gensheng(28)
About the Change of Positivism and Its Methodology	Wo Ye(32)
An Approach to the Pattern of Dialectic Reasoning	Wang Jinglun and Li Yan(38)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Model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Modernizational Process in China	Luo Siju and Wang Peng(42)
About the Emperor’s Par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Arising of the Constituent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1898)in China	Wang Yafang(48)
About the Revolutionary News Papers and Magazines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 Democratic Revolution	Liang Lie(53)
Current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Its Subjective Configuration	Ma Xiangwu(57)
A Meditation ove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Appreciation	Wu Junzhong(62)
A Comparison between Three Stories Respectively by Lu Xun(1881 – 1936), И. С. Тургенев (1818 – 1883)and C. Baudelaire(1821 – 1867)	Xie Wei(66)
The Style of the Inscriptio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Its Value for Research	Luo Weiming(68)
A New Explanation of Some Chinese Words Used during 220 – 581DC	Wang Xiaoxin(71)
On the Generation and Earl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tional Cohesion	Zhang Quancai(74)
An Outline of Spiritual Cohesion	Liu Xueqian(79)
A Study of China: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a Self – sufficient System	Xiao Junhe(83)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 Collection of the Papers(1984 – 1996)on Mr. Qiu Fengjia’	Qiu Hankang(87)
A Comment on Mr. Peng Lixun’S ‘Modernizational Thinking of Aesthetics’	Cheng Wenchao(89)
Scholars from Guangzhou and Shenzhen Discussed How to Develop New Academic Advantage in Guangdong	(14)
Guangzhou and Shenzhen Scholars’ Talk about a New Book ‘The Culture in Shenzhen’	(23)
An Exhibition of the Findings of Social Sciences Held in Guangzhou	Shi Xuanli(9)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社会科学期刊改革发展研讨会”开幕词

□谢自立

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和《学术研究》杂志社都已经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在以往的漫长岁月里,我们靠着有关领导部门的关怀和扶持,靠着广大作者读者的爱护和帮助,再加上自己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和奉献,各自都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从一开始就把收集、整理、加工、存贮和提供中文社科报刊资料作为己任,如今已真正成为我国国内一个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文献信息中心,被誉为中国“社科信息第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学术研究》杂志作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的一本代表刊物,始终执着地耕耘着岭南地区这块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园地,发表了数以万计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对推动当地乃至全国的学科建设,对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对加强全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培育一批又一批的学术新人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如今已成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的名牌学刊之一。

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孕育和发展过程中的严峻挑战。如何使学术理论期刊和学术理论信息资料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既充分保留它的学术文化属性,又增加它的商品性,使它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继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近年来一直困扰社科期刊界的一个极其恼人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和论证。学术理论期刊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不牺牲自身学术文化品位的同时附加出商品性来?如果有,该怎样具体操作;如果没有,那国家、社会以及杂志社本

身又该怎么办?

党中央一再强调出版界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着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学术理论期刊怎样来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这样一个重要的精神?怎么做才能使我们的刊物少一点平庸,多一点特色,既处处不乏新意,又时时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时代的逐步来临,也在迫使我们加快观念的转变和手段的改造。以计算机、通讯技术和贮存手段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席卷全球,而且发展速度空前。这场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存方式。资料的贮存已从纸本载体转为缩微胶片载体再转为软盘光盘载体,一而再再而三地缩小存放空间;检索手段已从人工翻阅书本、卡片或纸本索引发展到计算机击键查询和自动显示;随着网络技术和数据库的发展,可以通过信息国道和国际互联网接通,快速查到世界各地各类信息,时空障碍已不复存在。这就要求刊物的载体不能再维持传统的单一的印刷型纸本,产品和编辑手段的现代化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又该如何动作?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我们今后能不能继续前进的问题。解决得好,我们就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趋于更加成熟;解决不了或者解决得不好,我们就有可能在人到中年之后,因为缺少朝气和活力而被淘汰出局。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忧患意识,自己给自己增加压力。我们想,这些问题恐怕也是许多兄弟杂志社和友好图书馆共同关心的问题,有的可能已经有了比

市场取向改革与人文品位追求的结合点探寻

——“社科期刊改革发展研讨会”综述

□本刊记者 韦 前

社会科学期刊作为传播社会科学类理论研究成果的载体,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中有着其它刊物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轨变型程度加深,这块“清高的净土”又面临着种种困难与问题。新老问题的交织正困扰着社会科学期刊的发展,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与挑战,在务实、创新的工作中求生存、图发展,如何走出一条既保持社科期刊的人文品位追求,又与市场取向改革相融合的新路子,成为全国各省社会科学类期刊主编、编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广东《学术研究》杂志社共同发起“社科期刊改革发展研讨会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广东《学术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纪念会”,会议于今年6月30日至7月1日在风光怡人的广东肇庆市召开。中宣部出版局报刊处领导高江波到会祝贺,并就当前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问题作了指示。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部长梁国标出席会议,对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会议由省社科联副主席、《学术研究》杂志社社长梁渭雄主持,中国人

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总编辑谢自立致开幕词,《学术研究》主编刘斯翰作了主题发言,《江海学刊》主编吴功正、《求索》主编李华盛、《中州学刊》副社长袁凯声、《南京社会科学》主编周直也分别在会上发言。全国36家社会科学类理论刊物,共50多位代表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会议。现把会议集中讨论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一、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在建设与社会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方面,在促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它们毕竟大多产生于旧的计划经济“母体”或改革开放初期,毕竟生存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样一个转轨变型的时期,各种矛盾混杂、交错、冲突在所难免。会议上,与会者正对现实,列举了种种的矛盾与困惑,如,学术品位追求的“曲高和寡”现象与商业

较好的解决办法。我们把大家请来,就是想通过研讨请诸位给我们献计献策,共图良谋。

我们《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所以能经久不衰,所以能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色,所以能具有全面、集中、系统、连续四大特点,都是跟你们的支持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你们的期刊和出版物通过《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的全文选印和题录索引,扩大了自身的影响面,让更多的国内外读者在更广阔的地域上得到阅读和引用,让你们的组稿工作和编辑工作收到了更大更好的社会效

果;同时,通过我们的整理和加工,你们的期刊和出版物,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学术交流,并在全国社科学术信息资料的大集合和大排队中占据了应有的一席之地,增加了自身的知名度。这样,我们也支持了你们。可见,我们双方的支持和帮助是双向的、交互的,真可谓相濡以沫、荣辱与共。我衷心希望我们这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合作关系今后能够更持久、更密切,在发展和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事业中,作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 此文发表时略作删节

逐利氛围的冲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不和谐音;新的生存机制与旧的办刊思路、旧的工作程序交错;编辑队伍的人文操守与市场诱惑;财政补贴经费不足与出版成本迅速加大;新的知识经济条件下对编辑接受不断再教育的要求与经济条件不足,还有其它体制上的问题等等。也有代表发出并非故作的“危言”:一个现实已明摆在我们的面前,它要求我们必须作出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科学理论期刊是生存,是优胜,还是劣汰?

一些与会者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当今社会科学理论期刊发展中的问题。他们指出,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向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提出市场取向改革与发展的要求,而这种要求给理论期刊发展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有读者需求结构的变化,也有供给结构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冲击莫过于读者需求减少,外加报纸的期刊化发展。而当与会者将出版同现代科技发展联系起来作综合考察时,更感到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出版由纸本载体向电子载体转变带来的一系列新情况与新问题。读者对象的需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不但是读者群体会发生总量上的和结构上的变化,而且读者需求也会随着新的形势发展而发生结构性变化。

二、探索社科期刊的市场取向改革与人文品位追求的结合点

检验一个期刊生存价值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否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及其与这种市场目标相适应的发展战略思路。这要求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首先要明确的目标与市场定位。一些代表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他们说,定位问题至关重要,定位定得好,也就等于为自己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前景。一个刊物只有明确了自己的市场定位,有了明确的读者对象,才能在全国期刊林立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知己知彼,合理地掌握读者的需求动态,在同行竞

争中办出自己的特色,使自己刊物的个性与风格得到发扬光大。针对学术期刊容易忽视其市场定位这一现象,一些代表强调,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必须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办刊思路,树立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新的学术期刊经营理念,从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形成自己刊物的特色。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副主任肖小波向与会者报告了《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如何从读者的需要出发,树立正确的市场经营理念,通过订户需要的市场分布的调查分析,制定目标市场策略,调整选题结构,改进信息服务方式。报告获得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

社科期刊的市场取向改革势在必行,但“万改不离其宗”,在全国期刊林立的市场环境下,特色与质量始终是学术期刊的个性与生命,这是参会者比较一致的看法,也是办刊同仁思考较多的一个问题。会议上,《学术研究》主编刘斯翰在回顾该刊办刊40年的经验时,就着重谈到该刊如何“从高层次切入现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学科理论与当前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关注地方优长学科与学界新理论、新学科的学术前沿,从而办出学术高品位的特色。《福建论坛》主编林其屏、《南京社会科学》主编周直也交流了他们各自的办刊特色,主要体现在解决期刊的综合性与学科专业性的矛盾方面,按经济社会版与文史版分科出刊或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分期交替出刊,以连续专栏突出本地优长学科,侧重改革发展实践的理论研究,兼顾学科理论与本地工作的研究,而以全国性问题研究为主。《中州学刊》副社长袁凯声提出办好刊物要处理好三个矛盾:办刊条件差与办好刊物的矛盾,文章中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矛盾,经济困境与稳定编辑队伍的矛盾。《广西社会科学》的梁培林认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改变目前一些期刊质量下降状况的第一步,其次要认识到基础理论的曲高和寡与应用理论的和众作用,同时要根据办刊机构和办刊目的抓准办刊的定位,以便突出特色。

学术期刊要走出传统的象牙之塔,面向市场,走向社会,需要打破旧的办刊模式,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创新环境。这有一个改革大环境问题,但并非期刊本身无所作为。也就是说期刊本身也要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主动促进改革。一方面在内容上要主动地介入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给予解疑释难;另一方面,要大胆走出旧的自我封闭的圈子,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开放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求索》主编李华盛认为,社科期刊经费困难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找出路,要注重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拓宽发稿范围,开拓出更广阔的发展前途。与会者呼吁,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必须加强互相交流,既保持自己的刊物风格,又互促互进,共同提高;一次文献刊物与二次文献刊物之间,要有更多的沟通;要敢于打破学科界限,敢于打破门户之见,条件成熟的甚至可以成立跨省区的期刊业集团。

保持学术开放的态度,走出封闭的办刊模式,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在来自高等院校学报主编、编辑中反映最为强烈。他们指出,各高等院校的学报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为高校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服务,不同主要是侧重点上的不同。《政法学刊》的任克勤、韩静谈到,由于我国公安高等教育从80年代才开始起步,因此,公安高校学报在为公安教学服务的宗旨指导下,目前主要处在培养科研队伍、解决职称评定需要的阶段。而《河南大学学报》的刘献则谈到,作为已创刊60余年的《河南大学学报》考虑更多的是,在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观念形成巨大冲击的形势下,在解决本校师生科研需要的同时,如何保证和不断提高学报自身的学术水平是当前需要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认为办学报应保持学术开放的态度,建立横向比较的机制。广东《暨南大学学报》的翟云玉也根据自己的办刊经验谈到,满足本校评职需要应服从于学报坚持学报较高学术水平的要求。

三、开拓企业协办学术期刊的新思路

市场经济大潮下学术期刊的经济生存问题,是本次研讨会中反应最为强烈的一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全额拨款办刊,经费由主办单位包揽的做法已成昨日黄花。现实中,许多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不等不靠,主动走向市场,开拓出“企业协办学术期刊”的新路子,如《江淮论坛》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合肥美菱集团协办,《天津社会科学》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市民力公司和天津电话设备厂协办,《东岳论丛》由山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山东水泥厂协办,《领导科学》由河南省社科联主办、洛阳春都集团协办,《奋斗》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主办、三江集团协办等。所谓企业协办,即刊企“联姻”,在主办单位每年拨给刊社一部分办刊经费的基础上,尚缺部分由企业资助解决。会议上,《学术交流》主编赵清爽对这种刊企联合的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从目前一些学术期刊发行量普遍较低而又有走出经济困境的迫切需要出发,重点谈了对学术期刊如何吸收企业协办的思考,认为在刊物创办经济实体、招聘业务员承揽广告、举办大型文化竞赛活动等“以副养刊”和寻找企业协办、聘请理事单位的“以刊养刊”,以解决学术刊物经济问题的几种途径中,由企业协办的方式较为可行,企业可因此提高在文化界的知名度,也可得到社会的智力支持,并可为社会精神文明作出贡献。一些代表还就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工作应该得到社会分配还是应该直接参与社会分配的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实际上目前学术期刊的经济来源各杂志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财政补贴;一是争取有关部门的专项支持;一是自筹资金或创办经济实体;一是订户。

四、编辑队伍建设与编辑管理制度问题

面对市场经济的诱惑,编辑队伍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一些经十多年培养出来的

年轻有为的优秀的编辑骨干,跳槽另谋发展,流失甚大。与会者对这种现象深表忧虑,他们认为,优秀编辑是期刊的重要财富,培养一名好编辑不容易,要稳住他们,使他们坚守“净土”更不容易。流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收入不高,不甘当“苦行僧”。要保住编辑人才,就要设法解决其后顾之忧。《江海学刊》主编吴功正指出,对编辑的激励,应注重解决职称的总是尽最大可能提供方便,让有条件的人继续深造。与会者呼吁,上级有关部门要充分重视这一问题,在经济上保证刊物可持续发展计划得到有效实施,让编辑们得到不断接受再教育、新教育的机会。

目前学术期刊不会有社会上那么严重的所谓“腐败”问题,大多还是在如何图生存中艰难维持,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关系稿”时有发生,如何杜绝这种情况,或者减少这类现象,也是本次研讨会讨论较为热烈的问题。

题。一些代表谈到了学术期刊内部的编辑管理制度和 workflow 等问题,如“三审”、“三校”制的贯彻,主编意图与编辑主动性的发挥等等。

通过两天的交流与研讨,与会代表已普遍认识到,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不可回避地要面临我国当代重大的实际问题,需要兼顾应用性与基础性的研究,兼顾地方性和全国性问题的研究,要处理好学术文化承传与面向现实的关系。为此,学术理论期刊,一要把握好理论、政治方向,在保证学术思想自由气息的同时,把握好根本的理论方向;二要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我国社会科学的根本出路),发挥好三个作用: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人们的认识解疑释惑,以指导实际工作,通过组织和倡导,推动科研工作的发展;三要不断提高质量水平,打破学报自我封闭的局面,深化内部改革;四要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提高编辑人员素质,这对保证后劲有战略意义。

•学术动态•

让社会了解社会科学 让社会科学走向社会 广州市举办社会科学成果展

为了宣传和展示社会科学理论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宣传和展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州市社会科学的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举办“广州市社会科学成果展”。成果展内容丰富,包括:序幕;第一部分:研究战略,规划远景;第二部分:面向实践,服务经济;第三部分:以人为本,促进文明;第四部分:研究理论,繁荣学术;第五部分:壮大队伍,培养人才;第六部分:迎新世纪,再创辉煌。

7月4日上午,在广州购书中心正门举行成果展开幕式。省市领导和社科界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并参观了成果展。当天上午,参加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第九次会议的代表,广州地区社科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党校和群众性学术团体的代表共1000多人参观了展览。

(史宣理)

也谈知识经济学

□黄德鸿 黄丹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OECD, 1996),报告认为,OECD国家的经济已经变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或通常简称的“知识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OECD报告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1997年下半年以后连续发表了李京文(1997)、李择优(1997)、张守一(1998)等专门研究知识经济的文章,对知识经济的概念、知识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知识经济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知识经济下的政府政策等作了有益的阐述。但是,我们感到,上述研究没有深入探讨知识经济学与早在60年代已经提出的信息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部分研究还过分夸大了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知识经济研究的不适用性。现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知识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让我们谈谈知识与信息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要区分知识与信息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难的事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信息通常都有固定习成的看法。例如,大部分人都会认同,“日本神户由于地壳构造的原因容易发生地震”是一条知识,而“日本神户1997年发生了大地震”是一条信息。但是,给知识或信息下一个统一的、简单而精确的定义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例如,人们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中对信息就有着多种不同的定义。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把信息定义为“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波拉特则把信息定义为“经组织化而加以传递的数据”。(波拉特,1987,第3页)哲学家对信息也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国外学者维纳把信息看成“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维纳,1978,第4页)而国内有学者把信息定义为“事物的存在方式或运动状态,以及这种方式或状态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述”。(钟义信,1979)这些定义显然是不一致的。在我们看来,信息只是知识的一部分,对信息的研究应包含在对知识的研究范畴之中。但是,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当中,“一般把经过加工的信息叫做知识”,因此,知识是信息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打算把知识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组合在一起形成一门新的学科,那么,两门学科都可以按照自己对知识与信息的理解研究下去。如果我们打算把两门学科组合在一起,那么,定义知识与信息那一个概念范围更大才有现实意义。但是,这只是一个纯定义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之分。

我们倾向于同意OECD报告对知识与信息之间的包含关系的定义。因为,划分概念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对不同的概念进行经济分析。OECD报告把知识分为“编码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目的,是强调知识获取途径的不同。“编码知识”可以通过读书、听报告、查询数据库获取,而“经验知识”只能通过参加社会活动或在生产实践中获取,因

此,“编码知识”与“经验知识”在生产、传播、转移与扩散等各个方面就具有不同的特征。划分这两个概念有利于对两种知识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分析。而把知识定义为经过分类、加工的信息就信息经济学目前的研究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因此,放弃后一种定义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似乎无伤大雅。

其次让我们谈谈知识与信息经济两个概念的异同。

知识与信息经济可以说是人们对同一种社会经济变化趋势的不同总结。还有人把目前的经济叫做“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或“网络经济”,但是,叫法的不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有所不同。知识经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要注重知识、注重学习、注重科研、注重创新,而信息经济给人的第一印象则是要注重信息的收集、信息的整理、信息的应用以及信息产业、信息技术的发展。叫法的不同表明当事人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源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知识经济把这种动力源看成是知识的生产(R&D)、知识的传播(教育)与知识的扩散(新知识、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而信息经济则理解为信息产业的超前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我们认为,把当今的经济称为知识经济更能全面地反映它的特征。因为,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虽然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甚至可以说是目前阶段的主要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生物工程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超导体产业、太阳能产业、空间产业与海洋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样为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强大动力。如果光提信息经济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唯一源泉。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把当今的经济称为信息经济也是抓住了目前经济增长的热点,而且对信息产业的超前发展更具有鼓动性和号召力。因此,在一定的场合中强调信息经济也未尝不可。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节的主题,探讨知识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

人们从60年代就开始了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例如,美国经济学家 Machlap 于1962年出版了《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 Porat 于1977年出版了九卷本巨著《信息经济:定义和测度》,均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并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知识经济学则是在 OECD 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概念,更确切地说,OECD 报告中也没有明确提出“知识经济学”的概念,只是提出了一组在知识经济中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认识知识经济对经济学研究、知识学习以及就业的影响,如何对知识进行分类,如何认识知识网络的重要性,如何才能建立一个高效的“科学系统”,以促进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知识的教育和传播以及知识的转移和扩散,如何量度知识生产的投入和产出、知识的存量和流量、知识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及一个国家扩散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对比一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信息部门与信息职业的认识、分类和测定,研究信息部门在国民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发展趋势,研究信息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研究信息部门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相对而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更多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产业——信息产业。因此,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就像对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业经济的研究一样,虽然永远不会过时,但随着经济增长热点的转移,人们对它的兴趣会有所降低。而知识经济学的研究更多是针对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知识,这种生产要素可能在更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关键的影响,因此,对知识的研究就像对劳动力、资本的研究一样有着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我们倾向于既研究知识经济学,也研究信息经济学,研究知识经济学的目的是更深入地认识和驾驭知识这种生产要素,使它更好地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研究信息经济学的目的则是抓住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以充分利用历史赋予的机会。

二、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知识经济学研究的适用性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知识与其他的生产要素具有某些完全不同的特征。例如,知识具有可共享性,允许他人使用知识并不影响自己对知识的使用,这是其他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具备的特征。知识的这些特征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影响有多大呢?

OECD 的报告中指出了如下几种影响:(1)要重构“生产函数”,使知识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直接反映在生产函数当中;(2)要建立新的增长理论,因为知识经济使经济的持续增长成为可能;(3)知识不具有稀缺性,因此,可能需要对经济学的稀缺性原理进行修正;(4)不容易把知识转化为一般的商品,因此,应研究知识产品在交易过程中的特性。张守一(1998)则指出了经济理论将发生如下变化:(1)由于知识是唯一的,其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个人的劳动消耗,而不是取决于社会平均劳动消耗,因此,社会平均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将会失效;(2)同样,由于知识的唯一性,无论需求有多大,供给都只有一个,这样,供给与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会失去意义;(3)生产者利润最大化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理不再成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4)知识增加的结果不是收益递减,而是收益递增,因此经济学中的收益递减原理不再成立。

我们着重分析把知识显性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学原理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虽然知识有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的特性,但是,经济学的大部分原理对知识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仍然适用。

首先让我们看看稀缺性原理对知识是否适用。从分析稀缺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为“公共物品”的知识,这类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无偿获取;这类知识典型的例子有数、理、化知识等。第二类是作为“私人物品”的知识,获取或使用这类知识首先要得到知识所有者的允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支付一定的

费用;第二类知识的典型例子有专利、技术诀窍等。很显然,对使用者而言,第二类知识具有稀缺性。即使是第一类知识,虽然使用者可无偿得到,但是,由于以下的因素,使知识使用者在真正地使用知识之前必须付出一定的成本:(1)使用者必须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找对待解决的问题最为适用的知识;(2)使用者必须花费时间学习和掌握所需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用的知识对使用者而言还是需要代价的,因此也是稀缺的。由此可见,稀缺性原理对知识而言仍然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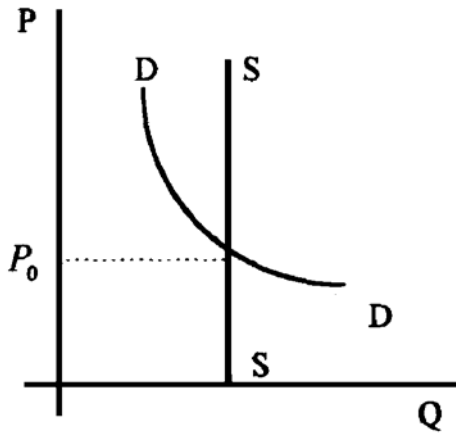
其次让我们看看知识的价值是否由社会平均成本决定。的确,对个别的研究者而言,发明创造的获得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任何一个组织过大型 R&D 项目的人都知道,每个项目的研究周期虽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随机变量,但就其均值而言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一般来讲,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则研究周期越短。用公式表示就是:

$$T = f(M, K) + \varepsilon$$

上式中, T 代表项目研究的周期, M 代表项目投入的人力(研究者数目), K 代表项目投入的资金, ε 则是一个均值为零的随机变量。由于 $E(T) = f(M, K)$, 因此,就平均意义来讲,每个 R&D 项目还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期望成本,这个成本就构成了由该项目而“生产”的知识的价值,因此,知识的价值不取决于知识生产的社会平均成本的提法是不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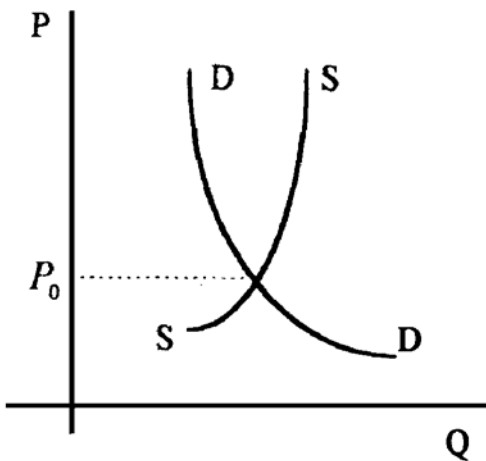
我们接下来考察知识的价格是否由知识的供应与需求所决定。这里也要区分作为“公共物品”的知识与作为“私人物品”的知识,作为“公共物品”的知识本身是没有价格的,因此我们只需考虑作为“私人物品”的知识的 price 问题。就个别知识而言(如某个固定的专利或技术诀窍),供应是唯一的,因此,它的供应曲线将是一条垂直的直线。但人们是否购买该知识仍然取决于该知识的价格与该知识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因此,对该知识的需求曲线仍然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该知识最后成交的价格显然就

是供应与需求曲线的交点 P_0 (见图一)。



(图一)

现实生活中还有另一种情况是,解决同一问题有很多替代知识,知识的价格越高,则替代知识越多(因更多人投入对该问题的研究),这时,连知识的供应曲线都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见图二),知识的价格就更像普通的商品一样由两条相交的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所决定。



(图二)

让我们继续考察生产者利润最大化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理是否仍然适用。我们主要考察该原理对“私人物品”的知识是否适用。生产者为什么要生产该知识呢?

显然,他是认为该知识的生产会给他带来最大的收益期望值。这里需要强调的还是期望值。生产者当然知道,由于每个项目的研究周期与投入都是随机变量,因此收益是不确定的。但就平均而言,收益的期望值还是可以估算的。只要收益的期望值大于投入(包括投入的机会收益),他就愿意进行知识的生产。因此,知识的生产归根结底还是受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所驱动。对消费者而言,他当然也知道要消化所购买的知识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知道所购买知识的效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借助一定的经验和调查,他还是能估算购买知识所带来的期望效用的。只要购买所带来的期望效用大于购买与消化知识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之和,他就愿意购买该知识。因此,知识消费者最后的决策还是根据效用最大化原理。

最后让我们考察增加知识投入的结果是收益递减还是收益递增。对每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每一个具体的产业而言,知识的投入都是有一定适度范围的。例如,美国高技术产业1990年R&D的密度(R&D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是12.3%、中等技术产业的密度是3.0%、低技术产业的密度为0.5%(OECD, 1996, P33)。为什么高技术产业的R&D密度是12.3%而不是20%或5%?这就是知识投入的适度问题。知识投入是需要成本的(本例中的成本就反映为R&D费用)。如果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过多,它的边际收益就抵不上成本,这种投入就是低效率的。由此可见,就具体的投资项目或具体的产业来说,知识的投入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一样,在超出一定的适度范围之后也会出现收益递减。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进步(知识投入)可以抵消资本密度增加所带来的收益递减,仅对长期趋势而言才成立。它与某个时间断面上知识投入的收益递减并不矛盾。

当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知识生产、分配与使用的适用性并不会影响我们对知识经济学研究的热情,相反,它增强了我们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理论去研究知识

经济学的信心。我们坚信,只要把握住知识经济的本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知识经济研究的所提出的要求,我们完全可以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理论去研究知识经济学并得到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波拉特,1987:信息经济论,李必详等人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李择优,1997:关于“知识经济学”的一些思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9。

李京文,1997:关于知识经济的几个问题,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7。

罗肇鸿,1998:高科技与产业结构升级,上海远

东出版社,1998。

维纳,1978:维纳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张守一,1998:知识经济学初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1。

钟义信,1979:信息科学,自然辩证法杂志,1979.3。

OECD,1996: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OCDE/GD(96)102。

作者黄德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510632);黄丹,暨南大学工业经济专业博士生(510632)

责任编辑:谭湛明

•学术动态•

穗深学者在深座谈 增创广东学术研究新优势

由广东《学术研究》杂志社、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穗深专家座谈会,6月4日在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举行。

此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加强穗深两地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广东学术研究工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次省党代会提出广州、深圳要进一步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发挥辐射作用,这就更加明确了穗深的发展定位及其在广东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穗深之间加强学术交流与互动,对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推动广东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谈到深圳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时,广州专家认为,深圳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实绩和经验,受到了省委的肯定。穗深学术界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共同探寻“知识经济”这一新兴领域,推动“科教兴省”和“科教兴市”战略的实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直受到全省和全国的关注,特别是深圳已经形成了生气勃勃的观念优势。广东省的学术界应该深入研究和积极阐发“深圳观念”,让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深圳,让“深圳观念”更好地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学术研究》杂志为此拟出版“特区专号”,集中阐发“深圳观念”,传达深圳的学术声音,以进一步增创观念新优势和学术新优势。深圳学者对“特区专号”的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即“世纪之交的特区考察”、“来自特区的学术思考”,既有特区学人看特区的思考,也有特区学人看中国看世界的视野。

针对深圳在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会专家认为,尽管深圳的学理性思维在全国没有一席之地,但操作性思维还是有全国影响的。这与深圳的城市定位有关,深圳是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学术研究与经济运作存在直接关系,因此更强调操作性的智慧。而从这方面讲,深圳正在形成独立的学术个性,并扩大着在全国的学术影响;有的同志认为,强调对策性、应用性研究,这正是深圳学术研究的特色,也体现南方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需要进一步发扬以增创学术优势,而不是仅仅摹仿北京、上海等地研究风格,摹仿别人只能落后于别人。有的同志认为,深圳学术研究形成特色是好的,但也要在特色上提高,不能只停留在经验现象层次上,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升华。

座谈会上,两地学者还就如何加强穗深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出了一些积极的设想。

(本文原载《深圳特区报》1998年6月16日第11版,尹昌龙撰稿)

近 20 年知识经济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王华春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 (Knowledge economy)”是基于深刻认识知识、信息、技术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而出现的。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在经济生活中，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投入可以替代物质投入，从而达到节约物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

目前，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高消耗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相对衰落，它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全新景象，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思维。

—

近 20 年来，以科技大面积长入企业经济为先导的知识经济对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尤为广泛和深远。

(一)知识经济使产业结构发生新变化。二战后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科技革命使产业结构形成了以下趋势，即第一次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第二次产业结构的比重在有的国家稍有上升，有的国家略有下降；第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显著提高。但是，目前知识经济正在使产业结构发生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含有大量知识、技术的高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据保守估计，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 30%，其中知识、信息产业所占比重约为 15%。可见，知识、技术产业产值已经超过该国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一跃成为比重最大的产业部门。有资料表明，1996 年全球知识、信息产品(如芯片、软件、电脑等)的贸易额已愈 7000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额的 10% 以上。

(二)知识经济导致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主要趋势是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迅速增

长，而传统的工业相对萎缩，并且制成品中增加了“新、软”成分。

70、80 年代以来，知识、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年均增长快于一般工业部门。如 1980—1990 年整个世界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中，专门及科学产品为 3.8%，鞋类为 -1.8%，纺织品为 0%。这充分说明，劳动力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劳动者体力，不是依靠劳动经验和技能，而是依赖劳动者的知识、智力和脑力。

以下是 1970—1994 年部分发达国家知识、技术产业在制造业出口和所增附加值的比例变化。(单位：%)

年份 份额 国别	出口		增加值	
	1970 年	1993 年	1970 年	1994 年
美国	25.9	37.3	18.2	24.2
加拿大	9.0	13.4	10.2	12.6
澳大利亚	2.8	10.3	8.9	12.2
日本	20.2	36.7	16.4	22.2
丹麦	11.9	18.1	9.3	13.4
法国	14.0	24.2	12.8	18.7
芬兰	3.2	16.4	5.9	14.3
意大利	12.7	15.3	13.3	12.9
荷兰	16.0	22.9	15.1	16.8
挪威	4.7	10.7	6.6	9.4
瑞典	12.0	21.9	12.8	17.7
英国	17.1	32.6	16.4	22.2
联邦德国	15.8	21.4	15.3	20.1
西班牙	6.1	14.3	…	13.7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观察家》第 200 期，1996 年 6、7 月。

从上表可见，1993 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工业产品 30% 以上的国家有美国、日本、英国等。1994 年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 20% 以上的国家有美国、日本等。所以，高技术产业制造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上

升且其产品中已经加入了“新、软”成分。

(三)伴随知识经济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就业结构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总的趋势是“蓝领工人”在工人总数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白领工人”的比例不断上升。当前就业结构的新变化是“知识工人”增加,非知识工人减少。近年来,美国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就业者中,知识工人占90%左右,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成为最庞大的职工群。这些知识工人的工作涉及了生产、投资、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使用的工具多是计算机或有关知识、信息的设备。这支队伍有着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养,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开拓能力。

(四)为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高文化劳动者和各类专业人才的需求,教育、培训的改革和强化正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企业和社会关注的问题。据统计资料表明,在1970—1995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个国家制造业中,就业率的年均增长率变化情况是:总计下降0.3%,其中非熟练工人下降0.7%,而熟练工人上升0.1%。按工资水平计算,高、中、低工资部分增减变化为0.2%、-0.2%、-0.7%。容易看出,这两类工人的工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雇主偏好以较高的工资雇用知识水平更高的工人,相应地受过较高教育、掌握较高技能的工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下表是美、日、德三国劳动力中受教育水平的变化情况(单位:%)。

美国		1970年	1991年
高		15.7	28.2
低		37.5	14.5
日本		1971年	1992年
高		16.8	36
低		48.6	22
德国		1978年	1987年
高		9.6	12.8
低		20.5	15.6

高:指受过四年以上高等教育者

低:指仅上过不足四年的中学者

转引自《经济工作通讯》1998年第1期第36

页。

由上表可见,美、日、德三国劳动力中,受过四年以上高等教育者比例日益上升。

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5年发表的报告,该组织成员国17岁青年的高中、大学入学率平均为74.6%,其中大学入学率高达42.4%,个别国家达56%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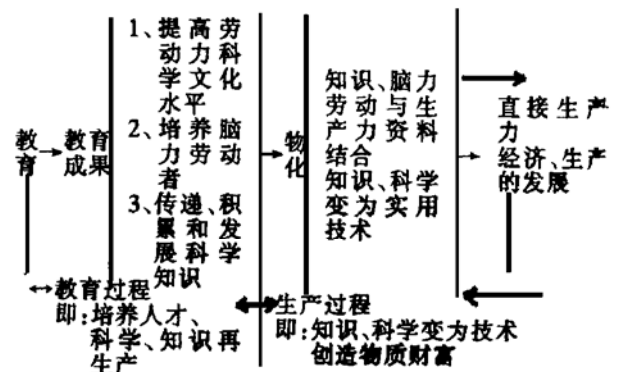
此外,知识、信息技术还广泛渗透到金融业、商业和运输业,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服务业的效率。没有快捷的信息传递不可能应付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热钱”投机也不可能大量出现。

综上所述,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它对整个社会生活,包括经济领域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应该如何迎接知识时代的挑战呢?归根到底,高水平的教育是知识经济的前提,只有提高和强化教育才能把握知识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没有高水平的教育根本不可能出现知识经济。

二

教育是知识经济的前提。在知识经济逐步兴起的条件下,随着“高、尖、精”技术的日益发展和推广,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构成和性质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教育与经济、物质生产的关系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以信息、软件、计算机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应用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使得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劳动者知识、智力和脑力。生产过程这些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使得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可以看出,教育在现代化生产、知识经济时代中地位更加举足轻重。

以下用图形表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从以上图形中可以看出教育与经济生

产是一个密不可分整体。

(一)教育与经济生产的直接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教育可以直接为经济生产提供各种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因为在教育过程中,人是教育的对象;在经济生产中,人作为劳动力,是生产力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二是教育可以直接为经济生产提供科学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教育可以积累、传递和发展科学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从而不断促进生产的发展。

(二)知识、科学是教育与经济生产直接关系的联结点 and 纽带,即:

教育 \leftrightarrow 知识、科学 \leftrightarrow 生产

现代生产只有运用科学知识才能进行,而教育也只有不断地创造、发展科学知识才能存在和发展。由此可见,科学知识便成为教育与经济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共同需要。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教育、科学、生产将趋于高度结合,趋向于一体化和同步发展。

接下来进一步论述教育对知识、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知识、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具有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知识、科技的功能。因为知识、科技并非仅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晶,是一个不断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的历史过程。而教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一方面要加强基础学科教学,即中小学普通教育、基础教育;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加强专业技术和大专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二)教育具有把科学知识转化为实用

生产技术中介的功能。职业技术学校 and 工艺学,把潜在科学知识变为直接生产技术,是实现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三)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最有效的形式。教育把人类长期积累的科学成就,经过有关人员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再进行传递和传播,因而它的效率比较高。可见通过教育可以大为缩短科学知识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

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注重发展高等教育,并把高等教育视为现代教育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尤其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名校成功地哺育了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更加速了这一趋势。因为高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技术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重要阵地,是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高等教育具有教学和科研的职能和作用,它具有发展科学、推广科学、加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提高,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科学技术群体,这些新兴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较快地运用和推广到直接生产领域,现代科学教育在中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和教育与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和重要。为此,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应采取积极主动措施,从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的高度来进行教育改革和作好教育战略部署。

作者王华春,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2000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分析

□ 沈志渔

市场结构所反映的是市场的卖者(企业)之间、买者之间以及卖者与买者之间的商品交易地位和关系。这种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易地位和关系将影响到竞争过程的性质。市场结构是决定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最重要因素。分析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主要是为了把握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的垄断与竞争状况,为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在研究当中,可以用来说明市场结构性态及有关特征的,主要是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和进入壁垒这三个基本要素。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自然垄断产业组织的市场集中度既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集中度过高必然会造成垄断,窒息产业内的竞争,阻碍技术进步,降低产业绩效,而集中度过低则会导致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使企业规模小型化、分散化,无法获取规模经济的利益,最终也会降低产业组织的市场绩效。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的一般集中度是逐年上升的,1988年的工业集中度为13.79%,到1992年已经上升到16.82%,平均每年上升近0.8个百分点。但与

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集中度相比,我国的工业集中度还是比较低的,只及工业发达国家的1/3~1/2。(白文扬、李雨:《我国工业产业集中度实证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年第11期)从市场集中度来看,

经对我国包括电力产供、自来水产供在内的38个行业的测算,电力产供业的4厂集中度和8厂集中度仅次于油气采选业而排列在第2位,其前4家企业已经占有了全行业43.85%的份额,说明电力产供业属于集中度最高的产业;自来水产供业的集中度属于中等水平的,说明受地域的限制,自来水产供业的企业比较分散,规模相对也小一些,这与其地区性垄断的特征是相符合的。电力产供业的4厂集中系数(前4位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全行业企业平均规模的倍数)和8厂集中系数(前8位企业的平均规模为全行业企业平均规模的倍数)都非常高,在所测算的38个行业中列第1位,说明产业内企业规模的差异很大,与大企业同时并存着大量的中小企业。自来水产供业的集中系数处于中等水平,说明企业规模的差异不大,难以形成全行业的垄断。

从行业平均利润率来看,电力产供业仅次于烟草加工(47.63%)、金属制品(27.59%),排列在第3位,自来水产供业位于饮料制造业(19.23%),排列在第5位,说明这两个产业的行业平均利润率是比较高的。然而,有趣的是,绝大多数行业的前4家企业利润率和前8家企业利润率都要比行业平均利润率高,而

电力产供业和自来水产供业的前4家和前8家企业利润率却都比行业平均利润率低。这与西方学者所得出的产业内前几位企业的集中度高,前几位企业的利润率便高的结果是正好相反的。这种情况表明,在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产业内前几位企业集中度的

高低与这些企业利润率的水平之间并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至少目前的情况下是如此。

近几年,随着我国企业集团的迅速发展,自然垄断产业中电力工业的集中度有了很大的提高。电力企业在 1995 年度中国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排序中已占有突出的地位(表略)。其中有 4 家进入了按销售收入排序的前 8 强,有 5 家进入了按固定资产净值排序的前 8 强,有 1 家进入了按利税总额排序的前 8 强。电力工业所占用的固定资产是最多的,500 家按固定资产净值排序的前 6 家中有 5 家是电力工业企业,属资本密集型行业。电力工业的销售收入也很高,在 500 家的前 8 家中,电力企业便占了 4 家。但电力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情况与销售收入并不一定是呈正比的,如四川省电力公司的销售收入虽然仅排列在第 42 位,但其利税总额却名列第 15 位,而广东核电集团和山东省电力集团的销售收入尽管分别排列在第 13 位和第 18 位,但它们的利税总额却分别落到了第 57 位和第 45 位。

电力工业前 4 家企业的销售收入为 10155700 万元,已占 1994 年全国电力工业企业销售收入 25524000 万元的 39.7%,前 8 家企业的销售收入为 14662700 万元,占电力工业全部销售收入的 57.45%。前 4 家企业的利税总额为 1998237 万元,已占 1994 年全国电力工业企业利税总额 4526700 万元的 44.14%,前 8 家企业的利税总额为 2664135 万元,占电力工业企业利税总额的 58.85%。前 4 家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13054293 万元,已占 1994 年全国电力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 34511300 万元的 37.83%,前 8 家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20202037 万元,占电力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 58.54%。(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行业 100 强(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年版;《管理世界》1995 年第 5 期公布的“1995 年度中国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排序”;《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版中的数据计算)

上海煤气公司在按销售收入排序的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中名列第 270 位,年销

售收入 122724.7 万元,是以销售收入进入 500 强的唯一一家燃气生产与供应企业。广州市自来水公司以利税总额进入中国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的行列,该公司 1994 年的利税总额为 15064.3 万元,排名第 336 位,是 500 强中唯一的一家自来水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在按固定资产净值排序的 500 家最大工业企业中,除电力企业外,还出现了多家燃气企业和自来水企业。其中燃气企业是:排名第 50 位的上海市煤气公司(270565 万元)、排名第 211 位的北京市煤气公司(72346.7 万元)、排名第 265 位的北京市天然气总公司(57306 万元)、排名第 284 位的长春市煤气公司(53068.7 万元)、排名第 442 位的沈阳市煤气总公司(34875.6 万元)。自来水企业是:排名第 135 位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109177.9 万元)、排名第 146 位的上海市自来水公司(95774.9 万元)、排名第 200 位的武汉市自来水公司(75886 万元)、排名第 201 位的广州市自来水公司(75877.1 万元)、排名第 245 位的哈尔滨市自来水公司(62158.9 万元)、排名第 251 位的深圳市自来水公司(61047 万元)、排名第 347 位的大连市自来水公司(42955.3 万元)、排名第 350 位的南京市自来水公司(42454.5 万元)、排名第 374 位的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39949.7 万元)、排名第 431 位的长春市自来水公司(35330.1 万元)、排名第 442 位的青岛市自来水公司(34298 万元)。(国家统计局编:《中国行业 100 强(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年版)从以上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按固定资产净值排序进入工业 500 强的燃气生产与供应企业有 5 家,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企业有 11 家。其中,不包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排进 500 家的企业,如天津市第二煤气厂(33051.9 万元),可以排在第 462 位,天津市自来水公司(60509.9 万元)可以排在第 254 位。说明我国燃气生产与供应、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业的资金密集程度较高,进入壁垒也较高,而集中度却并不是很高,因为这些产业的企业规模差异较小。

1994 年,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企

业的工业总产值为 203556.4 万元,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 630700 万元的 32.27%,前 8 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 286367 万元,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 45.4%;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为 218770.6 万元,占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 745100 万元的 29.4%,前 8 家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为 308136.4 万元,占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的 41.36%;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企业的利税总额为 6315.2 万元,前 8 家企业的利税总额为 8698.1 万元,而全行业利税总额为负数,即亏损 56000 万元;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453286.4 万元,占全行业固定资产净值 1255700 万元的 36.1%,前 8 家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574963.1 万元,占全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 45.79%。(计算依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行业 100 强(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版)

从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和前 8 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产品销售收入、固定资产净值的情况来看,市场集中度并不高,且大体都在 30% 和 40% 左右,说明该产业在地区垄断的情况下企业的规模差异较小,企业的规模难以进行大范围的扩张;而从该行业的企业利税总额来看,前 4 家和前 8 家企业都有一定的效益,其产值利税率分别为 3.1% 和 3.01%,全行业的利税总额则为净亏损 5.6 亿元,说明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大企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1994 年,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 270441.5 万元,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 1525000 万元的 17.73%,前 8 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 344009.2 万元,占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 22.6%;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为 317754 万元,占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 1443400 万元的 22.01%,前 8 家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为 400910.4 万元,占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的 27.78%;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企业的利税总额为 146901.1 万元,占全行业利税总额 235200 万元的

62.46%,前 8 家企业的利税总额为 159604.3 万元,占全行业利税总额的 67.86%;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356715.9 万元,占全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 2545100 万元的 14.02%,前 8 家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为 583387 万元,占全行业固定资产净值的 22.92%。(计算依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行业 100 强(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年版)

从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前 4 家、前 8 家在工业总产值、产品销售收入、固定资产净值的情况来看,集中度并不高,且大体都在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之间,分布比较均匀,说明该产业由于地区垄断性的存在,企业的规模差异不大,产值、销售收入和固定资产净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但从利税总额的情况来看,前 4 家和前 8 家分别占全行业利税总额的 62.46% 和 67.86%,说明该产业中的大企业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占有一定的优势。

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结构目前已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一方面是自国家放开非基本电信业务之后,这一领域呈现出众多企业间激烈竞争的局面,如无线寻呼服务台全国已有 1000 多家,市场集中度比较低;通过鼓励大企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规范企业行为,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另一方面是联通公司的成立打破了基本电信业务被邮电部独家垄断局面,使这一领域中形成了寡头竞争的态势,其市场集中度虽然很高,但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消费者从中得到了不少实惠;再一方面是邮电领域继续维持了全国独家垄断的局面。

我国的民航业目前已处于 40 多家航空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其市场集中度并不是很高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中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并不是很大。通过推动企业集团的发展,提高该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以消除过度竞争,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合理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对于该

产业的企业扩大国内市场份额,占领国际市场,是至关重要的。

从铁路业来看,尽管已经先后成立了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但从整体上铁路依然处于独家垄断的状态。我国铁路业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从根本上打破其大一统的独家垄断局面,建立起多家企业相互竞争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

二、产品差别分析

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如铁路、电信、民航、电力、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煤气生产和供应等产业都属于低产品差别的产业,它们产品质量并没有特定的物质产品作为载体或依托,它们也无需经常开发新产品或改进产品的规格、型号,更无需改进产品包装。如前所述,这些产业的产品差别主要体现在企业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上面。

一般来说,这些产业的产品,只要能够满足用户的基本用途,达到用户的满意,便是合格的产品。如果是在竞争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就必须千方百计地通过改善和提高服务水平来扩大产品差别,以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对于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来说,情况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存在着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的情况下,用户对这些产业中所能够提供服务的企业的选择是有限的,甚至是唯一的,这就意味着每一家企业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服务范围或区域,只要客户在某企业的范围或区域内,就必须由该企业提供服务。由此而引起的直接结果是,产品差别对于这些产业来说似乎并不重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并不热衷于通过改善和提高服务水平来扩大产品差别。多数企业对其服务产品既不进行广告宣传、改善服务,也不进行宏扬企业文化、改善企业形象的活动,轻松地享受着垄断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在存在着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的情况下,由于消费者所需要的服务产品的数量是有限的,进行广告宣传并不能起到促使服务产品的销售量明显增加的

作用,而不进行广告宣传也并不一定会导致服务产品的销售量大幅度地减少。

应当肯定的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自然垄断产业中的电信、民航业中相继引入了竞争机制,通过提高服务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差别,以求在竞争中获得主动,已在许多企业的行动中有所体现。

我国民航业的产品差别相比之下是体现得比较充分的。在各个民航公司之间,通过提供各种优质服务来改善公司的形象,特别是通过广告宣传形成产品差别,以吸引更多的顾客,扩大市场占有率,已成为事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电信业中也开始体现出产品差别,特别是在邮电部电信总局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在无线电话领域的竞争上,以及非基本电信业务的无线寻呼领域中,产品差别比较明显,不少公司之间在利用广告方面也比较成功。

铁路客、货运输方面,由于存在着地区垄断性,各铁路局、铁路分局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在铁路中目前还很难体现出真正的产品差别。

由于地区垄断性的存在,电力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中的产品差别也很难体现。

三、进入壁垒分析

进入壁垒对于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来说,排斥了垄断企业之外的其它企业进入该市场,抑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使这些产业内部的企业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稳定性,在价格上维持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和浪费现象的大量存在,很难达到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同时,由于地区垄断的存在,导致大企业的规模不大且中小企业大量存在等原因,企业的生产规模也很难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

1. 规模经济壁垒。在我国,规模经济壁垒所起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一些本应是

规模经济壁垒很高的产业,却表现为低、中度规模经济壁垒产业,如电力工业,尽管大规模生产是该产业的重要特征,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产业内与大企业同时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

2. 必要资本壁垒。必要资本壁垒表明了一个新企业进入某一行业时所必须投入的最低资本量,对于铁路、电信和航空等产业来说,必要资本壁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一些资本金不足的中小企业阻挡在行业的大门之外,但在某些行业却不是这样,如我国的电力工业本应是高资本壁垒产业,但由于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该产业的资本密集特点并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

3. 产品差别壁垒。一般来说,在产品差别壁垒较高的情况下,产品的异质性较大,该种产品所能够实现的社会总效用也就越多。而铁路、电力、民航、通信、自来水、燃气等产业,都属于低、中度产品差别化壁垒产业,它们当中,除民航与通信业在较大程度上通过服务质量体现出产品差别外,其它产业中几乎体现不出任何产品差别,因为用户对于这些产业的产品几乎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4. 绝对成本壁垒。电力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及铁路业等,都是高绝对成本壁垒产业,新企业如想进入这些产业,就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等资源的占用和营销网络的开辟等方面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5. 政策法律壁垒。我国自然垄断产业在进入壁垒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政策法律壁垒,典型的事例是电信业、电力工业、民用航空业和铁路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的电信业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管制的方式主要是政策管制、价格管制和计划管制。从政策管制来看,多年来,除一些特殊部门被允许建立全国性的专用通信网、一些大型企业或地区被允许建立地区性的专用通信网以外,进入电信业受到国家政策壁垒的严格控制。从价格管制来看,国家对电信业的价格一直进行严格的管制,这使得电信业成为一个微

利甚至亏损的行业,进入这一行业除了要从有关方面获取足够的财力支持,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外,企业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从计划管制来看,在传统的经济体制未发生动摇以前,我国的企业处于严格的计划管理之下,企业必须严格地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组织生产,企业上项目也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如果国家没有下达新的项目投资计划,企业是不可能涉足新的业务领域的。

电信行业的业务主要包括通信业务经营、信息处理服务、通信工程施工和通信设备生产四大部分。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首先放开了信息处理服务、通信工程施工和通信设备生产。1994年联通公司的建立,又打破了通信业务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在通信领域里展开了两强之间的竞争。

我国的电力工业多年来一直是由国家投资建设。从1988年开始,国务院为了筹集电力建设资金,加快电力发展,批准实行对用电单位征收每千瓦小时电2分钱的集资办电政策,该价外电力建设资金由地方政府管理使用,促进了多家办电格局的形成。中央与地方、内资与外资、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以多种形式合资办电,出现了一批分属华能、地方政府、中央与地方合资、中外合资的独立经营的发电企业,打破了电力生产与供应一体化的格局,对加速我国电力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在我国新增装机容量中,仅地方投资的部分就已经接近50%。到1993年,上述新出现的独立经营的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已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0%左右。

我国的民用航空业曾长期处于中央高度集中的控制之下,在“文革”期间还实行过半军事化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想进入这一行业是根本无法办到的。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民航总局的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方案中允许有条件的地区成立航空公司、修建机场,从而降低了政策法律壁垒,为民航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后的短短几年内,各地便

很快地建立起数十家民用航空公司。目前,为了适应民航业国际竞争的要求,在我国的一些民航公司之间已经出现了联合的趋势,现实表明,民航公司的规模过小,在竞争中是难以生存的。

从铁路来看,为了解决交通运输发展滞后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问题,近几年国家对进入铁路业的政策有所放宽,进入壁垒开始降低。1992年10月,国家通过了《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的意见》,1993年11月,又颁发了《关于发展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的意见实施办法》,标志着中国的铁路业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分权管理的模式开始建立。特别是为了鼓励中央和地方合资建设铁路,在税收和土地征用等方面还给予了优惠的政策。

行政法律壁垒的重要形式之一是项目
•学术动态•

审批制,即根据投资额的大小,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有关部门或国家计委对基本建设项目进行审批,在资金来源、企业规模、资源情况、产品销路和经济效益等各方面审查合格,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的情况下,企业才能够取得进入资格。但是,对于自然垄断产业来说,多数工程项目都是属于中央或地方的配套建设项目,如自来水厂、热力公司、燃气公司、电站工程、通信工程等,是在中央或地方的计划之内必须建设的项目,该进入的企业就必须进入,不该进入的企业有多么强烈的投资冲动也无法进入。因此,行政法律壁垒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主观性和随机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效率的低下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作者沈志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00836)

责任编辑:谭湛明

广州、深圳学者座谈《文化深圳》

由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和深圳市作协共同主办的《文化深圳》一书研讨会,于6月17日在广州召开。《文化深圳》一书是由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杨宏海撰写的个人专著,于今年年初由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首次对特区文化特别是深圳文化作出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展示了深圳特区文化发展的迷人的风景线。该书以深圳文化的历史演进为线索,既对深圳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进行挖掘,又对特区成立以来的深圳文化实践作了重点论述,阐明了深圳文化的特色、内涵及历史渊源。作者立足深圳实际,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文化现象予充分关注,率先提出并探讨“新民俗文化”、“打工文学”、“现代文化名城”等特区文化研究的新命题。全书注重实证研究,从深圳丰富多彩的文化实践中梳理、阐释、探讨了特区文化作为岭南新文化的“与时俱进、重在建设”特征,丰富和发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并以学理化的态度回驳了“文化沙漠”论者的偏狭观点,为人们展示了深圳文化发展的新鲜成就和希望。

研讨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该书资料翔实,用功深厚,观点新颖,体现了深圳学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和良好的学风。

由深圳人撰写的理论著作在广州举行这样的研讨会,还是第一次。这对于广州、深圳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必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垄断中性”与产业组织合理化

□ 廖伟权 邓伟根

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垄断是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当前对垄断如何认识,不仅关系到要不要和如何“反垄断”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目标模式的选择,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垄断中性论”:概念本质与分析方法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把垄断看成一个贬义词。标准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垄断破坏了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妨碍技术进步和创新;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占有垄断利润,通过串谋、默契、领导价格等手段左右价格,必然造成较低产量较高价格,致使消费者剩余减少、社会分配不公乃至总福利损失等等。因此,反垄断也成为天经地义。但是,产业经济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却与之表现得不完全一致。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康采恩等垄断企业组织尽管遭到反对,但却不断发展,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日益全球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体现为国家之间产业竞争力的较量,政府放松管制转而支持垄断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一向坚持反垄断的美国也放松了反垄断、反兼并的管制。近些年来大规模兼并、合并浪潮席卷全球,愈演愈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默许。现代经济学家也开始再度审视垄断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垄断观念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如熊彼特依据古典主义的在某个时间条件下进行竞争的过程这样一种竞争的观点,认为竞争

好似“持续的阵风,造成创造性破坏”,他论证了垄断对创新的积极作用,认为缺少垄断的经济增长将会慢得多。根据他的创新竞争,垄断的产量不足的缺陷完全可以从用垄断利润来进行的研究开发所带来的好处得到弥补。现代批评家们不仅引用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而且结合现代市场的特点从理论上为垄断正名。他们认为,因为完全竞争缺乏现实性,基于完全竞争假设前提的新古典主义指出的垄断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负面效应,其实际效果就大打折扣,并没有所指的那么严重。而且在当今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足以保证低价格和较高的经济效率,垄断有利于大规模的研究和开发等等。更有人把垄断等同于生产集中和规模经济,认为垄断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显示出走向赞美垄断的另一个极端的倾向。

为此,有必要重新探讨垄断的概念本质。世界经济发展和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垄断是社会化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垄断即“缺乏竞争”,换言之,竞争即“缺乏垄断”。垄断作为竞争的矛盾对立面,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最终统一于市场效率。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市场竞争的目的正是为了取得垄断地位,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有垄断。“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实际并不存在。垄断虽然是在竞争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垄断并没有消除竞争,它改变的只是竞争形式,而非竞争本身。如果放眼于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广的空间范围,垄断反而可能会使竞争更加剧烈。垄断与竞争一样原本就属市场机制范畴。现实经济是垄断与竞争的混合,没有单纯的垄断和竞争,不含垄断因素的竞争和不带竞争因素的垄断从来就不存在。垄断和竞争的并存是形成市场有效竞争的重要条件。虽然主流的新古典主

义建立在“完全竞争”不现实状态基础上的否定垄断有一定道理,但经济学毕竟要根植于现实基础上才能具有生命力。当人们一旦认识到垄断和竞争并存的经济现实时,研究经济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的理想标准只能转为现实的次优理论,于是应不应该有垄断的问题也转为“垄断度”大小的问题。从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经济学中的垄断应既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本质上是一个中性概念。就如我们倡导适度竞争一样,我们也倡导适度垄断。竞争不足与过度竞争不好,垄断不足与过度垄断也同样不好,它们都有一个“度”的问题。面向应用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就是要追求适度竞争与适度垄断。如果按照“垄断中性论”的观点,历史与现实许多有关垄断问题的争论都迎刃而解。垄断对资源配置,一方面会因为伴随规模经济而改进资源配置状况,实现成本节约,另一方面垄断对价格控制和产量限制使垄断行业的资源进入不足,造成资源误置,两方面利弊的权衡达到次优的适度垄断,使资源配置效率尽可能改进。从企业内部来看,一方面垄断大企业产生X——非效率,另一方面垄断大企业可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与交易费用节约的好处,我们同样要权衡利弊追求适度垄断的企业规模,使效率尽可能提高。至于垄断与技术进步效率之间的关系,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既有垄断有利于研究开发和技术进步的结论,又有相反的结论,至今尚无定论。一些有说服力的研究表明,研究开发在达到某个垄断度水平以前不断上升,越过一定水平以后,可能逐步下降。而且大多数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点,即适度垄断从而适度竞争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至于寻租行为的资源耗费,主要源于特权安排,人为特权虽与垄断有联系,但并不等于属于市场范畴的垄断。从上述“垄断中性论”出发,笼统地反垄断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纠正过度垄断和反不正当垄断,不正当垄断实质就是不正当竞争,那么《反垄断法》存在的形式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

垄断的中性本质使我们以一种新的眼

光来看待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垄断就是一种市场。新古典主义的垄断就是独占的完全垄断型市场,现实经济中的垄断就表现为寡头垄断型市场和垄断竞争型市场,特别是指寡头垄断型市场。根据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效果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借助于这个分析工具对垄断结构、垄断行为和垄断效果展开研究。其中衡量垄断效果的标准也是衡量垄断程度的标准,对垄断结构与垄断行为的评判将最终取决于其垄断效果如何。垄断结构、垄断行为与垄断效果一方面根据SCP分析框架必然具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市场的垄断在现代经济中日趋复杂化,因此垄断结构、行为和效果之间也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某种垄断结构不一定产生某种垄断行为与垄断效果,反之亦然。另外,垄断作为一种市场应有其区域范围性。特别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研究垄断的结构、行为和效果一定要考虑区域范围,如地区垄断、国内垄断、全球垄断等。

二、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垄断结构、垄断行为与垄断效果

与古典市场的封闭性、区域性、结构单一性不同,现代市场则表现为开放性、全球化、结构多元性。古典主义的垄断观建立在对古典市场认识的基础上,今天的现代市场已大为不同,因此对垄断的看法也不应“古典”了。如果说过去一定垄断度的垄断结构在封闭市场上会导致某种不良垄断行为和垄断效果的话,那么今天这种垄断结构在开放性市场上将可能不会产生不良的垄断行为和垄断效果。换言之,今天适度的“垄断度”可能远远大于“古典”的适度“垄断度”,许多过去表现为过度的垄断结构在今天可能是适度,甚至是不足的。一些过去被认为是不良的垄断行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已成为合理。而在评价垄断效果的标准方面不同于过去的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垄断具有区域范围性,这里我们着重看国内垄断。在当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经济趋于全球化、一体化,国内市场国际化。因此在开放的一国市场形成不良垄断行为和效果已变得非常困难。任何一个想依靠垄断地位达到高价格或对降低成本漠不关心的厂商最终都将被竞争淘汰,这种厂商至多只能在短期内享有垄断地位。当今开放的国内市场越来越具有“可竞争市场”的特征。“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s)理论是80年代初鲍莫尔创立的新理论,他对政府授予自然垄断以垄断特权的管制提出了挑战。可竞争市场是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行为施加很强约束的那些市场。一个市场是可竞争的,就必然不存在严重的进入障碍。为不使再进入者有赢利机会,均衡的行业格局必须具备无显著的超额利润、现有供给者之间的定价以及生产配置是有效率的等等特点。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活跃的厂商,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因为是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对在位者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约束。尽管该理论把市场抽象为“进出绝对自由,退出毋需代价”,以致于鲍莫尔也承认其缺乏现实可用性,但是笔者认为其思想对于理解当今的垄断很有意义。根据“可竞争市场”的思想,若一国市场足够开放,由于国外厂商的压力,则具有可竞争性。即使仅仅是国外厂商进入国内市场的威胁(潜在的竞争),就可使垄断价格降低,并控制非公正的垄断行为。可竞争市场内的已有企业可以是独家经营者,但市场的可竞争性使得它并不具有市场势力或实际垄断力量,即在可竞争市场中的垄断结构并不导致不良垄断效果,也很难造成不良的垄断行为。

下面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根据上述可竞争市场的思想,不同产业的国内市场具有不同的可竞争性。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两种经济活动,一种是企业为本地(本国)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活动,称为“本地化经济”(或本国经济);另一种是企业进行全球化经

营的经济活动,称为“全球化经济”。而在整个产业系谱中,有些产业与外国同一产业没有竞争关系,可称为“多国内产业”,如邮电、交通运输等;而另一些产业则与外国同一产业有很强的竞争关系,被称为“全球产业”。从产品的角度看,前一种产业的产品国际贸易量很少,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国际贸易,被称为“非贸易品产业”;后一种产业的产品国际贸易量较大,可称为“可贸易品产业”因此,从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角度来看,“全球产业”或“可贸易品产业”的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的可竞争性,而“多国内产业”或“非贸易品产业”的国内市场具有较弱的可竞争性。就“全球产业”或“可贸易品产业”的国内市场来说,只要市场足够开放(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足够低),即使一国内该产业只有一家厂商,也不会导致不良的垄断效果。例如美国的柯达胶片因为受到日本富士等国外厂商挑战而不可能构成不良垄断。这种情况下只要充分开放商品市场就可以达到较高的可竞争性,若进一步开放产业投资市场,则就有更高的可竞争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产业”在现代开放经济中的趋势是将只存在全球市场垄断,已无一国内市场垄断之说。如波音兼并麦道后占有全球飞机市场65%的份额,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构成对全球民用客机市场的垄断。实际上,当今世界市场上,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就是为了取得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内市场适度的“垄断度”已经很大,垄断结构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提高市场的可竞争性。时下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企业大型化、跨国化的浪潮,已经和正在使很多产业异乎寻常地集中,都只有少数几家企业竞争,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已成为一种常态,这也是美、日、欧、韩等工业化先行国家主导产业组织结构的现实状况。在某一市场范围内具有垄断势力的,一旦越出该市场区域,就会形成范围更大程度更高的竞争,不仅垄断组织内部存在着围绕核心企业而展开的零部件和中间

产品市场的竞争,而且垄断组织之间及其与非垄断组织之间的高层次竞争更加激烈。政府若限制企业规模则是在惩罚成功的企业,抑制了其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能力,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政府的公共政策可适当转向扩大市场开放度以提高市场的可竞争性。当然,对于过度垄断和不正当垄断还应采取措施加以防范,特别是对于“多国内产业”或“非贸易品产业”,更应警惕寡头垄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三、我国的产业组织合理化及其目标模式

产业组织合理化是关系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所谓产业组织合理化,即力求找到竞争效益和规模效益之间的均衡的产业组织状态。实现产业组织合理化,就是要解决实质为垄断与竞争矛盾的“马歇尔冲突”,达到产业市场的适度竞争和适度垄断,实现有效竞争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核心是规模选择问题,其狭义概念是指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即在一国产业组织成长过程的特定资源、环境条件约束下,通过市场结构的调整和企业间组织的优化,使产业内有限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利用。其关键的中心问题是产业组织基本形态(市场结构)以及产业组织形式(企业间组织形态)的选择,这对于我国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顺利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

产业组织合理化是就某一国产业系统内的具体产业而言的,具有民族性和国界性。因此,有民族产业是产业组织合理化研究的前提。通过上述对垄断的研究,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寡头垄断已成为一种常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当今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兼并浪潮和产业组织结构“垄断度”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再考虑到我国所处的重工业化阶段的要求和产业组织落

后状况等因素,我国的产业组织合理化目标模式应是多数主导产业改革为以寡头垄断为主的市场结构,并采取以股份制为基础的企业集团、企业系列等企业组织形态,这样可以构建以大企业为核心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形式,形成集团内部中小企业围绕核心企业展开竞争和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分层竞争格局,有效地避免过度竞争与过度垄断,从而达到适度竞争和适度垄断的均衡状态。当然,根据不同产业的适度“垄断度”不同,不排除一些产业形成垄断竞争或近似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上述结论要求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步伐,保证足够的开放度。在当前,我国要推动对传统产业组织的改革与创新,必须先加快完善市场机制,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破除行政性垄断,通过产权改革重塑产业组织的自组织自调节机制,推动企业之间兼联合的企业重组,培育一批世界级的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以逐步实现产业组织合理化的目标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 1.[美]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
- 2.张军著《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9月版。
- 3.约翰·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一卷、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 4.金碚“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
- 5.戚聿东“资源优化配置的垄断机制”《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 6.谢地、乔梁“为垄断正名和反垄断”《经济研究》1997年第9期。

作者廖伟权,广州暨南大学企业管理系硕士研究生;邓伟根,广州暨南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510632)

责任编辑:谭湛明

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张根生

一

中国的农业改革从1979年到现在已近20年了。农业生产主要是粮食生产,已经连上四个台阶,由6000亿斤增加到了9800亿斤。1984年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中央提出转向发展商品生产,积极发展了畜牧、水产养殖业和棉、油、糖、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较大地增加了农民收入。增产的措施是综合的,尤其在科技上推广优良品种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提高耕作技术,扩大高产的水稻、玉米面积,扩大复种指数,增施优质复合化肥,扩大水浇地,改造低产田都起了重要作用。在经济政策上长期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幅度提高粮价,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改为定购包干不变,放开各种农牧水产品市场,对于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反映了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现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它仍在不断释放其能量。

回顾我国近50年的经验教训。1950—1953年全国新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即耕者有其田,不但没有破坏生产,而且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全国粮食生产由1949年的2264亿斤,到1953年增加至3337亿斤,超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全国开始互助合作运动,当时步骤是稳妥的,大部分为兴办私有基础上的互助组和少量的土地入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到1956年粮食总产达到3855亿斤,人均占有由1949年418斤提高到620斤,每人平均提高200斤。这是全国情况最好的时期之一。

当时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全国占90%的农业经济仍是手工操作的低水

平。1949年3月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说过“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这就是说要有一段时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有一个过渡期,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对我国经济形态提出为:没收官僚资本形成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私有基础上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形态。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这就看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都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建国的政治基础。当时也有人提出写上社会主义,刘少奇、周恩来不同意,指出不能触动私有制,以避免犯“左”的错误。1950年6月,三中全会号召为国家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而斗争。中央还批评了那种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

出问题在于:1953年底中央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后,毛泽东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财政经济情况迅速好转,1956年很快完成了三大改造,就对实现社会主义看得过于简单和容易了。这时有一句简单的口号是“新中国建立之时,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时”。八大政治报告就明确宣布“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伟大转变,我们国家开始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同时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且以后逐步把私有经济都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包括私有制的小农经济。因而在1956年开始的三大改造,实际是消灭私有经济了。农业改造到1956年冬至1957年春就全面实现高级社了,特别是1958年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加上“大跃进”、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办食堂和大炼钢铁,造成了生产力的大破坏,耕牛减少1704万头占1/5,耕地减少1.3亿多亩占8%,森林被严重破坏,粮食生产在1960年一下子降到了2870亿斤(1951年的水平),人均占有只有430斤,这是没法吃饱的。应该说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农村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虽然存在铺摊子过大、违背建设程序等缺点,有些造成严重损失,但应肯定总的成绩是主要的,为全国的山河改造打下了重大基础。如从完成三大改造来说,虽有过早过快的严重缺点和失误,但是终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没有前20年工农业的发展,以及培养的大批干部,取得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创新局面。

中央在1962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左”的错误,制止和退赔共产风,纠正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接着制定了人民公社60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上退到了初级社的规模。还不够彻底的是公社、大队政企不分,平调仍然没根本制止。中央、各省市都发出了许多指示,派工作队下乡,进一步想从经营管理上解决内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问题。安徽、广东等省都提出并试行责任田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形势

有了很大好转,到1965年全国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和超过1956年水平,粮食达到3890亿斤,也是农村形势比较好的时期之一。但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一次接一次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在这样的总形势下,不可能根本纠正“左”的错误,而且越发展越严重。

10年“文化大革命”更是全面推行极“左”的路线,到处向“走资派”夺权,停止党的活动,使全国陷于瘫痪状态。又连续两次(1970年北方学大寨会议和1977年冬农业座谈会)推行大队核算的穷过渡,侵犯生产队自主权,造成生产力的再度破坏。到1976年农村经济已陷于崩溃边缘,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仅仅达到5654亿斤,人均占有只有600斤,低于1956年,人均收入60元比1958年每年只增1元多一点。肉、油、蛋、鱼、菜、果等副食品都极为短缺,普遍实行凭票供应。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近20年中,在反对“左”、右倾问题上,虽然也有纠“左”,但主要是一次又一次的反右,越反越“左”,使农村工作受到重大影响,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实行拨乱反正,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全党的中心任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首先在全国农村掀起了改革高潮,成功地实行了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土地仍归集体公有,保留一定程度的集体经营(乡镇企业占较大的比重),使用权归农民,长期承包,形成以家庭为主的双层经营。为什么包产到户,中国8亿农民靠的是一点土地生存,当然先要求土地。在过去20多年中曾多次试验各种不同形式的联产承包制,所以一放开农民有了自主权,就迅速形成高潮。这是生产关系的大调整,使之适应了生产力发展,又一次生产力大解放,它的意义不亚于土地改革,真是波澜壮阔,想不到,不敢想,五年粮食年产增加2000亿斤,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8000亿斤。吉林省四年由年产180亿斤增到320亿斤,一下子可调出100亿斤,现在年产已稳定到400亿斤,翻了一番多。改革给全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新篇章,在政治上更避免了我国出现苏联、东欧解体那样的危险。

1988年中央提出了利用两种市场、大出大进、两头在外的沿海发展战略,对全国的对外开放是重要推动。现在全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已经占到外贸出口的一半左右,对于增加外汇收入、扩大税收、特别是劳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村改革的成功,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粮食生产的迅速增长,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市场的发展可以买到粮食,允许远距离运销,劳动效率的提高,剩余劳力增加,因而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出现了异军突起和突飞猛进,特别是二、三产业,集体经济发展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发展更快,远远超过了1956年私营工商业改造前的规模、劳动力、资产、营业比重,但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更巨大的发展,经济总量即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到世界第七位,而且公有经济占有主导地位。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一亿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这些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有利条件。

十五大江泽民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中全会之前20多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一项根本原因,就是提出的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所以成功就在于克服了那些超越初级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兴旺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使大家清醒地认识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据以制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全党对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认识逐渐统一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上来。

二

从我国农业实际来看,今后几十年在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上,有几条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1. 人口将每年增长1000万以上,最高时总人口可能达到或稍低于16亿人。

2. 粮食要基本自给。每人年需要最低800斤最高1000斤,共需1.28万亿斤到1.6万亿斤,还要不断提高质量。

3. 耕地应力争保持每人一亩的基本农田,2/3实行保水、节水灌溉。

4. 教育科技的提高,农村普及高中、职业中专,科学研究和技术普及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5. 农村人口中应有半数以上转向非农产业,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基本解决或较大地缩小城乡工农差别。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还必须具体抓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发展。包括:水利工程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推广新的科学技术;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化肥、农药、薄膜的生产和供应;稳定、完善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推进农产品的购销改革;农村工业、交通、电力等配套建设,共同形成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据估计现在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经提高到9000亿斤以上,如由于一二年气候特别有利或灾害严重而出现特别高产或低产不能代表综合生产能力。

1、大力加强农村科研教育工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发展农业生产越来越重要。据有关部门分析,科技(含量)对粮食增产的作用已经提高到40%左右。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仍在减少,人均占有耕地将降到一亩稍多一点。我们又要实行粮食自给,以人均800斤到1000斤计算到全国人口达到的最高数时,就是要按播种面积16亿亩计算,平均亩产要达到800到1000斤,这是可能做到的,但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依靠的将是科学技术的增产作用,要提高到50%左右,尤其在培育更高产优质的良种上要下大功夫,遗传育种、生物工程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广大农民文化技术水平,这是最活跃的生产力。

2、生产条件的改变。严格加强耕地占用管理,把批地建房等权收到省、市、县人民政府。随着扩大复种指数,单产的大幅度提高,将使地力加大消耗,需要在土肥建设上予以补充、提高。水资源的消耗将越来越多,要高产1000斤左右,必须有水灌溉保收,既要增加水利工程建设,特别对西北、东北、西南的水利建设,南水北调势在必行,又要考虑华北等地区水资源枯竭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推广管道、滴水、喷水等节水灌溉是势在必行,投资多也要干。所谓低产田改造,就是要能灌溉和有充足的肥料。按播种面积计算,亩产800斤以上一般需要100斤化肥。过去20年全国化肥生产由1065万吨(折纯)增加到2809万吨,每年还进口上千万吨,

并且提高了质量,对提高亩产起了重要作用。在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必须采取更加有效措施才行。

要增加国家和省市县各级政府对农业特别是对大中水利工程、科学研究、技术推广、普及教育等方面大幅度增加投资。这是必须及早解决的战略问题,也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寄托在近5年或10年必须解决好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改革、改造和结构调整问题,才能根本上调整工农业的关系。国家和各省市应建立农业大学、农牧水产学院的奖学金,鼓励大家报考农科大专院校。国家和省市要建立农业科技奖励基金,对有重大贡献者要给重奖,如10万、20万、50万、100万元。

3、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放宽农业生产政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100年以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形式,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1)以家庭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方式,应再稳定50年不变。目前主要是通过产业化和公司+农户联合购销、加工、入股、信贷、保险等形式,扩大经营规模。随着农业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也可以逐步发展专业大户,以扩大经营规模。

(2)当前农村改革应把建立完善农村市场体系作为重点,以更好地配置利用资源。目前市场发育特别是批发市场发展缓慢,形不成市场体系,农产品市场跟不上生产发展,经常发生流通不畅,价格忽高忽低,生产大起大落,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这也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应加强市场对生产的引导,加速建立资源配置和农产品市场购销体系,相应解决市场信息管理、商品包装、购销渠道、价格调控、信贷保险、运输保管等工作。

(3)放开手发展各种经济形式。对个体经济的专业大户,给以贷款和购销扶持,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开发新产业实行产业化经营。现在家庭经济在农业经济上已占主要地位,1996年家庭经营收入占全部收入(1926元)的70%,但是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如有些地方开始试行把浇地水井、小

山塘、小园艺场、小林场、荒山丘陵、沿海滩涂出卖(使用权几十年)、租赁给各户长期经营。对三资农业和私营农业企业在政策上应鼓励开发大农业。如大规模的畜牧、水产养殖场,建立大型林业基地,较大规模开垦荒地,开发大型果菜花卉农场,兴办农产品加工厂、冷冻厂,兴办出口创汇农业企业。在税收、出口、贷款上给予优惠支持。以上政策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有重要的意义。

(4)对经营较大规模农林牧渔业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特别是出口创汇农业企业(公司、合作社、场、厂)在税收、贷款、出口上给予优惠。

(5)对于新创办的各种经营农业的形式、内容、规模,也就是新的生产关系形式,如股份合作、股份制、私营、混合经营、租赁等具体模式,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特别是对农村劳力就业、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有利者均应允许试办。

4、农业现代化必须相应地进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全国七八亿农民在农村从事很少的土地经营的状况不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我国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一亿多农村劳力从农业上转移到二、三产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由于全国大中城市劳力已经过剩,今后几十年内仍不能让大批农民进入大城市,但是应该积极有计划地发展县城、中心镇等小城镇和适当扩大中等城市,鼓励农民到小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并允许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大中城市从事某些工种劳动。对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仍应鼓励支持积极发展,这也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在近几十年内农村劳动力仍有很大数量的剩余,还应同时大力发展开发性农业,如荒山造林、丘陵开发造林种草、沿海滩涂围垦,特别是发展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既增加收入又扩宽劳动就业门路,国家在政策上应给予支持鼓励。

作者张根生,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510000)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

实证主义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以寻求科学、捍卫科学的面孔表现于世,尤其是这种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不仅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科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而且在方法论、研究程序、研究方法上也作了具体规范性的要求,如此情况必然引起世界学者对此种哲学的重视。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众多学者论述实证主义,实施实证主义方法论,但对什么是实证主义的回答则各行其是。一般情况下,学术界总是把孔德(A·Comte)、穆勒(J·S·Mill)和斯宾塞(H·Spencer)的思想作为实证主义的正统,或者扩展之,让其正统也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及美国的实用实证主义。然而,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尤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学者们的争论就十分热烈了。例如,在社会科学的具体门类如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有人刻意追求所谓的实证精神,把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论视为律条,认为对此必须严格遵守;而有人则公开地要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分道扬镳,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一方面同意实证主义提倡的那种追求科学研究的实证精神,另一方面又批判它那教条式的方法论,认为那种方法论如同一条枷锁,镣铐着研究者的心灵,束缚着研究者的手脚,实证精神绝非仅是那种业已死亡的旧实证主义所限定的内容,而新的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更能反映出真正的科学精神。对于这种情况,早在70年代初,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哲学家季登斯(A·Giddens)就抱怨说,实证主义“业已被宽广而且含混地作为一种批判的攻击武器使用……这个术语现已失去任何可接受的标准意义的要求”。^①而到了80年代中期,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哲学家布利安特(C·G·A·Bryant)在他所撰写的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内容的一书中,不得不以“一种实证主义还是多种实证主义(positivism or positivisms)”作为该书的首章标题。^②这种对实证主义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在80年代之后的有关定量和定性方法论之争中表现得异常明显。^③

那么,究竟什么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有哪些最基本的规范要求?为什么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会出现如季登斯抱怨的那种情况?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探索。

—

从语源学的角度,西方学者几乎都约定俗成地认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词最先由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孔德造而用之,但这是一个误导。孔德的作品里确实论及实证的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实证的方法(positive method),然而他并没有使用“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一专门性的术语。“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他的追随者创造的;但究竟此语谁先用之,学术界目前还没有肯定性的回答。就“实证的哲学(positive philosophy)”而言,最早由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而真正赋予它生命,并使之成为一种哲学则归功于他的学生和他的秘书孔德。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如此观点:孔德是实证哲学的鼻祖。1830—1842年间,如何解释和阐明有关实证哲学的要旨是孔德著作里所讨论的主要课题。在那洋洋大观的六本“实证哲学教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中,孔德基于对人类智力进化理论的假说,相信人类智力经过了三个连续发展的历史阶段,那就是1、神学的或幻想的;2、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3、科学的或实证的。在孔德看来,前两者固然是人类智力发展必经阶段,但其结果是对真正地“认识自然毫无意义的”。令孔德感到兴奋的是,这种无意义的阶段已经随着牛顿时代的到来而渐渐消失,让位于另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他所谓的实证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类智力的真正任务是如何寻求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知识。人类对自然探索的兴趣并不是探索那产生现象的终极原因,而是研究现象性质的“怎样”。通过对“怎样”的研究,人类可以发现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中的法则。基于如此对实证的解释,孔德认为,所谓实证的或科学的,其性质应是实在

的、事实的、有用的、确实的、正确的、积极的。④

关于实证哲学,孔德在那六卷本里给以详尽而系统的解说。如果从总体上,尤其是从表现于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E·Durkheim)思想中去论及法国的实证主义思想,其要旨可概括十二种之多。⑤但就其与本文所论述的内容而言,这里只择其有关孔德思想中的几点要旨。第一,在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下,孔德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种类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绝对的观点,拒绝对本体论的研究。第二,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探求,因为科学是人类唯一认识客观存在世界的手段。唯科学能获得知识,进而能发现客观存在世界的最高规律——人类社会规律。而完成如此之举,则必须结合人类的智力理性和人类认识世界的经验主义传统,简言之,即理性和观察的结合。第三,孔德偏爱以实证哲学去替代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人常用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在孔德看来,他的实证哲学并非仅仅关于自然、物理世界,而是包括社会在内的一种总的学说。这种学说不仅解释了人对自然世界知识的探求,而更在于以此为基础去认识社会,去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正是基于如此原因,孔德相信,对社会的研究可以像研究物理世界那样,能够获取科学的结果;而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也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就是他最先命名的社会物理学或他后来又改之为的社会学。

在历史上,孔德的上述观点都可以从英国经验哲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关于反形而上学的思想,牛顿就向他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呼吁:“物理,当心形而上学”。⑥至于经验主义鼻祖培根与激进经验主义者休谟则更以反形而上学为终身任务。也正因此,当学者们在探讨实证主义的哲学倾向、知识观以及与科学之关系时,总是把它们与培根和休谟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孔德提倡的研究社会要追随自然科学的方法,霍布斯也曾明确地有过类似的表述。⑦然而,尽管如此,系统地把这些思想综合在

一起,并把它发展为一种哲学则应归功于孔德。

应当说,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其宗旨都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这种宗旨明了、内容统一的哲学,却在本世纪20年代末,在一个曾受日尔曼帝国时期的学术文化影响的地域,经过一些著名学者的培育,使老根长出新芽,又几经变种,终使原先的实证主义旧貌难辨,以至于从此之后,为辨识实证主义增添了困难。

二

实证主义的新种(国内有的学者称之为第二代实证主义)是在30年代末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培育成功的。总体来说,这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仍是遵循经验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大法是:知识来自于对可感现象界的认识,任何知识的产生都应完全归于可证实的经验。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要以对概念意义的逻辑分析加以补充,而这种补充则是区别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根本标识,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称如此学说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一新种名称并不是单一和恒定不变的,其内容经过了重大的改变。逻辑实证主义之名由费格尔(H·Feigl)于1930年首先提出。1936年后,赖欣巴赫(H·Reichenbach)、费格尔等人又改之为逻辑经验主义。^⑧这种名称的变换由它的内容变化所致,因为这种新种的实证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到物理主义(physicism)的转变。

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开始时追求的是所谓现象主义。信仰如此学说的人坚持认为,知识的唯一源泉是经验,一种来自于人类感官获取信息的经验;他们同时相信,哲学的任务仅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寻求有意义的命题。关于经验和知识的准则,无论是石里克(M·Schlick),还是卡尔纳普(R·Carnap)、魏斯曼(F·Weismann),他们都坚持认为“可证实性原则(principle of verifiability)”,即一切有意义的命题,真正的知

识,必须首先在逻辑上确保构成命题成分的可观察性。反之,任何不可观察命题都是无意义的。依据这种原则,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当然无法容身。但同时“由于它过分简单化,以致对科学语言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不仅把形而上学语句排除出去,而且也把某些具有事实意义的科学语句排除出去”。^⑨这种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过分狭窄的限制,很快受到众多人的反对。然而,真正使现象主义发生变革的原因还是它那强调个人经验的直接性。在现象主义者看来,知识的真正来源是个人的直接感知。“什么东西都可以怀疑,但是,最低限度,我们某些直接经验是可以绝对肯定的”。^⑩以“我的感官”去证实“我所相信的知识”,这当然可以增加“我”对知识的确信度(degree of validity),然而,由于“我”是个人,个人所信服的经验知识未必他人也如此。换句话说,现象主义所推崇的知识观,充其量只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唯我主义的、主观性的经验,而缺乏客观性的标准。而知识,包括科学,首先一条准则就是它的客观性。

为了克服现象主义唯我论的主观性,纽拉特(O·Neurath)和卡尔纳普率先提出基本命题的主观相容性(intersubjectivity)参考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所谓的物理主义(physicism)。事实上,并不是每个维也纳小组的成员都同意“物理主义”所涵盖的内容,如作为该小组的主要干将之一的石里克就从不接受如此观点。但如从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这种发展、变化对后来的影响来看,“物理主义”确是值得重视因而必须加以讨论的。

与现象主义相比,“物理主义”最基本的准则是科学语言应以物理语言为基础。物理语言基本属性不是由个人经验之所得,由个人而产生;它是一种“个人—集体”性质的产物。“鬼、神”之类的概念在实践上当然可被现象主义所排斥,但在理论上仍有存在的余地。因为,既然知识源于个人,那么,个人所描述自身经验是否真假则无法得以验证。物理主义则不同,经验是否真实不是由个人主观感觉去证实,而有“物理东西”作为证实

的参照物。桌子是一物理实体。它可能对不同主体个人有引起经验上的差异,但桌子在不同单个主体间产生的感觉、经验总有共同的内容。这些共同的内容可以抽象为概念,可以成为人类以语言交往的符号。诚然,物理主义对感觉、经验、知识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在本体论上归为作为“第一因”存在的客观物质,但在认识论上它则改变了现象主义的“唯我主义”,而强调“主观相容性”。从现象主义转为物理主义,如同普金豪恩所言,“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有意义性的转变”,以致于在本体论上迈向实在主义(realism)。^①由此可以看出,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固然在很多内容上与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有相同之处,但在对概念需求的有意义性的分析、科学研究和知识获取必须要进行严格的证实方可接受等方面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有必要提出的是,维也纳小组培育出的实证主义不仅反对德国的那种绝对唯心主义和沉思性的形而上学,而且还对社会理论研究中的所谓终极价值问题提出激进性的否定回答。在德国学术史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学者们如文德尔班(W·Windelband)、李凯尔特(H·Rickert)、狄尔泰(W·Dilthey)等参与了一场原在经济学领域,后扩展到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门类的科学研究方法论(methodenstreit),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werturteilsstreit)问题的大争论。详细地论述这场争论需要一篇专门性的文章。笔者这里仅想说明的是,这场关于方法论和价值判断问题的争论,尽管诱发出许多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但事实上,学者们提出的问题远大于他们已解决的。例如科学是否能够视为统一体;自然科学和狄尔泰提出的人文科学或译之为社会科学或道德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是否遵循同一的方法论原则等。就价值问题的讨论而言,韦伯(M·Weber)的所谓“价值自由”思想受到了讨论者的重视,但那时(事实上,也包括今天)的众多学者并不认为他的观点回答了该问题的实质。无论对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

家来说,价值问题始终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又很难以经验的方法来实施。因此,这对崇尚经验论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对此处理的方法是:所谓终极价值问题乃是个无意义(meaningless)的问题。而如此回答,显然又有别于法国的实证主义思想。

三

3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世界形势、希特勒的政治迫害以及其他的原因,“维也纳小组”不得不彻底解体,其骨干分子或死亡,或外流于他国,一些外流到了美国。于是,实证主义在美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又得以新的发展,而且在40~50年代,通过一大批社会科学理论家、方法论学家、研究者的努力和改造,最终又产生出一种所谓实用性的,或按布利安特的术语,称之为操作性的实证主义(instrumental positivism),^②从而使之在运用上进入了最兴旺的时期。这种新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实证主义,时至今日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实证主义在美国之所以得以发扬光大,“深入人心”,原因有三。原因之一是美国向有倡导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这一点可从唯一可视为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之性质看出。原因之二是美国文化传统的主导精神是实用——积极地转化理论为研究实际问题服务,而且只要为着科学研究的需要,一切可行的方法都可合而用之。原因之三是辅助性的研究工具,尤其是电脑的迅速普及,各种统计程序性的软件大量涌现,从而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必须进行的技术性操作。

如同美国文化虽受到西欧文化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毕竟有自己的特色一样,美国式实证主义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其总体精神仍是注重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去除主观性。从它的诞生、成长历史来说,它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其中坚力量并不是那些

以哲学为专业的学者,而是一大批社会科学方法论家和研究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众多的美国学者一直以来是无多大兴趣去讨论那些纯理论、纯哲学的,他们更感兴趣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且总是与哲学家保持一定的距离。诚如布利安特所说,美国的理论家和实际研究工作者常是各行其是,各自做不同的事。^⑬因此,美国式的实证主义的诞生、成长,与其说是哲学家的功绩,毋宁说是由社会科学方法论家和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社会学向来被认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最主要的学科。而美国式的实证主义的诞生、成长情况在社会学领域里也表现得最为明显。自30年代后期始,在那些受英国实证主义(如斯宾塞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提倡的那种需要严格实证的方法论原则无疑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同时认为,并以研究实践去证明,实证主义方法论与行动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提倡的方法论合而用之,不是相互抵牾,而是并行不悖。虽然如此观念在其流行过程中也不时地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社会科学研究者心中的主导地位。

定量法(quantitative research)是这种方法论具体化的直接产物,这从定量研究所倡导的发现知识依靠归纳法,检验理论运用“假设—演绎”的(hypothetico-deductive)模式可以说明。^⑭这种求知和检验理论的模式不仅为实践性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而且提供了一套可以操作的研究程序。例如,对于一个信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研究者来说,下面的三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研究数据要能被世界上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认可。这就是说,一个研究者所获取的研究数据、资料必须有其合法性,能被其他的研究者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可同性质地获取。表现于研究实践,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他们的行动应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

验性的数据。失去这一点,整个研究也就失去其科学性。第二步,依据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去建立假设(或理论);而且要遵循假设—演绎的检验逻辑,让这假设接受严格检验。第三步,依据检验后的假设性质去构建一个理论或理论性的结论,以便让这种理论或理论性的结论对原先所研究的问题给以合理性的解释,对所研究问题中关于“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作出合理性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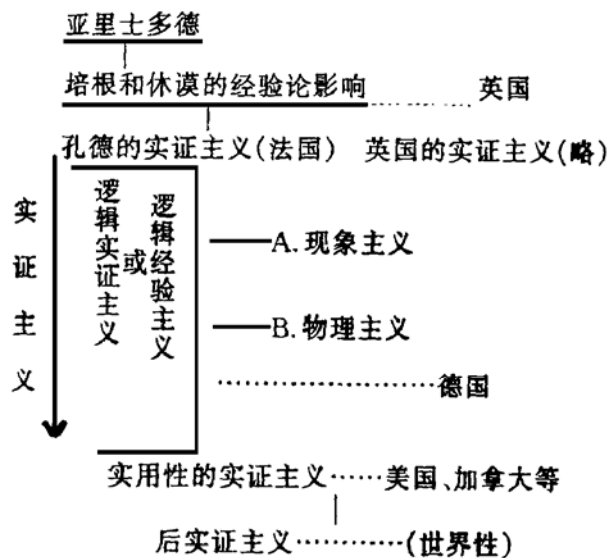
自实证主义在美国生根之后直至70年代初,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说是独领风骚。甚至到了70年代之后的“方法论大战”期间,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定量研究仍是主潮(但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了)。以教育研究为例,直到80年代末,以定量法研究而完成的硕士、博士论文仍是主要倾向。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现象学(phenomenology)、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等学派的冲击,那种在方法论上要求实证,在研究方法上以调查加统计为主要手段的实证主义范式(paradigm)面临极大的危机。而伴随这种危机出现的情况则是在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里掀起的一场“方法论大战”,即定量法与定性法(qualitative research)的争吵。

如果说这场大战发起于70年代,那么,整个80年代则是双方交战最激烈的时期,而到90年代初,交战双方虽不能说完全偃旗息鼓,但局势基本明朗:双方求同存异,趋于以所谓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作为标识的统一。详细地叙述这场“战争”不是本文的宗旨。笔者在这里仅想陈述的是:为什么方法论研究的后实证主义得以产生,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后实证主义所涵盖的主要内容。从90年代初双方争论的情况来看,表现在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众多学者,一方面不满于那种明显地倾向于人文研究(human studies)的范式,因为它的主观性和研究过程中需求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又反

对那种教条性的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唯一科学性的方法论原则,即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共同的规律,分享共同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在一些相信定性方法论的学者们看来,并非所有种类的定性研究都是人文性的(humanistic)。相反,如在社会现象学、符合互动主义指导下的定性研究,只要研究者严格地按其方法论的要求去实施,其结果也是科学的。因此,如果“positive”一词包含“实证的”、“相对的”、“准确的”等内容,那么,他们并不反对使用“positive”一词。于是,一个业已形成并已流行于美国、如今也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观点是:对众多崇尚定性法研究的人来说,他们同意定量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反对视定量法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因而必然要反对那种唯定量法是科学的实证主义。从现时发展的趋势看,在“寻求研究的结果只要是科学的”共识下,那种业已形成的所谓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思想,即为了科学地研究一个问题,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以多元性的方法论去指导研究实践的观念,已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可。

四

现在让我们以图示法来显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情况,以便更清楚地表现出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不同内容,进而回答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从作为一种哲学派别命名的实证主义到今天作为方法论为主要精神的后实证主义已有近 150 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综观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它的生命胚胎源于英国(虽然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诞生于法国的孔德之手,成长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30 年代后,虽经一些哲学家如奎因的努力,但无论它是作为一种哲学运动,还是作为一种哲学学派的学说都已寿终正寝了。^⑮然而尽管如此,实证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科学精神则依然存在,依然影响着尤其是向有崇尚经验主义传统的一些说英语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以致这种影响有力地促进了现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后实证主义的成长和发展。显而易见,作为哲学的实证主义固然与实证精神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终究有所区别,尤其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如此情况说明,由于众多人在谈及作为一种哲学运动、思潮的实证主义时,往往只在习惯上限定于孔德或者包括英国的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所谓第一代实证主义或经典实证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包括逻辑经验主义,即第二代实证主义),而对其方法论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科学需求,则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明确的界说,这自然容易引起对“实证主义”这一术语的误解。诚然,仅就寻求所谓研究的程序、方法、结论都必须是科学的这一点来说,似乎是实证主义的专利。但事实上,科学实践中“寻求科学”,“寻求经验去支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包括“寻求研究程序、方法、结论都体现出的客观性”的宗旨等,则是众多社会科学家所共同的希冀,也是其他一些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共同追求的。社会科学家如从广义上谈及的所谓“实证的”、“科学的”,其内容所指不仅包括旧实证主义,而且还包括各种新的实证主义学派。因此,仅就研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无视广义和狭义的对“实证主义”的理解,其结果无疑要引起如季登斯那样的抱怨了。

辩证推理模式初探

□王经伦 李 燕

研究辩证推理是建立辩证逻辑科学体系的关键环节,因此辩证推理倍受研究者的关注。但是,与形式逻辑对于推理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辩证逻辑对于推理的研究由于时间短而显得不成熟,尚存在着一些难点和众说纷纭之处。究竟什么是辩证的推理?辩证推理是怎样进行的?这些问题涉及到辩证逻辑的性质,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略抒管见,希望有助于辩证推理的研究。

—

推理有形式方面的问题,也有心理和认识方面的问题。从推理的不同方面着眼,历史上形成了研究推理的两种传统。一种是

逻辑的研究传统,主要从形式方面研究推理。按照这种传统,推理的有效性仅与推理形式有关,而与经验和心理因素无关。另一种是心理学的研究传统,认为推理是心理过程,是从已经获得的信念过渡到新的信念的过程,具体说就是人们以一定的置信度接受前提,进而达到对结论的接受,推理的可靠性由经验和实例确证。G·弗雷格严格区分逻辑与心理,主张清除逻辑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强调逻辑只从形式方面研究推理,他的这一看法对于明确逻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是有贡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推理中没有心理问题。由于推理既是一个使用语言的过程,又是一个心理过程,因此上述两种研究传统是并行不悖的。

① Giddens, A.: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P. 2, 1974.

②⑤⑫⑬ Bryant, C. G. A.: Positiv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③参阅, Anderson, P.: On method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3(2), 1986.

Hitchcock, G. & Hughes, D.: Research and Teacher. London: Routledge, 1989.

④张振东:《中西知识学比较研究》,中华文化书局 1983 年版,第 429 页。也可参阅,欧力同:《孔德的实证哲学辨析》,见《现代外国哲学》卷五,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⑥李步楼:《逻辑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问题

评述》,见《外国哲学》卷七,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⑦⑪ Polkinghorne, D.: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 64.

⑧杜任之、涂纪亮主编:《当代英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⑨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册,商务印书馆,第 71 页。

⑩罗素:《哲学问题》,商务印书馆,第 10 页。

⑭ A. Bryman: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Unwin Hyman, 1988.

⑮ M. 布尔等:实证主义,见《近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资料》,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作者沃野,安徽大学 Mss 研究中心博士(230039)

责任编辑:罗 苹

本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认知科学在推理的心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认知科学强调,人类总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思维的,因而可以说所有的思维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所有的思维过程都包含解题过程。解题的结果是提出方案或得出结论,这就离不开命题的推导。据此又可以说,从心理或认识的角度研究思维就不能不研究推理,问题是如何研究推理。受到认知心理学实验的启发,认知心理学家意识到,对于推理不仅需要研究其形式上的有效性,也需要研究推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他们提出了若干种理论对日常推理实际过程加以说明。有人认为:人们更多的是借助范例和依靠经验进行推理的,很少依据逻辑规则进行思维。例如,内科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方时往往是先回想这个病人与近期诊治过的病人中哪些人的症状相同,然后再想想以前那些有相同症状的病人服药后的疗效怎样。这表明医生在寻找治疗方法时首先不是进行逻辑分析,只是在需要向别人解释自己的方法或自己证明这些方法时才会使用逻辑。也有人认为:推理不是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心理模型基础上的。心理模型代表着事态的结构,从前提得出结论是以心理模型为中介的。例如,让受试者观察 A—B、B—C 这一推理格式,受试者能在较短时间里得出 A 是 C 的结论。而对于 B—A、B—C 这一格式,受试者则要用较长时间才能得出结论。原因就在于前者是明显传递的,容易建立起心理模型,后者的传递性不明显,建立心理模型较困难。持心理模型论的学者强调,推理过程是在人们头脑中进行的,是已知进入未知的重要手段,也是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不研究日常推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就不能说明为什么个体在推理能力上存在差异,而心理模型理论能为个体推理能力的差异性提供解释。掌握同样逻辑规则的人推理能力仍有差别,就因为建立心理模型的能力不同。

综上所述,可以把逻辑学和心理学在研究推理上的区别概括如下:逻辑学对于推理是作规范性的研究,关心的是推理在形式上

的有效性,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应该怎样进行思维。心理学对于推理是作描述性的研究,关心的是推理活动的基础和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思维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

推理是使用语言的过程又是心理过程,同时也是认识的过程。因此,对于推理不仅需要从形式和心理方面进行研究,也需要从认识方面进行研究。辩证逻辑主要是从认识方面研究推理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思维如何获得具体真理,这也属于推理实际上怎样进行的问题。辩证逻辑对于推理的研究同样是描述性的,但是它描述的不是推理的心理过程,而描述推出具体真理的思维过程。

推理的实际过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靠经验进行推理,另一种是借助概念(范畴)进行推理。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以经验为基础的推理过程,这与心理学是一种实验性的科学有关。由于思维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心理学并不忽视概念在推理中的作用,但是其基本着眼点是以经验、实例或原型为基础的推理过程。从认识方面研究并以概念为基础的推理过程属于辩证逻辑的研究范围。辩证逻辑是与辩证法和认识论相一致的,是关于真理的学说,它的主要研究是概念(范畴)的矛盾运动,这一系列特征决定了辩证逻辑是从认识方面研究推理的,所研究的是以概念(范畴)为基础的推理过程。辩证逻辑研究推理的角度和特点表明:辩证推理是建立在概念(范畴)的基础上的,它所概括的是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推理过程,其目的是要获得具体真理。

二

由于辩证逻辑从认识方面研究以概念(范畴)为基础的推理过程,由此规定了辩证推理有以下五种基本类型:

(1)自身否定推理

这种推理是根据矛盾关系而进行的。众所周知,自然界和社会总是处于相互矛盾之中的,世界就是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运动向前发展的。而我们则根据对事物内在

矛盾及其运动、发展进程的认识进行有效推理。其推理过程和步骤是：

1. 分析事物的某一方面特征；
2. 发现其对立面，使矛盾进一步突出；
3. 从矛盾的一方面推出另一方。

在我国道家经典著作《易经》中，很多地方就运用了这种推理。比如，“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损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决”，“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剥，剥也，柔变刚也”，等等。

(2) 中介属性推理

这种推理是以“亦此亦彼”关系为根据的。亦此亦彼是辩证法的一个根本特征，恩格斯说过“辩证法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亦此亦彼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可以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是事物发展中的一种中介状态，既保留了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又坚持其中有统一的灵活性，这就使得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过渡，这个中间环节也是我们应该把握的内容，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很多问题的结论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中介”状态。这种推理模式的具体步骤如下：

1. 找出事物的两个对立面；
2. 寻找达到亦此亦彼的中介状态；
3. 从前提推出中介状态存在的合理性。

如“一国两制”的构想。本来“姓资或姓社”是一个很尖锐对立的问题，如果在国家问题上坚持单一的“姓社”，就会为我们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带来困难。怎么解决制度的转变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把一定时期内两种制度作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使它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从而顺利地解决了香港回归的难题。

(3) 对立互补推理

这种推理的特点是：根据对象的某一属性、关系等寻找或构想出一个或更多的与这一属性、关系等相对立的方面，在对立面的同一中全面认识对象的本质。这是以“对立

同一”概念为基础，从对立达到同一的推理。具体过程和步骤是：

1. 列出对象的某一方面；
2. 找出其对立的方面；
3. 对相互对立的方面进行分析；
4. 推出对立面同一的结论。

例如，爱因斯坦在创立广义相对论时就运用了这种推理。美国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 A·卢森堡认为，爱因斯坦肯定知道从屋顶下落过程中的观测者是处于运动状态的，但是他却由此构想出观测者同时又处于静止状态，这说明爱因斯坦是有意表述出对立面双方同时存在的情况，让这两个对立面在他头脑中同时起作用，最终在更高水平上融合、同一起来，从而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4) 整体解构推理

解构就是“打开”。这种推理的特点是：以整体作为思考对象，依照要素、结构、功能的层次逐步分析整体由哪些要素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怎样，对象整体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表现出什么样的特性和能力，从而在整体上认识对象。这是以“整体”、“部分”、“结构”、“功能”等概念为基础的，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综合的推理。其推理过程和步骤是：

1. 把整体作为致思对象；
2. 分析组成整体的要素；
3. 分析要素之间的联系的方式；
4. 分析对象与环境相互作用；
5. 推出综合了各种分析结果的结论。

如当代研究发展问题的一些学者提出“综合发展观”和“发展的整体论”就运用了这种推理。学者们把发展分析为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人的素质，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多种要素的发展，把发展的指标分析为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克服愚昧、优化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然后分析这些要素和方面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像经济增长可能增加就业，但同时也可能扩大不平等，等等。进而又指出发展是全球的问题，在现代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发展应是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各要素的整体协调发展。

(5) 多层结构辩证推理

这种推理比较复杂,它不单是某一种模式的推理,而可能涵盖了前四种中的任意几种。由于客观对象的矛盾运动发展是无限的,所以人们对事物的相互联系,辩证运动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可以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从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甚至更深层的本质,这种连续思维运动,使我们得出在同一前提的条件下而形成了多层的、全面的结论。

为了便于分析和说明,这里试举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中的论述为例。邓小平所作的“主权属于中国”这一结论的推理前提是: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现在,中国就要正式宣布这个决策”。

根据上述前提,邓小平得出的第一层结论是:“中国必将收回香港,这一决策也有利于英国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

以第一层结论为前提,邓小平接着进行第二层推理:

“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香港

问题。香港要继续保持繁荣,取决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

这是第二层结论,他又以此为前提,继续进行第三层、第四层推理……从而对收复香港的可行性及具体操作过程作了细致分析,给香港回归的前景描画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些设想在后来中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以及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的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这在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辩证思维方法和辩证推理的巨大威力。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2.梁庆寅:《试论辩证思维的推理》,《哲学动态》1996年第8期。
- 3.颜华东:《〈周易〉辩证逻辑思想拾零》,《甘肃理论学刊》1995年第4期。
- 4.李廉:《论从一元前提得出多层结论的辩证推理式》,《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作者王经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510620);李燕,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510275)

责任编辑:罗 苹

近代中国政体模式的转换 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

□ 罗嗣炬 王 鹏

一、体制内分权下的社会嬗变及危机

在鸦片战争中,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了清王朝不愿打开的大门。自此,中国在外部的现代性因子刺激、示范作用下,被动地纳入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由于中国现代化不是自身现代性积累、成熟的自然结果,也没有如西方市民阶级及日本下级武士那样的民间力量来主导现代化,因此,在现代化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国家要充当不自觉的现代化过程的主导者,这就决定了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政体模式必然是集权式。因为强大的抗拒变革的传统力量,往往成为现代化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运用国家权力自上而下来推进现代化,现代化才有可能启动和成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帝国所承袭的历史遗产中,中央集权官僚政体无疑是“最现代”的因素。美国学者洛克伍德指出,在1850年,设使一个外国人被问道:中日两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孰大孰小,他会毫不犹豫地宝押在中国身上。^②原因在于,晚清帝国的中央集权官僚制职能分明、权力集中,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能调控财力、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启动并推进现代化。故此,晚清统治者只需在政体模式的功能上转换,以容纳现代化所需因素,就能现成地用来推进现代化进程。

然而,尽管西方炮舰已迫使中国开放门户,但是,由“中央之国”的理念精致裹包的清廷,没有真正认识到天下“一统之世”已变成“列国并立”之世。上层统治阶级仍如艾森施塔得所说那样,在制度上进行抗拒而不

是适应社会变迁,发展出能容纳新的政治功能的政体。中央集权官僚制因之丧失了其启动现代化的功能。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近20年里,中国人仍然还是用中古式的思想和观念来理解洋夷与中国的关系,并继续以中古式的武器和战术应付未来的冲突。

③

直至19世纪60年代,以太平天国起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契机,一部分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之士才开始理性地思考“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所处的内外危机。尽管他们头脑中以“中国中心”为主轴的“华夷之识”并未根本变化,但不得不承认西洋武力的优越性,由此,以创办军工企业为主、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洋务运动开始的防御性现代化,是为了感应内外危机。就其启动阶段所需的政权力量而言,中国早期现代化不是由国家政权导引的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全国性运动,而是由中央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由地方领袖及实力派人物“集权”启动,利用他们所控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推进现代化。一言蔽之,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依靠“体制内分权”驱动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早期现代化既没有被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提倡,也没有成为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问题的。^④因而在艰难的现代化起步之初,实际工作多由地方进行。这样,较为富庶的省区如广东、江苏,较为干练的地方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就得以脱颖而出。其他地方领袖亦纷纷仿效李鸿章、

张之洞所推行的现代化。

体制内分权下的现代化不仅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让开风气之先河的地方实力派“集权”推进现代化,而且还意味着现代化必须在体制内进行。体现在指导思想上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这表明现代化的努力只能是原有体制的补充,目的是维护传统体制。因此,体制内分权驱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能威胁到原体制的生存与发展。事实也如此,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确是在体制内获致发展。当时,一般士绅与庶民仍然在政治上认同这个政权,士绅知识分子与统治精英之间,在通过自强运动来实现增强国力的目标上,并没有出现重大的认同危机。^⑤

然而,体制内分权发展模式内在矛盾在于:一个由王朝垄断统治的传统政体要控制一个日益分化、功能多样化及异质性增强的向现代过渡的社会。由于现代化不是由王权威望下的国家政权所推导,既没有像日本那样把学习西方走西方式国家发展道路、兴办新式企业、推进一系列改革作为国策来实行,更没有像他们那样围绕这个目的的实现,制定和实行一系列法律规章和制度。^⑥因此,体制内分权下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处于权力分散状态和地方割据的松散活动。这样,现代化反过来形成对体制的挑战,使体制内控制发展越来越不可能。这些地方独立性的发展削弱了一切可能对现代化有利的政治条件,使现代化失去了中央政府的协调和指导。清末的督抚大多为本省的利益而忽略国家的发展计划,带来的消极性后果就是因分权化与地方自主性增强的趋向松动了原来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而握有由中央让渡的部分军、政、财大权的地方领袖,由于军队率先开始现代化,经过改良的装备和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使得他们比起其他民间社会力量及散处于各地的士绅们,在体制内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势坐大形成对旧体制的严峻挑战。

此外,30多年的体制内分权发展,一批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产生,为传统经济结构注入了新的成分。随之而生的工

业无产阶级和早期资本家阶级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分化,因此,内部现代性的生长形成了对旧体制的挑战。因为权力与资源分散在地方及民间,培育了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出现了独立于政治社会以外的经济领域和社会活动空间。一些民间团体组织如工商业会社、近代秘密会社及政党、民间准军事性质的新式社团组织,以及容纳新知识群体的学会等团体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独立社会活动空间已呈现出较宽阔的领域;而一次次外来侵略所激活的民族主义,糅合着通商口岸的资本主义精神,刺激了社会精英及其他政党、团体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们力求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制度。这些极大地冲击着旧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由此看到,体制内分权下的现代化既导致了传统社会嬗变,又引起了旧制度的危机。

二、晚清帝国政体模式转换的努力与失败

尽管中国早期现代化走的是体制内分权发展的道路,政府作用并不是积极有为,但由于地方势力的坐大,内外现代性的刺激及民族主义所激活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成了对旧制度的挑战,因此制度上改革尤其是政体模式转换决定现代化成败在中日甲午战后形成共识。

后进国家现代化发展逻辑表明:政府不仅要直接介入现代化进程,并往往成为现代化最主要的推进者,所以政治现代化必不可少。

在内涵上,政治现代化包括两大命题,就国家而言,现代化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增长,政治体系能力的提高;就社会而言,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力量的增长,它对政治体系的参与和影响的扩大,这主要表现为民主化。^⑦因此政治现代化实质上是行政上中央集权与政治上民主化的有机结合,即如亨廷顿所说,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在权威的合理化、政治机构的职能分化及参政的扩大化。由此,政治现代化要求必须建立集权民主型政体。在内外现代性诱致下,晚清帝国政体模式的转换,其目标政体无疑是集权民主型政体。况且这种政体,无论是民主共和制,

还是君主立宪制,一方面是政府具有较高的动员和协调能力,从而具有较高的效率,另一方面能较容易地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正。

⑧

晚清政体模式转换的总体思路是把君主立宪政体作为目标模式,以中央集权方式重建单一制国家。因为除了内外现代性因素的诱导外,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体制内分权发展业已造成地方主义盛行,地方上的督抚,中央已很难控制,中央政府权威严重丧失,时人看到“乃观于吾国政府,朝发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顾也;夕下一谕曰,宜以此为戒,外省依然如故也;查询事件,则迟迟不复,提拨款项则藉词抵抗。”^⑨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散化倾向,各地之间充斥着“畛域之念”、“彼此之心”,反过来又阻碍着现代化的发展。这就决定了政体模式转换的目标之一就是恢复和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权威,以削弱地方离心势力。这表明:君主立宪制作为目标政体,必须既能满足现代性要求的政治民主化,又能提供为恢复一个结构完整、有效的权力体系所需的行政集权。此外,立宪政体的迷人之处还在于“虚君共和”,王权虽然有限,但皇帝仍可作为国家元首,从而永保皇位。

这样,百日维新运动及清末新政开始了晚清政体模式的转换。二者均是企图以传统政治权威的合理性为基础,在保持现存秩序延续性、稳定性前提下,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实现传统政体模式的转换。

百日维新运动本是借用皇权威望自上而下“托古改制”,以期实现政体模式转换。由于改革派经验不足,依靠并无多少实力、威信 的皇帝,在政纲中拒绝联合传统派,策略上以“快变、大变、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过早地与皇权实力人物慈禧及顽固守旧派决裂,致使改革失败,政体模式的转换遭受挫折,但其基本内容包括政体模式转换目标——君主立宪,却在清末新政中保留了下来。

从1906年起,晚清政府接过“立宪”的旗帜,强化中央集权,实行政治改革。根据三权分立原则,重新厘定中央及地方官制,

设立责任内阁制,一改以前中央政府机关政出多头,权力分散状况。1907年7月提出厘定地方官制,依三权分立政治原则,将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归中央的陆军部与度支部,打破了历来督抚专制独裁的局面。同年9月,以明升暗降方式,调张之洞、袁世凯到中央军机处,以消除中央集权之障碍。

与官制改革的同时,政治民主化的一些举措是资政院、咨议局的成立和《钦定宪法大纲》及《宪法重要信条》的颁布。中央资政院及地方咨议局成为地方士绅及立宪派等社会势力参政的中介机构。《钦定宪法大纲》虽然规定了“万世一系”大清帝国皇帝,“君上神圣不可侵犯”等一系列大权,但同时也规定“居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臣民在法律范围内拥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自由。

尽管清政府无意于政治民主化,但在“假立宪中有真改革”。依君主立宪之政治规则实行政体模式转换,从政治现代化角度而言,无论其初衷如何、程度如何、效果如何,都有其进步性。因为皇权的至高无上被纳入宪法框架加以限制,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政体中确立三权分立原则、承认民权的存在,无疑是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极大冲击。而从后进国家现代化所需的政治前提而言,行政集权能保证一个权威有效的中央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积极有为。因此,通过改革使晚清政体模式转换无疑具有合理性。然而问题在于清末新政却招致革命,政体模式转换半途而废。

一般而言,通过改革实现政体模式转换由于是在原政体上根据目标政体原则进行的一种人为置换过程,因此,政体模式转换的前提条件是原政体中中央权力必须巩固。而权力的巩固往往取决于官吏和军队的服从与支持,因为任何权威有效的合法政体均需依靠官吏和军队这两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价值观统一,在政治体系中通过科层官僚体制向上级负责的队伍,运用政治强制、政治动员以及其它手段,能有效地调控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使中央政府成为民族

聚合的中心,使国家获得稳定而持久的发展。而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央政府,却不具备这些条件。

首先,军权没有统一。一支忠诚的、有效的和集中指挥的军队,能阻止政体模式转换过程中的任何反抗行为。尽管晚清帝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军队现代化,但由于军权下移给地方督抚,军队由地方领袖建制兼具私人色彩。直到清末,“清帝国再也没有能重新获得对全国所有军队的集中控制。”^⑩

其次,缺乏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官僚体制。清廷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在18世纪之后,由于人口的剧增,法定的政府公职的数额和科举名额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致使体制吸纳机制——科举制选官,造成很多体制外没有功名的士绅。据张仲礼先生的估计,在19世纪,体制外士绅约有100——200万人。到1905年,科举制被彻底废除,政府与士绅联系的纽带被中断,士绅阶层急剧分化,并与皇权渐次疏远,成为晚清帝国的一支反叛力量。而体制内官僚对新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认识,甚至持反对态度,以致许多新政措施在他们手中变了样,一些本来是“益民之举”,到头来反而成了“抗民之举”。^⑪

最后,晚清帝国还缺乏可调控的资源。任何政府权力必须有相应的资源基础,因为权力影响的大小取决于所控资源的多与寡。而体制内分权发展造成权力与资源的下移,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资源基础,晚清帝国的财政危机即是体现。在内外债催逼下,清廷几无可调控的资源用于新政事业。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清政府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不断出卖路矿权而引起的保路运动。因此中央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带来现代化建设所需的权威,反而导致各种反清力量的迅速集结,辛亥革命的爆发,也就意味着由一个实力不足、权威不够的中央政府企图通过改革实现政体模式的转换只能失败。

三、辛亥革命后政体模式转换的两难及其失败

与任何一次招致王朝更替的起义、内乱

及宫廷政变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导致了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制度的根本性转型。体现在政治文化中,“民权”取代了“王权”,民权理论取代了天命说作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因此辛亥革命后政体模式的转换不可能再如晚清帝国那样,借用传统政治权威,保持既定秩序延续性前提下实现政体模式转换。不过,以集权民主型政体作为政体转换的目标模式,辛亥革命后并没有改变,并且,在政体模式的取舍上,辛亥革命后选择了走美国式道路建立联邦制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后政体模式的转换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一是袁世凯北京政府时期。前后两阶段尽管在性质上、方法上均有不同,但都是沿着中央集权的思路,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政体模式的转换。

南京临时政府在政体模式的设计上是美国联邦制精神的产物。1911年12月7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实行总统制的政府体制。临时大总统有统治全国、统率海陆军之权。孙中山在就职声明中便明白说明临时中央政府是建立在各省平等联合的基础上,他说:“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成伪立宪之术,今日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⑫

无论是针对革命后政治秩序的无政府状态要求统一的趋势,还是单就联邦制政体本身,中央集权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实践表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有了联邦制框架,名义上也建立了中央,但这种中央政权权力作用的范围极为有限,社会的大部分并不受中央政权的支配。正如日本政治家佐原笃介致函朱尔典所说:“南京的共和政体根本不稳定,它没有固定财政来源,也不能控制其治下各省的财政,事实上,各省自行其是,也不希望有什么中央政府。”^⑬在对军队的控制上,南京临时政府同样表现出无力。“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力量并没有被完全调动

起来,以此全力以赴地夺取最后的胜利,事实上,大部分革命力量并非完全听命于革命领袖。”^⑭因此,南京临时政府要控制已成强势的军阀力量相当困难,更谈不上用中央集权和政治权威去削弱已成割据之势的各种派系的力量。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这一事实表明,南京临时政府向现代政体模式转换并未实现。

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政府的政体模式转换有两个阶段:二次革命前,以中央集权方式,在《临时约法》框架内企图实现国家统一,建立联邦制民主共和政体;二次革命后则以个人专制方式,复辟王纲,妄图建立单一制立宪君主专制政体,最后都失败了。

从1912年7月至1913年1月,北京政府先后颁布过三个统一省制议案,体现了联邦制精神。三个议案均强调:“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中央政府有军权、外交、司法之权,其余之权则归各省。”^⑮或是“中央权限为司法、国防、外交、交通、财政等,地方权限为内政、警政、教育、实业、地方财政等。”^⑯但由于前提条件是军民分治,削弱地方督抚权力,故三个议案在国务院均遭否决,以后袁世凯所提中央统一财权、兵权等议案也是如此命运。

客观说来,二次革命前的袁世凯大体上还能在《约法》内,依责任内阁制游戏规则“合法”行动。对于任何一个政体而言,政府运转的前提首先是获得统治权,而不是自开始就去限制和分散权力。美国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指出:“要人民参政,政府先必须具有能力,如果没有办事的方法,参与办事也就毫无意义。”^⑰众所周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了约束袁世凯,在《临时约法》中规定,“政府应采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并非实际的行政首长,而只是依惯例居于国家的元首。”开创了因人立法的先例。

可是,责任内阁制实行的结果却是漫无休止的竞争,接连不断的内讧,此起彼伏的内阁危机。“自共和以来,立国两年政府不能统一。”^⑱地方仍旧各自为政,“政府号令不出京门,派命吏则明拒之,实行法令则笑置之,赋税一无所入,明为学美、法之共和政

体,实为无政府耳。”^⑲

二次革命的爆发,不但意味着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开始,而且还表明自清末新政以来,以资产阶级集权民主型政体作为目标模式的政体转换失败了。究其原因,多数学者从政治生态学角度认为,辛亥革命后向现代政体转换是“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的生搬硬套。其实,辛亥革命后,政体模式转换的失败并非“淮桔成枳”所致,也非因无相应的生长条件。而是自晚清以降,人们由对集权专制君主政体的逆反心理,发展为对集权主义的排斥与拒绝,进而将行政集权与政治民主截然对立,把行政上的中央集权等同于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将地方分权等同于政治民主。浑然不知单一制现代政体亦允许行政上的分权,联邦制现代政体与中央集权并行不悖。这是辛亥革命后政体转换失败的关键因素。

前面已述,无论是就辛亥革命后政治秩序要求国家统一,还是就联邦制本身需要而言,中央集权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况且,在政治理念上,集权既可与专制相生,也可与民主相容,分权亦然。^⑳可是,政治认知上集权与民主的相互排斥,导致了辛亥革命后政体转换过程中集权与民主的两难: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必须破除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等同专制独裁。然而,破除中央集权,政治整合也就无法实现。并且,随着地方分离主义的强进生长,国家不能统一,政治民主化也因没有国家的提倡与保障而无法实行。

这样我们看到:在二次革命前,联邦制被督抚用来维持各省的自主权,成了抵制中央权力渗透的合法借口,从而反对任何集权行为。在政治领域,政党之间互不统服、相互倾轧;议会内部派系争雄、各不相让,社会动乱因之频仍不息。故此,“中国人民之大苦,曰无自由,中国人民之大弊,曰无秩序。”^㉑“共和以来,兵变之事,纸不胜书,而兵与兵争,将与将争,尤更仆难数。”^㉒在二次革命后,集权与民主的两难则使袁世凯走向另一个极端。袁世凯认为,议会政治使政府缺乏效能,国家不能整合社会是政治民主所

致。因此,国家要强固有力,只有实行集权专制,压制政治民主。这样集权专制政体便成了二次革命后政体转换的目标模式。

尽管集权专制在推进国家统一上有其合理性,但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以集权专制来重建中央权威,无疑是非法之举。正如康有为所说“既名共和制总统,则专制非义也,终不能得民心。”^{②③}由此,袁世凯陷入了合理而不合法的困境。

由于在政治认知上行政集权等同政治专政,从而导致中央集权的不合法,因此中央权力向地方渗透而被抵制,袁世凯的集权政策自然归于失败,各项政策实行的结果,“不但无裨于集权,而且分权益甚……集权政策将因之顿挫,分权势力将因之膨胀。”^④

而以政治专政重塑国家权威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袁世凯更是找不到合法的理论纲领和政治文化来阐释其一切的合理性。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的政治传统是政治文化的传统,一切政治势力在政治生活中所采取的行动以“有道无道”作为判断的标准。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的袁世凯为使其行政集权、政治专制行为合符道统:既合理,又合法,便不惜铤而走险,以恢复帝制,靠王权威望来解决他面临的困境。孰不知以不合法的帝制来重构合法的政治秩序,结果却是更深刻的权威危机。

至此,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秩序上,孙中山和袁世凯试图从不同的途径来实现政体模式的转换,但都没有成功。此后,中国便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政体模式的转换仍在进行。新旧军阀政体包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政府,蒋介石统治的南京政府。尽管在政体形式上,统治的范围及政府的有效性、合法性各有不同,但在本质上均属分权专制政体。国家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央政权徒有虚名,地方割据,各自为政;政治上实行专制统治,封闭参政渠道,压抑社会民主力量的增长。由于完全背逆政治现代化内在要求,分权专制政体最终成为

革命的对象退出历史舞台。

①罗荣渠:《传统与中国的现代化》,载《天涯》1997年第2期。

②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55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③⑤转引自《萧功秦集》,第213、21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④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92、9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⑥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第10页,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⑦⑰桂勇:《政治现代化:国家力量的增长与强化》,载于《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期。

⑧⑳孙立平:《集权、民主与政治现代化》,载《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3期。

⑨转引自章开沅、罗福惠主编:《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第41—4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⑪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第2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⑫《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

⑬《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864—866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⑭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第2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⑮⑯转引自李继锋:《民国初年的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争》,载于《民国研究》,第二辑。

⑰⑱⑳《康有为政论集》下,第874、88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㉑㉒《戴季陶集》,第310、31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㉓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第278、2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罗嗣炬,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200062)

王 鹏,同济大学社科系(200092)

责任编辑:郭秀文

试论帝党与维新运动的兴起

□王亚芳

在戊戌变法时期发挥作用的多种政治力量中,帝党是十分重要的一支。从维新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看,没有帝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在守旧势力盈朝,维新派势小力微的情况下,变法运动的迅速兴起乃至“百日维新”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

—

帝党产生于光绪亲政之初。光绪十五年德宗大婚,慈禧始归政居颐和园,然一切用人行政,皆出于慈禧之手,军国紧要事件必仰承懿旨办理。对此,怀有重振朝纲抱负的光绪帝是颇为不满的。为了摆脱慈禧控制,光绪帝开始网络自己的力量,“因见各大臣皆不听号令,要擢一二通才以资驰驱”,^①帝傅翁同和受到了特别恩宠。翁同和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和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政治上专权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和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关于帝党的具体阵营,向来没有定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德宗虽亲政,实未敢私用一人,其势已孤矣,唯翁同和以东宫旧恩,极力保护,汪鸣銮与同和同乡,相亲昵,张謇出同和之门,志锐为珍妃亲兄,文廷式与志锐为旧交。数人相比,虽公私不同,皆以保皇自任,附之者只贝勒载澍、户部长麟而已,余皆孝钦耳目也。”^②胡思敬所述只是帝党初期的情况,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随

着形势和政局的变化,帝党的阵营也是变化的。

甲午战争之前的帝后党争,基本上只是权力之争。至中日甲午战事渐起,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政见分歧才逐渐明朗起来。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已经箭拔弩张,一触即发。李鸿章却奉慈禧太后旨意竭力避战,幻想通过第三国的“调停”和平解决争端。直到光绪帝严旨切责,李才不得不派少数部队赴朝,并作些局部战争布置。与李鸿章不同,以翁同和为代表的帝党是秉承光绪的意旨,坚持主张一战的,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其一,日本入侵朝鲜之始,他们就提出了“绝不可失朝鲜”,要与日本“势所必争”的对策,对日本侵略严密注视。当发觉日本“有开衅之心”时,他们立即奏请“急治军旅,力敌势均”,以使日“有所惮,不敢猝发。”^③

其二,多方筹划战守方案。甲午事起后,翁同和和李鸿藻入主枢府会议,翁同和虽参与枢机,但无力改变后党把持的局面。为推行其主战主张,并改变枢府的既成格局,只有发动清议之一途。在翁同和、汪鸣銮、文廷武、张謇、志锐等人的发动下,台馆诸人屡上封事,痛切陈词,言战不遗余力。光绪亦“欲得外廷诸臣协力言之”^④以推动局面。帝党在日夜筹划之中,先后提出了慎选将领、扩充兵力、筹备粮饷、暂停庆典、起用湘军、调动南洋、粤洋水师、加强南洋及台湾防务等项方案。张謇在致翁同和信中还提出了派海军游弋中国、朝鲜、日本间,伺隙进攻,使日本“不敢分兵扰我边海”^⑤及“请明发谕旨、对日宣战的设想。”^⑥

其三,联翩上奏分析形势,制造舆论,力陈对日一战的必要性。帝党官僚上书奏请“皇上宸衷独断,速飭北洋大臣李鸿章厚集兵力……克期进发,迅赴事机”;参孙毓汶因循,劾李鸿章疲顽,责斥叶志超等“首鼠不前,意存观望。”^⑦同时指斥慈禧:“狃于庆典不开边衅……将朝鲜八道拱手授之他人”。^⑧翁同和在“详议军事”会议上,和李鸿藻一道与孙毓汶等人展开了面对面的争论,指责主和派。

甲午战争爆发后,帝后两党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帝党不仅在战略上主张进攻,先发制人,而且还提出了“用庆典之款为军费以振军心”^⑨等建议。为了坚持对日作战,帝党作了极大努力。首先,集矢攻击后党所依靠的淮军首领李鸿章。7月底,张謇建议严惩李鸿章。8月中旬以后,随着战局的恶化,翁同和、沈曾桐、丁立钧、黄绍箕、文廷式、张謇等频频密议,由志锐出面,以李鸿章“衰病侵寻情形甚为可虑”为由,奏请“简派重臣至津誓师,就便查看李鸿章衰病情形”,^⑩同时帝党要求撤换淮系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群议沸腾,战火延入东北边境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发出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及“交部严加议处”^⑪的处罚上谕。其次,对于后党的议和活动,帝党首先采取的对策是起用奕訢。早在8月3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即奏请起用奕訢,以“原折留中”而无结果。平壤战后,帝党要求起用奕訢之心更切,认为此举是挽救时局的关键所在。在光绪和帝党的内外配合下,奕訢被起用。帝党期望“扭转乾坤”的奕訢,起用后不仅无所作为,而且与李鸿章沆瀣一气,使帝党在主战的道路上又增添了障碍。之后帝党又想借助英德以抗日本。10月6日,文廷式约翰林院同仁赴谢公祠,商议“递联封奏,阻款议及邀英人助顺”。^⑫同时礼部右侍郎志锐也上折奏“请连英抗倭,欲以三千万饵之”。^⑬

帝党虽不能阻止后党乞和,但其不合作的态度却成为后党乞和障碍。奕訢等人决定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赴日,翁同和以“未过问”表示消极对抗。美使田贝出

面劝和,光绪亦不谓然,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对乞和活动的处处抵制,使慈禧大为光火,此后数日慈禧黜二妃,杀内监,斥文廷式、志锐,把打击的目标指向光绪帝本人。对于慈禧的处置,光绪不敢公开抗争,还装出一种“意极坦坦”的样子。但是,这些却引起帝党和接近帝党官员的极大不平。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首先上折抗斥前日懿旨,慈禧见折大怒,后在大臣劝说下始压下怒火,谕曰:“姑以汝等请,后再有论列者,宜加惩创;否则,门户党援之习成矣”。

由上可见,帝后两党在对日态度上是格格不入的。帝党的主战表现了他们对国家屡遭外敌侵略欺侮深感愤恨和耻辱的情绪,显示了他们欲以强硬的态度来维护社稷江山及各种民族权益的决心。这种政见与当时正在酝酿着的维新思潮在对列强的基本态度上有许多共同之点。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前后凡三十年的洋务活动,因此而成为民族反思的矢的。刘光第就曾指出:日本早就企图侵略中国,“蓄之一、二十年,我国毫无预备,铅药全无,海军武备尽用贪懦之人,所费巨款尽以报效颐和园及闾宦、军机。现在危迫,各省京官纷纷出京,几于十室九空”。即使将来屈于讲和,“则亦不过图旦夕苟延,将来祸患,方未艾也”。^⑭这种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及在政治上有所改革的思想,似乎已经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于是在1895年至1898年这四年中,无论是当权或不当权的帝党官僚,均有条陈“新政”奏疏。在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变法行将出台之际,这种舆论是顺应时序的。可见,在维新运动正式兴起之前,帝党已初步具备了与维新派合作的思想基础。

二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瓜分危机。在此危局刺激下,中国士大夫阶层迅速觉醒,全国性的变法维新运动正式兴起,至百日维新前多次形成热潮。在这一过程中,帝党开始与维新派建立起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对维新运动起了支持、参

与和保护等积极作用。

甲午战后帝党的政见由原来的主战发展为变法,是他们得以与维新派合作的思想基础。甲午之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惨败于小小的日本,使帝党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们从痛苦、屈辱和牺牲中看到了以往统治的衰象与弊端,加深了对日本自强成功的认识,“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⑮张元济就曾说“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⑯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光绪帝发布了一道上谕,坦陈中国积弱之深,无力与日抗争之事实,鼓励“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举革”,^⑰以期收自强之效。谕旨颁发后,臣工纷纷上奏章,递条陈,为变法出谋划策。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帝颁布了另一道旨在切实推行变法的上谕,指出:“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祸患”。^⑱这一上谕提出的变法思想,与后来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有相通之处。光绪的变法之诏,实际上是奏响了变法的序曲。

光绪帝的转变,与以翁同和为中坚的帝党官僚倾向变法息息相关。翁是培养光绪帝20多年的帝傅,是唯一能与光绪帝朝夕相处,“造膝独对”的近臣,时官拜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朝廷重臣。甲午战后,随着危机的加深,翁同和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变革意识,日读变法之书,对于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如陈炽的《庸书》、汤震的《危言》等,除了自己认真研究外,还专门将它们进呈御览,希望光绪也能从中得到启发。翁氏而外,总署大臣张荫桓为鼓吹革新另一得力之人。张氏流外官致身卿贰,没有正途出身文官所特有的迂腐与偏见。1885年出使美洲,既得风气之先,“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启诱圣聪,多赖其力”。

在光绪帝思想发生变化的同时,一些帝党官僚在岌岌可危的国势面前,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维新派的影响,开始接受维新派的变

法主张。仓场侍郎李端棻同梁启超有姻亲关系,受梁影响较大,“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中西”,尤好言学。^⑲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他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学习,并建藏书院、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认为若以学堂、书局为经,以此五项为纬,则“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除”。^⑳御史宋伯鲁自甲午战后,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加之受维新思想的影响,痛切地感到不改变旧法,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一面疏请变通科场旧制,一面建议出使各国大臣博采精择,推荐国回,以便沟便中西,开扩见闻,使“迂疏之义士皆化为有用之才”。^㉑其余军机章京陈炽、侍读学生文廷式、郎中沈曾植都提倡西学,鼓吹变法,颇受时人注目。正是因为帝党本身有了比较急切的变法要求,所以他们对大声疾呼朝廷变法图存的维新派能产生共鸣,多方与之呼应配合。

帝党与维新派的合作首先表现在对其上书上奏的重视。1895年6月,正当光绪帝发愤厉行改革之时,他看到了6月3日都察院代递的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此是康有为戊戌前五次上书中唯一上达御览的一次,“上览而喜之”,“旋发下军机,命即日抄四份,军机本无书手,乃调自内阁,即日抄呈,以一呈太后,以一存军机,发各省督抚军议,以一存勤政殿备览观”。^㉒7月5日又颁发上谕,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奏人才。接着又从康有为等人奏折中,提取他认为是当前切实可行的14项新政,谕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及各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复奏。紧接着于7月27日发布谕,把翁同和任尚书的户部所拟考核钱粮、整顿厘金、裁减制兵以及盐斤加价、重抽烟酒税等措施,发各省,令一体实力奉行。7月间,翁与皇上决议,议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将次行之,“然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㉓

帝党官僚则利用职务之便,屡代康有为

上折。光绪二十一年五月,王鹏运代康有为上请修京城街道折,奉旨允行。六月十四日,又代康有为上疏劾徐用仪阻挠新法,越日徐用仪被逐出枢译两署。又上疏附康有为片劾粤抚马丕瑶保奏市侩潘赞清为三品衔,由于刚毅力保未能免去。凡此种种,皆为维新运动酿成声势奠定了基础。

其次,对维新派为变法而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帝党成员不仅支持、鼓励,而且积极参与。1895年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不达后,遂决南归。户部郎中、军机章京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极力挽留,认为“时有可为,非仅讲学著书之时”。^{②4}康有为也感到“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天下。”陈炽建议说“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于是在北京创刊了第一份维新报纸《万国公报》。《万国公报》自六月创刊后,在徐勤、陈炽、张之洞之子刑部主事张权等人的资助下才得以维持。报开两月后舆论渐明,“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②5}为强学会之成立打下思想基础。

在康有为为成立强学会而四处活动之时,帝傅翁同和与工部尚书孙家鼐都暗中予以支持,陈炽、沈曾植及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帝党官僚则积极进行合作。赞助及参加北京强学会的人物凡20多人,属于帝党及接近帝党的人物就有10人以上。

强学会的成立,改良派和帝党的结合,引起后党的不满和惊恐。李鸿章因捐金入会被拒,便指使其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并贩卖西方书籍,中外纪闻按户销售,以毁誉为要挟,请旨严禁,上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一月后,又弹劾强学会的发起人文廷式,迫使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②6}强学会被查禁时,帝党沈曾植、杨锐等人主张具呈力争,翁同和只在日记中写了句:“南城因封禁强学会,众汹汹,有烦言”,没有说自己对此事抱何种态度。但据赵炳麟《柏岩文存·陈炽传》载:强学会寻为御史杨崇伊参劾,得旨封锢,翁常熟相国密奏曰:“教育人才,自强之本,未可阻碍,使天下寒心”。2月5日帝党

御史胡孚宸奏请解禁,翁同和又籍此力主恢复,结果改设官书局,每月经费一千两,任务是译书。强学会封禁之时,李鸿藻赴陵差未回,及归,翁同和往见,“属合力扶持”。^{②7}帝傅孙家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事乃解,且有大转之机。

强学会是维新派组织的第一个鼓吹变法的学会,是康有为为推动变法而做的最初尝试。翁门诸子参预发起于成立之初,力主恢复于封禁之后,故强学会可视为帝党与维新派结合之枢纽。

继强学会而起的变法团体是保国会。保国会在京师成立之日,“上自二三品大员,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各官,至公车会试之人,下及于在京之行商坐贾,无不毕集”,^{②8}其中著名的帝党人物有李端棻、宋伯鲁、杨锐、刘光第、李岳瑞、徐仁镜、徐仁录等人。由于保国会规模较强学会大,爱国热情也较强烈,于是有后党顽固派潘庆澜等上疏弹劾保国会,军机大臣则毅预备查禁之事。光绪帝认为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查究耶?事遂止。保国会遭劾虽未查究,而形存实散。“经保国会后,又有保滇会、保浙会继之,自余各省从风,州县并起,不可指数,虽有政变,而民智已开,不复可抑矣”。^{②9}人们思想和舆论上的这些变化,与一些著名帝党官僚的参与及政治上倾向自强图存的举措是分不开的。

最后,由于帝党的大力帮助,加强了维新派与光绪帝的联系。在帝党中起此作用的主要是翁同和。翁同和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开始发生关系,最早可上溯到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即光绪十四年。这一年的冬天,在北京应试不第的康有为,首次上书翁同和,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当时“外事交迫”“兵弱财穷”的困境,鼓吹其变法主张。翁同和虽未见康有为,但在读过其上万言的《上皇帝第一书》后思想有所触动。

1894年,康有为参加甲午会试又到北京。康有为仍然希望能见到翁同和,于是特意请出他的南海同乡张荫桓事先向翁疏通。据张荫桓说:“康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及康往而辞焉。余讶以问翁,翁应曰:

此天下奇才也，吾无以位置之，是以不敢见”。^⑩在这一时期，康有为、翁同和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彼此都对对方相当留意。对康有为来说，争取翁同和的同情与支持，是实现其变法主张的前提。而翁同和虽然这时对改革问题也开始有所留意，但还没有意识到变法事关国家存亡，因此几次拒绝康有为的求见。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翁同和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翁同和是竭力主战的，他甚至不惜触怒慈禧，主张停办点景，移做军费。他们满以为决此一战，非但可以耀武海外，而且可使皇位永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使翁同和悲愤交加，痛不欲生。《马关条约》签定后，翁同和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⑪1895年夏初，康有为又到北京应乙未科会试，并以一天两夜的工夫写成万言书，提出了拒绝批准《马关条约》，并“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的主张。5月2日，集体到都察院投递，而都察院则以皇帝已在条约上用玺，无法挽回为理由拒收。5月6日，会议榜发，康有为由于翁同和出力而以第五名取中，据张荫桓称：“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⑫在紧接的殿试与朝试中，康均直言时事，翁氏读后“大为佩服”，准备擢用康有为。由于徐桐等人的阻挠，康有为虽中了进士，但仅授工部主事之职，未能重用。其后翁亲自登门拜访康有为，康有为乃始知宫中事。翁同和如此礼贤下士，给维新派“游说公卿”掀起变法运动以极大的鼓舞。会晤后第二天，翁同和在书房内密报了他与康有为会晤的情况，光绪帝也开始留意起康梁等维新人士了，自此，维新派的变法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898年1月13日，光绪帝召见王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在场的王大臣，从奕訢到孙家鼐咸默然，独翁同和表示赞同，并谓变法须从内政的根本变起，其声震殿宇，同列皆讶之。要从根本上变法必须要有人才，翁氏首先想起了康有为，决定将其推荐给光绪帝。关于这个问题，历来颇有

争议。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翁氏日记甚详，但没有记与康有为见面之事。而康氏自编年谱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康氏年谱详述了他到京师后，上书碰壁，决定返粤，但翁氏亲自到康的住处南海会馆挽留，康有为“遂不获归”。紧接着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⑬可见，翁氏的留行和高的奏荐两者之间不会是巧合，而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高的奏荐很可能是在翁的授意下进行的。高氏奏片递上后，光绪帝十分欣喜，当即要总署“酌核办理”，并欲召见康有为。奕訢等人以皇上见四品以下大臣者违祖制为由，改召见为总理衙门问话，于是康有为借机递上了五个条陈和四部新书，并联络同志，大力鼓动，局面大开。

史实表明，如果没有翁同和的架桥牵线，奔走联络，光绪帝恐怕不能很快地同维新派建立联系，而维新派也很难接触到身居九重的天子。维新派后来之所以受到光绪帝的青睐，与帝党合作共演维新变法一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翁同和。帝傅翁同和之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实质上是拉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56页。

②胡思敬：《国闻备乘》，《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78页。

③⑩⑪《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7，第30—31页、卷20，第3、17页。

④⑫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甲午8月29日、9月8日。

⑤⑥⑧张謇：《致翁同和密信》第二件、六件、一件。

⑦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册2，第64页。

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第123页。

⑬《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甲午九月初九日。

⑭刘光第：甲午条陈，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广东革命报刊述论

□ 梁 烈

广东地处华南，毗连港澳，文化上是东西方的交融点和冲撞点，接受新思想和新思潮便尤其敏锐；而作为革命策源地，她的人民又有着坚强的民族意识和优良的革命传

统，并且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飚一经扬起，广东宣传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报刊便骤然勃兴，并从此开创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唤起民众自为革命的主体”^①的伟大勋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南下广东，与谭平山等人创办了《广东群报》，催生了广东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劳动者》周刊也于此时应运而生，二者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发挥着一定的组织和宣传鼓动作用。

1921年春，广东共产党组织正式诞生，《广东群报》立即成为党组织的机关报；而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著名刊物《新青年》亦于是时南迁广州，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党的理论刊物。此外，这一阶段的革命刊物还有《向导》、《劳动周报》、《劳动与妇女》、《青年周刊》以及《琼崖旬报》等。

1924年国共合作并建立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随即在广东掀起，而国民党新老右派却向共产党人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为了反击他们的反动宣传，当时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创办了《政治周报》，以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大力促进了国民革命的发展。这一时期创办的革命刊物，如毛泽东主编的《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罗绮园

^①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0页。

^②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23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上谕。

^④《光绪朝东华续录》卷128，第7页。

^⑤《清史稿》卷470。

^⑥《光绪朝东华录》卷4，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丙申第3条。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宋伯鲁《乡会试策题宜专问时务片》，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

戌变法》第四册，第131、133、132、132—133、132、138页。

^⑯《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84卷，第2页。

^⑰光绪二十一年腊月二十七日变函。

^⑱《免究保国会》，《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日。

^⑲梁启超：《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96页。

^{⑳㉑}王庆保、曹景麟：《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92页。

作者王亚芳，广东高教出版社编辑（510076）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主编的《中国农民》，周恩来支持创办的《岭东民国日报》，以及《革命》、《革命先锋》、《少年先锋》（李求实主编）、《中国军人》、《青年军人》、《中国青年》、《犁头旬刊》、《向导周报》和《新琼崖评论半月刊》等，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共产主义早期在广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由邓中夏主编的《工人之路》（初为周刊，后改为小型日报）诞生，并且很快成为省港罢工 20 万战士的主要精神食粮。

1927 年，继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东潮汕建立红色政权、海陆丰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之后，广州也秘密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准备起义。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广东省委在张太雷领导下决定出版秘密机关报《红旗》（广州起义后成为广州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并由半周刊改为日报），对宣传动员广大工人群众起来参加起义斗争及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所出刊物中发行时间较长的有广东省委机关刊《红旗周刊》、《省委通讯》和《香港小日报》等，较有影响的刊物是《党的生活》、《南方红旗》、《战斗》、《大路》、《正义周刊》、《支部生活》、《政治通讯》和侧重对群众宣传的《红旗特刊》，以及两广省委出版的机关刊《两广实话》、《两广红旗》等。《红五月》为配合中心任务而开办，《列宁青年》、《少年先锋》（绍仪主编）和《新生活半月刊》以青年为主要宣传对象，《工人三日报》以工人为主要宣传对象，《海员月刊》以一般海员为主要宣传对象；《针锋》则专为针对国家主义派在香港出版之反动报刊而创办；还有一些刊物名称改变却期数顺延的，如《香港周报》后来改为《半周宣传大纲》，《教育杂志》后来改为《学习半月刊》等。此外，还有广州市委的《工农小报》、香港市委的《锄头》及其海员支部的《中国海员》等，都深受党内外同志的欢迎，对于指导当前的斗争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开展左翼文化运动，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也成绩斐然，如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的《星光》、《新路线》、《论

衡》，香港分盟的《前哨》、《春雷》及《新泉》、《读书周报》等。

1937 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内地大批文化工作者和救亡青年撤退至广州、香港，使广州成为一个对外——特别是对东南亚华侨宣传团结抗战的中心。中共广东各级党组织积极鼓动抗日报刊的出版，除移至广州出版的著名报纸《救亡日报》外，还有影响较大的《抗战大学》、《战鼓》、《御侮》、《民族战线》、《地下火月刊》和《海岸线》等。1938 年 10 月，广州陷入敌手，广东省委机关迁往粤北，次年即于韶关创办省委机关喉舌《新华南》杂志。人民抗日武装亦先后出版过不少报刊，如东江纵队的《前进报》及其香港市区中队的《地下火》、珠江纵队的《正义报》（后来是《挺进报》）、韩江纵队的《新潮》、琼崖抗日民主政府的《新琼崖报》、琼山老区的《抗日新闻》及文昌抗日民主政府的《新文昌报》等。此外还有广东各地党组织办的抗日报刊，如罗定中心支部的《三罗日报》、梅县中心县委的《民报》、龙川支部的《龙川日报》、新会江南区工委的《新会战报》、从化县县委的《三日新闻》（后更名《群声》），以及宣传抗战的南路《南声日报》、韶关《晨报》、阳山《北江日报》和统战杂志《救亡呼声》等。由于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的到来，香港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和爱国民主运动也形成了一时之盛。当时在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除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外，还有以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邹韬奋、夏衍等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办的《笔谈》，俞颂华为总编辑的《光明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月刊》，郁风主办的《耕耘》，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张明养主办的《世界知识》及马国亮、丁聪等主办的《大地画报》等。

1945 年日本投降后，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便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广东党组织立即着手出版了《广州晨报》，广州地下市委则印行《学习知识》，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始终站在反控制反迫害斗争的前列。全国内战爆发后，一家有共产党员参加的爱国

民主报纸《每日论坛报》(解放后改组为《联合报》,即现在的《广州日报》前身)问世。而兴梅《群众报》、《人民报》,潮汕《团结报》、《红星报》,潮澄饶《自由韩江》、《韩江子弟兵》、《海啸》,闽粤饶《星星报》,粤赣湘《粤赣报》,琼崖《新民主报》,韶关《民风周刊》,翁江《翁江报》(后改为《北江报》),九连工委和东分工委《大众报》,以及广州地下党为配合广州解放而出版的《广州工人报》、《广州文摘》等,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使广东革命报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时间上看,广东革命报刊可分为广东早期共产党建立至国共合作(1919~1924年)、大革命兴起至广州起义(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发动至抗日民主运动高涨(1927~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人民赢得战争胜利(1937~1945年)和全面内战爆发至广州解放(1945~1949年)五个发展阶段;从性质上分,也可分出政治、文艺两大类;而作为编辑思想的主旋律,却只有一个,就是:“唤起民众自为革命的主体!”

二

《广东群报》在“筹办群报缘起”中便已公开提出“改造社会”的目标,认为:中国“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柱,已呈锈蚀的现象,非向根本上重新改造,旦夕间就会发生栋折梁崩的危险。”《劳动者》也在发刊词里明确提出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为目的:从事劳动运动,为的就是从“根本上要求制度改革”,由工人“自己起来掌管生产和分配”,从而使工人真正回到社会主人的地位上去。它在第2号的《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里更进一步指出:粤人治粤不可能铲除强权,“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工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翻,实行共产主义去!”而毛泽东则在《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中鲜明地提出办报的目的是“为了革命”的思想。他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周恩来受托在汕头筹办《岭东民国日报》时亦强调

“在期唤起民众革命精神”,并且在创刊《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欲完成现代中国国民革命的工作,必须唤起民众自为革命的主体。”而他亲自为副刊题写的“革命”二字,不单突破以往副刊的消闲性质,而且也鲜明地突出该报的革命性质,透给读者以新鲜的空气。广东省委对报刊宣传工作有更为具体的指导方针:“宣传方面须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须多从群众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说起,但必须显明地提出党的独立政治主张,从这些问题中指出各派资产阶级宣传的黑幕。”②“暴动日报,继续出版,鼓动斗争的勇气。”③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则是“进步力量以我们为主导。文化宣传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④此时的《海岸线》号召“中华儿女动员起来,保卫祖国神圣的海岸线。”处在全面内战爆发时期的《新潮》则根据我党中央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而提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学习知识》则旗帜鲜明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发言:“第一,根绝法西斯遗毒,不再任它为害人类;第二,纠正日寇汉奸麻醉人民的错误思想,不让它死灰复燃;第三,肃清色情文学与封建作品,灌输活的知识与提供正确的学习方法。”

“用革命的宣传打破反革命的宣传”,这是革命报刊编辑工作者最基本的责任。当时的所有革命报刊几乎无一例外要遭到来自国民党右派和其他反革命派别的疯狂攻击,因而编辑工作者们除了用“革命的宣传”,像《中国军人》那样公开刊载马克思像,刊登列宁语录;像《琼崖旬刊》那样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像《岭东民国日报》那样全文刊载首次翻译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像《劳动者》、《工人之路》那样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及所实行的新政策;像南迁广州的《新青年》那样连篇累牍地评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像毛泽东那样在《政治周报》上大力宣传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宣传执行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初步阐述和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以打破“反革命的

宣传”，促进中国革命进程外，还给反动派以针锋相对的迎头痛击。

1921年1~3月，在《广东群报》和《民声报》上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论战”。两派的争论以陈独秀和区声白为代表。陈独秀来粤后即着手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设，然而当他将所起草的党纲拿到筹备会上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激烈的辩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陈独秀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来推翻资产阶级以后，你们无政府党是一定反对以资产阶级压服劳动的办法压服资本了，难怪有人说无政府党是资产阶级底好朋友！”（此一论争后来又全部辑录在广州出版的《新青年》上）。

1926年春，邹鲁、戴季陶、曾琦等国民党右派肆意攻击共产主义，瞿秋白于是在《新青年》上发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给予严厉批判。毛泽东则在《政治周报》的“反攻”专栏里写了一大批战斗檄文，如《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我良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向左倾还是向右？》、《赤化原来如此》、《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以及《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声讨反革命势力。《工人之路》也用了大量篇幅，来向一切“向虎乞肉”的妥协投降谬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1938年，由于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方针，不敢发动、武装群众与敌斗争，反而解散人民抗日团体，《抗战大学》便立即发表文章揭露，并且以本社名义发表洋洋万言的《和汉奸理论继续开展斗争》，对汉奸报纸《南华日报》上之《和战问题之讨论》予以严斥；我党支持和领导的进步群众团体刊物《救亡呼声》也对“敌我实力悬殊论”和“一面防赤论”等汉奸理论给以“铲除斗争”，并且对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我华南游击队，破坏统一战线的“自杀政策”以及压制人民民主等政策进行了抨击。尤其痛快的是，《河源青年》、《抗日小报》及《战地青年》等“利用中秋节进行反汪宣传，这种宣传很得群众拥护。”^⑤

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鲜明地提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便“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因而，“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便应该是无产阶级报刊宣传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对国民革命军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之时，《东征纪略》使用大量事实大力宣传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下的东征军是一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不拉夫，不筹饷，不怕死，不要钱”的革命军队，因而很快便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而所向披靡，扫荡了反动军阀势力。1939年，《抗战大学》首先详细报道《活跃东江的惠宝游击队》，也用事实粉碎了敌人对革命军队的污蔑，广大人民群众于是纷纷投身到“自己的军队”里去参加保家卫国，赶走日本强盗的斗争。

1945年8月，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毅然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广州晨报》是当时广州唯一一家如实报道这一消息的报纸，因此立刻吸引了全市人民的注意，报纸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①见周恩来《岭东民国日报》创刊《宣言》。

②见《省委最近工作重要决议案》1928年9月10日（载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

③见《中共广东省委致东江特委信》1928年3月20日（载《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

④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八个月来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报告》1940年3月（载《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37~1945下）。

⑤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八个月来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报告》1940年3月（载《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37~1945下）。

作者 梁烈，广东经济出版社编辑（510075）

责任编辑：郭秀文

当代马华小说的主体建构

□马相武

马来西亚华文小说作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其主体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马华文学一致。所谓“当代”,时间范围较宽泛,包括1965年以来,但八、九十年代更为我们所关注。这是由于我们强调“当代性”,也是因为论述问题的需要。另一方面,整体研究当代马华小说,必然要回溯马华小说的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别是各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而由于马华小说的社会文化属性,考察的角度不应仅限于小说史,还应扩展至文学史乃至文化史。

一、历史意识

当代马华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或主题主旨明显带有反思倾向的小说,其历史意识的主体当然首先是作家本人,但站在一定的时代高度思考历史、代表一定华人族群的,也可以说是以群体为主体。马华作家以小说方式认识或表达对马来西亚社会历史,尤其是华人社会历史的看法,在9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看法,包括对一般历史事实、对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主要线索、发展趋势,对具体事件、人物的作用、价值等一系列历史范畴的看法,并从中引出一些教训、概念、思想,构成了马华文学认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重要方面。90年代马华文学丛书之一《白水黑山》(小黑著,1993年5月版),这部长篇小说就是马华文学反思历史的重要成果。其反思的深刻意蕴,在作者的

《跋》表达得很清楚:“一部人类的思想斗争史中,牺牲的永远是无辜的百姓。”“自从人类有了思想,似乎永远都是左右两脚交替并用。”“小人物永远有被动的悲哀。”“某一个人的理想,是由许多人的血凝集而成的。某一个人到了最后修正了他的思想(以致乖离了当初诱人的口号),那许多人为他而流的血已经风凉于山岗中。历史上多的是。”小说气势恢宏,历史跨度较大,起于三、四十年代抗日斗争,止于八、九十年代家庭生活。小说告诉我们,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人类社会(包括华人社会)已经发生巨大的主体分化,形成利益关系和观念形态的重大调整。其反思和批判的依据是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的运动史实以及作者的价值判断。其价值参照系是历史选择论。作者认为,历史发展具有选择性,试图以此综合、超越历史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作者强调的是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尤其试图总结普通人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以及历史运动中普通人的理想和人格。但作者并未深入研究人的主体性的根源和选择机制的客观基础。作者认为:历史选择说到底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选择。一切个人的选择、阶级的选择、民族的选择,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显现出自己的地位和价值,通过后代人民来予以肯定和否定。只有那些顺乎历史潮流、合乎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选择,才能得到长久的肯定。与历史选择不同,历史性的选择是一定民族、阶级在重要历史关

头,对一些重大的事关民族阶级发展前途的大事上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影响历史的走向,它们同样要经受历史的考验,其重要性、功过是非不以选择的当事人、集团、阶级的评价和宣传为准,而以它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准,以后代人们的肯定和否定为准。作者贬斥了那种非凡人物的不断“修正”理想目标的、八面玲珑的人格形象和政治态度,同时既戏剧性地又深思熟虑地让笔下的“英雄”、“领袖”人物总是死而复生。小说反思的对象颇广泛:抗日、文革、冷战、英国殖民统治、宗教关系、“革命”婚嫁、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革命与牺牲的关系、利益与权谋的关系、理想信仰、人性、历史选择等等。

戴小华女士在论述马华文学思潮时总结道:“80年代的马华作家在受到国际民主思潮的冲击及国内华族屡遭的困境后,到了本世纪的后期已开始严峻地反思民族的命运。而从这一时期的马华作者的一些作品中,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人们特有的心灵震动”。①《马来亚三部曲》(含《树大根深》、《枝荣叶茂》和《花飘果堕》)出版于八、九十年代之交,作者方北方在《树大根深·后记》中概括了自己新的历史视角、历史意识的形成:“我在马来西亚,前后住了57年。从青年步入中年、进入老年:由侨民化为公民:使我对这里的乡土有了感情,对建国产生热切的寄望。”他的这番表白,也代表了一代人的心声。侨民身份转向公民身份,思想观念也发生转变。这一代原来抱定叶落归根,效忠中国,自我定位为异乡过客,现在要求落地生根,效忠马来西亚,决心成为建设新国家的主人。这样一种心路历程,心理上、精神上、角色上的转变何其巨大而充满矛盾斗争。正是在这转变中,作家获得了一种新的历史视角或历史意识。这就是华人在马来西亚的生存奋斗的历史,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充满辛酸血泪的猪仔史或华侨史,而且是马来西亚华族创建多民族聚居的、多元文化融合共存的历史。作家以大树形象来象征马来西亚华族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他有意“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和演变,

表现华人社会的结构以及精神面貌。”这部宏篇巨制体现了强烈的史诗意识。三部曲以《树大根深》的史诗性最为突出,它是一部马来西亚华人创业史和拓荒史。小说以华人创建仁义胶园为主线,穿插其他华人经营锡矿、从事商业等经历、展现华人先辈历经自然环境的险恶生存条件以及社会政治事件的遭遇,艰苦创业的悲壮图景。第二部《头家门下》(即《枝荣叶茂》),以更完整的结构、丰富的情节、鲜明的人物,特别是通过史德林家族的命运变迁,来表现华族在经济、文化、教育、精神上的成长。史放荣这个人物,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华族的希望。第三部有较强的纪实和政论品格,历史使命感贯穿其中。方北方更早对史诗意识的追求,体现在《风云三部曲》中,其气度恢宏,雄浑悲壮,体现了一种人民史诗的文学理想。它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为背景,但几乎都是对普通知识分子的工作、爱情和生活遭遇的描写。其中包含着普通人创造历史的观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有着自己精神追求的普通人的活动而已。通过方北方前后两大“三部曲”可以看出,方北方对于马来西亚华族发展的历史评价,是由各阶段的社会评价所构成的,又不局限于每个具体评价,而是不断地按照华族历史发展的逻辑加以修正和发展的。华族的历史价值,主要是普通华族成员的历史价值,正是他们对华族的成长和马来西亚的进步产生了重要作用。方北方在《风云三部曲》中对英雄显要的回避,在《马来亚三部曲》中对显要的批判,以及两大三部曲对人民的同情或讴歌,小黑在《白水黑山》中对英雄的批判,对人民(无辜者和普通人)牺牲的历史价值(包括人民与理想的关系)的反思,构成了马华小说历史意识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是马华历史小说的重要思想成果。

方北方和小黑在小说中体现的这种历史意识,相当广泛地、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作家的历史题材的或有历史性、反思性的小说当中,如黄锦树的《说故事者》(1996年)、雅波的《血肉砌成的太平》(1990年)、梁放的《锌片屋顶上的月光》(1986年)和

《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1986年),等等。

二、本土意识

90年代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在总体表现形态上以中华文化的优秀特质来丰富和发展马来西亚的文化传统,积极建设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华文文学,努力推动华文文学成为“国家文学”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一个很有希望实现的文化目标。近年来的马华文学,虽然大大加强了同中国文学的交流和联系,但是,自觉突出当地社会的本土特征,体现出了更加强烈的本土意识,从而要求参与国家文学和国家文化的建设。由于马来西亚近年的文化气候有利于形成兼容性较强的文化土壤,马华文学的某些看起来矛盾的特性和追求却能够共存。在一定的条件下,近80年的文学发展,足以形成一定的文学传统。马华文学自从以“此时此地”为背景,反映当地各族人民生活,它就具有了本土文学的个性,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传统。尤其在反映华族、以及华族在与其他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各种生活遭遇方面,更显著地体现出这种传统的独特性。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融合或浸润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主义传统,坚持独立、民主、自强的民族精神之中;融合或浸润在对中华文化的寻根和承传之中,同时又是为了建设这样一种崭新的独特的文学:适合本国华族及其他民族人民的需要,具有本国华族生活背景及异国风情特点,并能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建设服务。

马华文学在80年代对自己有了更高要求,喊出了“争取纳入国家文学一环”的口号。饶芑子这样概括:“同西方华文文学比较,东南亚华文文学兴起较早。过去,这些华人依然保持着华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有自己的华人文化圈。50年代开始,这个地区的华人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华侨意识慢慢淡化,华文文学也从过去的面向祖国,渐渐转为面对所在国的社会现实。”^②黄孟文在90年代初总结20年新马华文学时也

评论道:“本地的写作人(不论是从中国南来或是土生土长的写作人)都普遍地具有这样一个思想意识:马华文艺不应该再是中国文艺的一个支流或是附庸,而应该是道地的马华文艺;它不应该描写几千里外的中国的事情,而应该反映‘此时此地’;它不应该唯中国文学的马首是瞻,而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特性’。”^③这是他对1947年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独”“侨”大论争的总结,也表达了他对马华文艺同中国文艺的关系的基本主张。

战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促使马来西亚华人改变居住国的态度和文学观念。1947年“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理论主张与“侨民文艺”的论争,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结果是本土文学观明显占据上风。论争结束后,确立了“马华文艺独特性”,创造与建设反映为马来西亚社会人生的、具有本地独特性的文艺,已在文艺界基本形成共识。以“马华化”、“本土化”的追求,建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新文艺观念,是这场论争的主要成果。独立发展马华文学的理论主张和创作意识,也促使创作不断取得成果。

早在20年代,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便首先由《荒岛》、《文艺周刊》和《椰林》等文艺副刊的编辑提出。最先是《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的编辑朱法雨等,有感于马华文学同中国文学雷同,继而提出“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的口号,认为“只要以南洋的生活色彩为背景,努力描写,大胆描写,一定能使南洋的文艺放出异彩。”^④1929年,《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文艺三日刊》)主编曾圣再次主张创作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学:要在“万里炎阳的热国里寻找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在高椰胶树之下,以血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⑤《叻报》副刊《椰林》主编陈炼青也声明:“所登文字,一律以提倡南洋文化为标准,如有文艺创作,也一律以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者为限。”^⑥

从40年代末的“独”“侨”之争,30年代中期的“马”“侨”之争,20年代末的“南”“侨”之争,论争的范围、规模、力度、深度,一次大过一次,马华文学本土意识的建构更加

具有全面性、自觉性、理论性。马华文学终于在 50 年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努力创新的发展道路。这符合马来西亚华族作为民族成长的历史要求,也符合马华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40 年代末的“独”“侨”论争的后期,远在香港的郭沫若和夏衍也在《文艺生活》杂志上提出见解,郭沫若的《当前的文艺诸问题》一文明确表示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使用了“马华化”的提法:“马华化是绝对正确的路线,这样倒并不是和中国文艺绝缘,而是中国文艺更加丰富了。”他在第二篇文章《申述“马华化”问题的意见》对前文的观点作了修正,认为马华文艺对马来亚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同样都应该表现,“把‘现实’局限在‘此时此地’的题材上去了解,在我看来是走了偏向,因而把问题弄得更加纷繁了。”^⑦夏衍在《马华文艺试论》一文中,表述了同郭沫若大体一致的观点。^⑧

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不具有保守性和狭隘性,并非本土主义。它同马来西亚社会的现代性能够构成统一性。多种民族聚居和多种文化共存的多元互补关系,以及本土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性,特别是马来西亚华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中华/当地的双重文化传统,便使得马华文学开放的本土意识能够适应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建设要求。当中华文化进入马来亚生态环境后,已经逐渐在继承与变异中,或反映或适应或对应于该地域内的生态、气候、地理以及人工条件,从而形成特定的、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分布、文化组合和文化面貌。这就是马华文化生态。由于各种文化特质之间的界限具有相对性,可以寻觅到分布在小说或文学中的中华文化或当地文化的特质。马华文学中的本土意识,曾历经中华文化中心意识的转变过程,它实际上也是华人先辈早先具有的华人种族中心意识的转变过程。华族将本群体的价值观念、信仰、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视为最优文化倾向。这种态度将本群体的文化当作中心或标准,以此评价、衡量当地文化,虽然没有达到怀疑以至敌视当地文化的地步,但文化隔膜是曾经存在过的。在文化融合

的漫长过程中,此种文化意识得以扭转,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不断获得强化和自觉,最终成为广泛认同的、基本确立主导地位的文化意识。

马华文化的本土化过程,也是文化累积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马华文化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马华文化的累积属于凝聚的累积。即在文化复杂性的同一层次上,引进新的文化特质或元素,使原有的中华文化的特质或元素的总和增加;同时,在特定条件下,累积变成取代,但其复杂性的程度仍然得到保持。马华文学的文化景观,反映了马来西亚本土特征和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华族活动形态。它甚至包含了马华文学作品中的氛围和环境,包括山水、语言和技艺,宗教教义(比如伊斯兰教义)、社会观念和政治模式(比如现代化目标、多元社会观念、资本主义制度和相应的国家体制)等。马华文化本土化,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文化重组的过程,这个过程仍在继续,需要进一步整合,以使马华文化以崭新的风貌和更高的文化形态走向 21 世纪。

实现马华文学的本土意识,特别是强有力地推动马华文学及马华文化的本土化,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包括时代氛围和政治环境。1957 年 8 月 31 日,马来亚独立;1959 年,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马华文艺界深受鼓舞,提出适应新时期的“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发展,其宗旨在于强调马华文学创作必须面向马来亚华人大众,传播“马来亚是马来亚华人的国家”的新观念,深化华人“落地生根”的归属感促使马华文学真正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但是,当时的外部条件并不有利于这一路线的实现。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未能获得一视同仁的对待,华语华文原已载入宪法的地位受到贬抑。这种外部条件也可以追溯至 40 年代末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⑨

华文文学及其本土意识在马来西亚当代新的发展,其重要的外部条件是政治环境的宽松,导致文化系统的开放。由于执政者区分开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并对这两种认

同采取双重标准,华文文学因而能够在多元的、互补的、相互兼容的文化土壤上得以生长。马华文学及其本土意识的演变过程,即马华文学的本土化,是各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关本土化的不同观点、愿望,在对马华文学领域产生各种影响的结果,构成了马华文学本土化的历史发展。马华文学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昭示了马华文学当代和未来的发展方向。90年代马华文艺界积极推行文学界、企业界和新闻界的“三结合”,表明马华文艺界在探索本土文学的发展道路方面,已经有了深刻的、自觉的认识。当然,最终地、历史地影响或推动马华文学发展的合力范畴会是相当广泛,甚至扩及相关的意识形态、民族力量和政治势力等。

三、多元开放意识

王润华曾经从海外华文文学的“双重传统”和“多元文学中心”两大观念出发,探讨了世界华人文学的形成及其一般规律,并预言“以语言和种族建立起来的围墙,在21世纪恐怕会拆除”。^⑩这种文化趋势,在马华文学中已经显露。

80年代以来,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华人经济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民族经济的一个支柱,华人有识之士更加重视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的社会作用,给予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也使华语华文的商业价值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些有利条件,使马华文学在多元开放意识的引导下有了新的发展。

1990年4月,马华作家戴小华应邀到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及南京大学举办文学讲座,成为马中建交以来“马华文坛第一个访华使者”。^⑪1991年6月,马华作协首次组团赴华访问,云里风主席率领的主要由作协理事组成的代表团,与中国作家、学者进行广泛交流,为马华文学在大陆传播铺平道路。近年马华作家交流活动十分活跃,大量作品在华出版、发表。与此同时,为了使马华文学走向世界,扩大国际交流活动,马华

作家在吉隆坡主办有东盟各国作家代表出席的“亚细安文艺营”,从多元文化的国度出发,与友族马来、印度作家建立固定联络方式,互译作品,进行文化交流。

马华文学的文化精神偏重融合。早期在思想上主要受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影响,现实主义经过演变,一直在马华小说乃至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现代主义对马华文学有一定影响,创作有实绩,但不占主导地位。马华文学从传统到现在,基本格局是现实主义为主导,未受动摇。同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思潮比较自然地合流。流军曾这样概括:“西方现代主义在60年代传入新马各地之后,新马文坛就出现了许多现代小说(新马文坛现代主义的作品是以诗为主)。当时比较常见的小说作者有牧羚、谢清、英培安和南子等。”^⑫但80—90年代,这种影响并不特别显著。相对于小说,诗歌中的现代主义作品要多一些。同新华、菲华作品相比,阶段性的现代主义特征不那么显著,在马华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并非绝然对立,往往出现融合情形。在这方面,马华小说与整个东南亚文学也是基本一致的。两种思潮在华文创作中,往往相互渗透或相互影响。在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现代主义思潮并没有获得充分发展。马华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不具备一般现代主义的语言/文化颠覆能量。它是理想折光和批判倾向以文学方法的诉求。所谓现代主义作家,有时也写现实主义作品,甚至现实主义作品数量比其现代主义作品更多。比如,陈雪风曾评说:“新秀李天葆、夏绍华与柏一等,则倾向于现代主义的流派。创作的意念,注重的是语言与情境的经营。对于作品的题旨,并不予以严肃的看待,有的甚至有意识地将之放逐。”^⑬其中提到的柏一,其小说集《粉红怨》的部分作品,就是现实主义的。而一些被定位于现实主义的作家,有时在作品中也会表现出某些现代主义的方法、手法,甚至观念。在多元融合中开放,在开放中多元融合,这就是80年代中期以来,马华文学的文化取向。马华文学在思潮、流派和群体意识上不那么强烈、鲜明,这也许恰

关于文学鉴赏理论建构的思考

□ 吴俊忠

长期以来,文学鉴赏是作为文艺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的。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除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过一本张炳隅的《文学鉴赏学》和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出版过一本林文和主编的《文学鉴赏》之外,从理论上系统论述文学鉴赏的专著很少,文学鉴赏学的理论体系还很不健全。然而,无论是从传统的文艺角度,还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学鉴赏的内涵已足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既与文艺学理论、美学理论密切关联,同时又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今试说之。

文学鉴赏学的理论体系

文学鉴赏是在文艺学和接受美学的基础上,运用综合的方法,对文学鉴赏的本质、作用、特点、规律、类型、方法等进行整体的思考和探究,其着眼点是文学鉴赏的审美活

动。研究对象决定文学鉴赏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大致可分为四部分。

(一)本质论。它主要解决“什么是文学鉴赏”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两个层面分述。

1、文学鉴赏的科学定义。定义是内涵与特征的浓缩和概括,是本质的理性显现。文学鉴赏的科学定义,首先要分清欣赏与鉴赏的区别(客观存在着欣赏与鉴赏的概念混用或通用的现象),表明鉴赏在内涵上要大于欣赏的客观事实;其次,要界定文学鉴赏、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内在联系,指明文学鉴赏是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综合。

2、文学鉴赏本质的构成。文学鉴赏是对文学艺术的审美活动,一要感受,二要评判,两者都有情感因素的参与。因此,文学鉴赏的本质构成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审美本质。阅读鉴赏文学作品

好预示着文学发展的高度可能。

①戴小华《80 年代马华文学的思潮》,《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饶芃子《90 年代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第三届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议特辑》,第 34 页。

③黄孟文《战后 20 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序》,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④撕狮《南洋与文艺》。

⑤曾圣提《文艺周刊的志愿》、《醒醒吧!星城的艺人》,《南洋商报》1929 年 1 月 11 日。

⑥陈炼青《编者第二次的献辞》,《叻报》副刊《椰林》,1929 年 7 月 24 日。

⑦⑧新社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

⑨萧村《待到山花烂漫时》,《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

⑩王润华《从中国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

⑪潘亚瞰《蜕变中奋起的女性》。

⑫流军《马华文学的渊源与发展》,《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2 页。

⑬陈雪风《传统与创新——序南洋文艺 1996 小说年选》,《早天花露——南海文艺 1996 小说年选》,第 2 页。

作者马相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00872)

责任编辑:陶原珂

的过程,也就是审美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鉴赏者会被文学作品的内涵意蕴所打动,产生美感愉悦,使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境界得到提升和升华,获得审美的享受。与此同时,鉴赏者会不自觉地对作品提供的艺术世界进行审美再创造,以致会产生混同的感觉,仿佛“他所欣赏的那种艺术作品并不是其它什么人所创造的,而是他自己创造的”。^①

其次是评判本质。文学鉴赏者在获得审美享受时,必然会进行融感受和理解为一体的评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个性特色的主观评判,是以鉴赏者的文学修养和人生体验为基础的。评判的主要对象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的内涵意蕴,作品的艺术形式,乃至作家的审美倾向等。评判既是鉴赏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的综合体现,也是对作品的内涵揭示和整体把握。

三是情感特质。鉴赏是审美活动,审美必然有情感体验。文学鉴赏过程中情感体验尤其强烈,甚至会有如痴如醉的“痴迷”状态。因此,情感特质是文学鉴赏本质构成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部分,集中表现为文学作品的情感力量和鉴赏者的情感力量使作品提供的艺术世界生动、真实、多姿多彩。鉴赏者为情所动,为情所化,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摆进去,充当其中的某个情感角色。

(二)规律论。特点和规律,既可分又不可分;特点正是规律的具体的显现。文学鉴赏的审美活动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集中表现为文学鉴赏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分述。

1、文学鉴赏的普遍性。文学是“人学”,要写芸芸众生,人间百态,反映人的七情六欲。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文学鉴赏的普遍性。

2、文学鉴赏的差异性与共同性。文学鉴赏是个性化的审美活动,而且鉴赏本身是一个个体活动过程,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备个体差异性特征。因此,不同时代,读者对同一部作品有不同的理解;不同时期,同一个人对同一部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同一部作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同时,文学鉴赏的客观规律又决定了文学鉴赏具

有共同性特征:即鉴赏的过程基本相同;鉴赏的心理活动基本相同。这些异同,是文学鉴赏研究的重要环节。

3、文学鉴赏的主观性。由于鉴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学修养等不同,鉴赏难免带有受这些因素影响的主观特征。这种主观性的形成,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文化因素,二是心理因素。它们常常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鉴赏文学作品时有好恶和偏爱。偏爱的消极作用十分明显,常常导致文学鉴赏中审美判断的片面性,造成对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的排斥,实为文学鉴赏之大忌。

4、文学鉴赏的创造性。文学鉴赏不是消极被动的过程。鉴赏者在阅读、赏析、评鉴作品的同时,必然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按自己的喜好和理解,对作品提供的艺术世界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具体对象往往是作品中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人物事件,或是人物形象的外观风貌、心理活动、内涵意蕴,或是具体事件的起因、变化及后果,既有程度的改变,也有性质的改变。但这种再创造必须建立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需要主观与客观的谐和统一。如果随心所欲地背离原作的审美价值取向,则是不可取的。

(三)方法论。主要解决和回答“如何掌握和运用文学鉴赏的科学方法,提高鉴赏水平”的问题。

1、原则方法。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1)要有审美静观的鉴赏态度。即鉴赏者要有良好的心境,强化审美意识,排除一切“非审美”因素,真正进入鉴赏的审美状态。在鉴赏过程中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距离、情绪,保持心理平和,真正达到神思同游、入情入境的鉴赏境界。(2)要懂得鉴赏的层次结构。文学鉴赏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渐进或突进过程。鉴赏者必须善于把握各个层面的不同美感和整体的美感意蕴,从形式把握与形象感受,逐渐深入到内容理解与体验,然后再深入到意蕴探究,达到情感体验与理性意识相融合,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审美境界。

2、具体方法。鉴赏者必须掌握科学的方法,方能领略和感受作品的内涵意蕴。鉴赏的具体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整体直观。即鉴赏者对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要把握和感受它的整体美,要胸有全局,通观全篇,感受作品的整体形象,从而获得完整的审美经验。鉴赏者要依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选定一个宏观把握作品的出发点,进而全面思考这部作品特别动人、特别感人的突出之处是什么,作家是如何表现这突出之处的,这在当代社会中具有何种审美价值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2)分层深入。即在文学鉴赏的过程中,鉴赏者既要较好地把握从低级向高级发展,逐步深入的心理运动过程,又要善于对文学作品的蕴涵和魅力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层层探索。首先,要确定鉴赏的方向、原则,即审美的价值取向,为后续分析和评价定下基调和方向;然后逐渐接近鉴赏的具体对象(如人物、作品技巧等),并从各个不同方面来考察对象,揭示对象外部联系的意义;接着要深入鉴赏对象的内部,分析其各种因素相互关联的内在联系的意义。最后,要通过综合概括把对鉴赏对象的认识,回到鉴赏出发点上来,引伸出关于对象意义的更深邃的见解,给作品的意义作出完整的解释。

(3)各有侧重。即要善于认识和区分不同体裁作品的不同特征,在鉴赏过程中因“体”制宜,各有侧重。小说鉴赏要充分认识情节、形式、人物形象、艺术环境、风格这五个审美要素,重情节,重结构,重形象,重技巧,从总体把握作品的内涵意蕴和艺术特色。诗歌鉴赏要充分领略诗歌的韵味和神韵,重意象,重意境,感诗情,入诗境,达到超然入化的美感境界。戏剧鉴赏要充分认识戏剧文学的综合性、程式化、虚拟性等审美特征,重形象刻画,重情节安排,重语言表述,充分感受戏剧形象的真实之美、形态之美和戏剧语言的魅力,从而获得读剧本如观戏的美感享受。散文鉴赏要全面认识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表现形式,察“形散”之奥

妙,悟“神聚”之功力,充分感受散文的形美、理美、思美。

(四)主体论。文学鉴赏的主体是读者。他的文化修养、人生阅历、以及审美趣味和审美经验,直接关系到文学鉴赏的美感享受,蕴涵理解和理性判断。分析、研究鉴赏主体是文学鉴赏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可按三个方面展开。

1、主体的审美趣味。鉴赏主体须有两种秉赋,一是对美的敏锐感知,一是对美的情感体验,而这两种秉赋的综合,就是通常所说的“趣味”。鉴赏者的审美趣味,除了一些先天因素外,主要在于后天的培养。而这种“培养”应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的发展过程。要求鉴赏者首先要认识培养审美趣味的重要意义,由趣味促进修养的提高;其次要明确审美趣味的内涵和表现,培养影响审美选择和审美感受良好的心理素质,形成审美判断的正确审美意识,逐步加深审美的情感体验,增强审美感知的敏锐性。

2、主体的鉴赏能力。即鉴赏者对文学作品的感知、理解和判断能力,是知性、悟性与理性的综合和统一。这一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和影响到鉴赏水平的高低和审美层次的不同。作为审美主体的鉴赏者,首先必须明确鉴赏能力的表现形式,增加对敏锐感知、深入理解和正确判断的理性认识,找差距,定目标,激发提高鉴赏能力的自觉性;其次必须明确培养和提高鉴赏能力的具体途径,注意从善于读书、增加阅历、加深体验等方面下一番功夫,努力做到读书入门道,感悟入情理,理解有深度,体验高境界。逐步达到敏锐的审美知觉,深刻的审美感受和正确的审美判断的完美统一。

3、主体的文化修养。文化修养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的凝结,又是它们的源头,表现为多元的知识结构、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和高雅的文化品味。鉴赏主体的文化修养的提高是一个逐步积累、不断变化的过程。鉴赏者要努力掌握基本的文艺学知识、美学和心理学知识,以及哲学与史学等门类的知识,并将其融会贯通,

灵活运用,形成较丰厚的知识修养。其次,鉴赏者要敢于选择和坚持正确的审美标准,保持独立的见解。

文学鉴赏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文学鉴赏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文艺学和接受美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主要就是与“母体”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两个层面上。

传统的文学理论体系包含着文学鉴赏理论。如今让文学鉴赏理论分离出来,这种分离是不彻底的,因此,文学鉴赏理论与文学理论体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文学鉴赏理论的独立有相对性。从文学鉴赏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建设来看,关键是两点:一是不能求纯,不能绝对划分与“母体”的界限,要容许某些理论观点在两个体系中的客观存在;二是要努力求新,既要尽量避免使用原有的话语,又要在建构新体系的同时,寻找原有理论观念的新的表现形式,要使人感觉到,文学鉴赏的理论架构不是老材料的重新拼凑,而是全新的材料,全新的结构,全新的形象。

由于文学鉴赏是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的综合,因此,文学鉴赏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有着密切关系。(1)文学批评寓于文学鉴赏之中。文学鉴赏有赏也有鉴,既有感性的赏析,也有理性的评判。评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批评。对此,钱歌川先生曾有“以鉴赏为主的批评方法”一说。鉴赏是一种再创造活动,包含着对原作品的修正,修正则必须在批评的基础上进行,即必须通过评价、判断和取舍。在这个意义上讲,鉴赏和批评相互交融,很难绝然区分。(2)“鉴赏是批评的第一阶段”——这是夏征农先生的概念。批评虽寓于鉴赏之中,但在鉴赏过程中有程度差别,着重体现在鉴赏的最后一阶段。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可分的:欣赏为批评作好准备,欣赏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可以纠正批评过程中的主观偏见,成为批评活动的可靠依托。由此可见,文学鉴赏包含文学批评,文

学批评也包含有文学欣赏的成分。这是从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实践而言的。从学科角度来看,文学鉴赏只能包含某些文学批评理论观念,但不能包含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反之,文学批评理论体系中,客观存在着文学鉴赏的某些理论观念,但某些理论观念的重合不能表明两者的等同,两者之间仍有很大差别。

由于文学接受和文学鉴赏的某些规律客观存在着相似性,这使文学鉴赏学与接受美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两者不能等同。文学接受的内涵大于文学鉴赏,前者可以包容后者,但后者不能包容前者。此外,接受美学作为美学的一个门类,虽然在探讨作品与读者的审美关系方面,与文学鉴赏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前者运用的主要是美学话语,后者运用的则主要是文艺学话语,在话语结构上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此外,在理论架构方面,接受美学突出的是文本,读者的接受心理和艺术视野,侧重的是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而文学鉴赏则是作品与读者并重,即鉴赏客体与鉴赏主体并重,既谈两者的关系,更谈作品的美感特征和鉴赏者的鉴赏能力与整体修养。如果说接受美学是通过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来阐明文学接受理论的,那么,文学鉴赏则是通过对作品和鉴赏者的分别、透彻的论述来表现出两者的关系,阐明文学鉴赏理论的本质与内涵。认清文学鉴赏学与接受美学这种既相似又相异,既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一些内涵不明、归属不定的理论观念,使文学鉴赏学在建立、建设和发展进程中,真正独立起来,以全新的面貌跻身于与其相关的学科体系之林。

①列夫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参见《西方文论选》下卷第439页。

作者吴俊忠,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518060)

责任编辑:陶原珂

鲁迅《药》与屠格涅夫及波特莱尔 有关作品比较

□ 薛 伟

鲁迅的小说创作善于“博采众家，取其所长”。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①他于1919年4月创作的短篇小说《药》，就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做粗活的人和不做粗活的人》（以下简称《做》）有着共同的内蕴，同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绳子》也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

《药》与《做》虽然体裁不同，产生的国度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内在意蕴和相近的思想内涵。

首先，两篇作品分别通过吃人血馒头和偷绳子的荒唐行为的描写，表现了人们的愚昧无知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的思想。

在《药》的年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把一个皇帝赶跑了，但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并没有完成。愚弱的国民生病不看医生，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吃人血馒头上。华老栓这个以经营茶馆为生的善良、懦弱、愚昧的市镇贫民，一生省吃俭用，为了给儿子治病而把积攒下来的银钱拿去买刑场上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人血馒头。用人血馒头治病，这本是一种迷信，华老栓却信以为真，对这种“药”寄托着无限的希望。事后，华老栓对那个靠屠杀和出卖革命者的血骗钱的刽子手还感恩不尽，把他当作“救命恩人”殷勤招待，但最后华老栓的儿子并没有幸免于死。华老栓的迷信思想给儿子带来的悲剧，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的结果。小说深刻地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现实，指出了劳苦大众在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政治压迫和精神摧残下造成的愚昧状态，这正是国民性的弱点。孙伏园在1936年11月《宇宙风》第30期发表题为《谈〈药〉》的文章，把作品中的人物分成“慈爱的愚昧，凶狠的愚昧”等四类，指出了《药》对国民性揭露的深刻之处，体现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博大精神。鲁迅曾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②出于这种改良人生的强烈愿望和

真诚态度，其小说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药》就是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深广忧愤，把国民性的问题加以深入揭示，希望得以改造，这正是鲁迅小说的杰出贡献。

《做》是一首含意相当深邃的散文诗。这篇作品是屠格涅夫在沙皇政府审判所谓“50人案”和“193人案”，对大批民粹派革命家判处流放之后写的。在这首散文诗中，作者描写了两种人物形象：做粗活的人和不做粗活的人。前者在沙皇政府统治下过着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生活，终日像牛马一样劳动；后者为了解救他们而勇敢地起来造反，成长为革命者，而被沙皇政府关进监牢，最终判处了绞刑。由于他不干活，所以手是白白净净的；又因长期戴手铐，手上还散发着铁锈味。于是，做粗活的人认为他不是他们的人，不准和他们站在一起，不但不痛恨沙皇政府的残忍、不同情革命者，反而要把绞死革命者的绳子弄到手，放在家里，以为这种绳子会给家里带来幸福。在这篇作品中，屠格涅夫和鲁迅一样，含着眼泪批判了做粗活的人的愚昧、落后、麻木，以及严重的封建迷信思想。真诚地期待着他们的觉醒。

其次，两篇作品都揭示了群众对革命的不理解和革命者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药》中革命者夏瑜的血被人当作“药”吃掉，这一方面说明了封建统治下群众的愚昧；另一方面也明显地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家本身的历史悲剧，夏瑜反清的民主思想虽然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利益，但他为革命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却不能为民众理解和同情。华老栓听到“夏家的孩子”的一切后竟无动于衷。夏瑜走上刑场，引来了看热闹的看客，他们与茶馆里的茶客对夏瑜的牺牲都没有表示任何同情。就连夏瑜的母亲，对儿子的牺牲的伟大意义也不理解，她不感到光荣，而是感到羞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这是革命者的悲哀。鲁迅在和孙伏园谈到《药》时曾说：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④资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参加反封建的民主斗争，但却没能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而革命没能成功。革命的实践使鲁迅痛切地感到唤醒民众的必要性。夏瑜的寂寞和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也不是某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因而小说使人读后产生深重的悲哀感和强烈的愤慨。鲁迅沉痛地批判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愚民政策，相信革命者的血是不会白流，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

屠格涅夫笔下那位不做粗活的革命者，也同样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他们对革命者说：“你哪怕瞧瞧我这双手吧，它们带着粪肥和柏油的气味，而你那双手倒是白白净净的。它们还散发着一股什么气味？”寥寥数语，就把一个愚昧落后的灵魂展示出来。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把幸福寄托在绞死革命者的绳子上。屠格涅夫通过具体形象的艺术描写，也对革命者脱离群众的错误进行了恳切的批评。

二

在艺术形式方面，这两篇作品也有着共同的特色。

(一)道具的艺术运用，显示了作品精湛的艺术构思。

《药》中那沾着烈士鲜血的馒头反复出现，巧妙地把全篇各部分贯串起来，构成一个艺术整体。这入血馒头就是道具，是故事的纽带。它把小说中的事件环节串连起来，使情节完整，主题更为突出。《做》虽然是散文诗，但有故事情节，有对话，具有小说的特点。作品中那条绞死革命者的绳子也起着道具的作用。诗篇中的对话和“两年以后”两个部分，就是靠这根绳子联系起来的，它也使作品的艺术结构更为完整，更有力地突现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二)两篇作品都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

侧面描写不仅是刻划人物的手段，而且对于组织情节，表达内容和深化主题也起着重要作用。《药》的第三部分，通过康大叔之口交代了夏瑜的身世、被捕经过和在狱中的表现，丰富夏瑜坚贞不屈的英雄性格。而《做》也没有直接从正面刻划革命者的革命行动，但从做粗活的人的对话中，可以知道革命者从被捕、坐牢、戴手铐到被判绞刑的经过。这同样有助于从两种人物的对比中突出革命者为

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革命精神，深化作品的主题。

(三)两篇作品都采取双线结构方式。

在《药》中，华老栓一家的悲惨命运是明线，夏瑜的悲壮牺牲是暗线，这两条线索在叙事过程中互补、交融。作者选择了刑场、茶馆、坟地作为展开故事情节的三个场面。通过刑场描写，作者把夏瑜的牺牲和华老栓买人血馒头联系起来，茶馆里群众的议论使两条线索交织，把故事推向高潮，坟地上华老栓的母亲和夏瑜的母亲相遇，使两条线索非常巧妙地揉合在一起，从而完善了作品的故事情节。《做》的显在线索是表现在做粗活的人的愚昧、落后，对革命者的不理解；潜在线索是做粗活的人造反、被捕、坐牢，直到最后被判绞刑，壮烈牺牲。两条线都是通过做粗活的人和不做粗活的人之间的对话来表现的，不是正面展现。在“两年以后”的结尾部分，两条线索又交融在一起，把情节推向高潮，使作品结构完整。

艺术的交流和影响是没有国界的。如果说，《药》深受屠格涅夫的散文诗的影响、启迪的话，那么，无独有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则是受到法国波特莱尔散文诗《绳子》的启示下创作出来的。

《绳子》描写一个流浪儿，因父母不管他的衣食住行而穿得又破又脏。一位画家把他当作模特儿画了许多幅画。征得孩子父母的应允，画家把孩子要了过来，洗净，换上新衣服。但这孩子爱吃糖果和白酒。一次，因偷画家的酒喝而被画家教训了一顿之后，这孩子竟趁画家不在家时上吊自杀了。但其父母听到画家传来的死讯后竟无动于衷，在画家要埋葬孩子时却突然闯进画家的家里，伸手去抢那吊死孩子的绳子。这让画家忽然想起，近日许多女人来信索取吊死孩子的绳子事，据说这种绳子放在家里会带来福气，于是才明白其母抢绳子的原因。波特莱尔的《绳子》，也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畸形、冷酷的病态心理和愚昧的精神状态。

①《致董永舒》，1933年8月13日。

②《两地书·八》。

③《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④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作者薛伟，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510303)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一、墓志在古代文献中的概况

《文章辨体序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据此可知：墓志乃指刻于墓碑的文章，用来记叙死者的生平和家世。它既可请人捉刀亦可由死者家属自撰。古代的墓碑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埋于地下，叫作墓志铭；一种立于地上，叫墓表文。本文所言包括二者。墓志的格式多种多样，其正体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刘勰论述墓志体例时说：“其序则‘传’，其文则‘铭’。”^①所谓“序”即志，用散文写成，叙志主身世；所谓“文”即铭，用韵体文写成，赞志主为人。当然，也可以有志无铭，叫墓志；有铭无志，叫墓铭；二者合在一起，叫墓志铭。而从广义称之，皆可叫墓志。例如，《文选》卷59“墓志”类所收《刘先生夫人墓志》一文，全文有铭无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中的《郑故处士王君墓志》、《东宫门大夫长孙府君墓志》^②等篇，全文皆有志有铭。此外，墓志在写法上还有许多变体。

关于墓志的起源，古人曾说：“石志不出礼典。”^③可见，秦汉之前还无墓志这种文体，直到汉朝，它才姗姗来迟。与诗歌、箴铭、书牋、传状相比，可

说是后起之辈了。《文体明辨序说》云：“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歿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若《蔡中郎集》所载《朱公叔鼎铭》是已。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唐语林》说：“前汉碑甚少，后汉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

论唐代墓志撰作特色及其研究价值

□ 罗维明

立碑。魏晋之后，其流浸盛。”

^④由此可知，东汉蔡邕是第一个大量撰写碑铭的名家，其作甚多，名篇有《陈太丘碑文》、《汝南周勰碑》等。但碍于此类文体特征，他的某些碑文难免有溢美之辞。他自己就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⑤至六朝，墓志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庾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之类的名作。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将墓志列为一类文体，并与“碑铭”分开，这是墓志在古文献中首次登上大雅之堂，可惜只收了一篇《刘先生夫人墓志》，且篇幅短小。到了唐代，墓志可说是蔚为大观，白居易、元稹、柳宗元等文学名家，都写了为数不少的墓志，而韩愈尤为出色，其所撰墓志作品往往具有浓郁的文学性，而在评价人物上又能做到不虚美，对当时及后世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其最杰出的志文为《柳子厚墓志铭》，文章赞美柳宗元道德文章，针砭世态炎凉，字里行间饱含哀痛惋惜之情，颇能动人心弦。唐以后，虽再未出现韩愈这样的大家，但也不乏名作。如欧阳修《泷冈阡表》不拘一格，通篇以母亲口吻，回忆家常往事，转述父亲教诲，令人倍感亲切、自然。张溥《五人墓碑记》赞颂五义士同魏忠贤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文章叙议结合，气势磅礴，充满力感，振奋人心。由于墓志代有名家杰作，人们在编书选文时总不忘给其一席之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将墓志单独列为一类，并分作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四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因袭吴讷的分类而又稍予调整，即将墓志分为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四类，而每一类又分开

立碑。魏晋之后，其流浸盛。”

列出。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将墓志列为“碑志”类，今人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列有“碑志文”一类，其中第三种即墓碑文。

二、唐代墓志的撰作特色

关于墓志的基本特征，《文体明辨序说·墓志铭》曰：“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则其文虽同，而意斯异矣。然使正人秉笔，必不肯徇人以情也。”可见，墓志有虚夸的，也有求实的。其实，即使同一人所作墓志也含有正反两种情况，如蔡邕《郭有道碑文》称赞郭太“孝友温恭，仁笃慈惠”。此即公正之论。而《太傅胡广碑》将胡广比作方叔和周公，则是虚美了。汉代墓志不多，一般篇幅较短，文字简练，语言风格肃穆雅致。《文心雕龙·诔碑》：“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思想内容多为美颂之词，即所谓“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⑥迨至六朝，墓志语言开始文学化，如庾信所作墓志清新流利，饱含深情，其《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被誉为“志文绝唱”。唐代墓志数量巨大，名作迭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1、唐代墓志语言富有诗歌、散文和史传文学的抒情意味。

墓志铭文本脱胎于四言诗，深受《诗经》及历代悼亡诗的影响。《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睍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墓慰母心。”全诗共四章，每章四句，为悼念亡母而作。唐墓志铭文深受其影响，此类四字格式尤多。如《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程公墓铭并序》：“扶疏玉笋，浩荡琼漪，纓绂荐映，声德载驰。瞻星比口，望月齐规，华宗冠冕，显族羽仪。口婴沉痼，奄歇风烟，松低落日，涧咽悲泉。雾昏埋陇，云愁暗天，芳仪已掩，令范长悬。”无论内容或形式，该铭文都深深打上了四言诗的烙印，而且铭中用了许多形象的比喻，渲染了一种伤感的氛围，较

好地表达了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又韩愈以古文笔法写墓志，颇能表现人物性格，他还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因而其所撰墓志用语洗炼，富有变化，将呆板的墓志改进成优美的散文。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形象地刻画了王适“怀奇负气”的傲岸个性，《柳子厚墓志铭》融记叙、议论、抒情为一体，句式多变而有情致，抨击了世俗的势利，抒发了心中的愤懑。韩愈往往还借鉴史传文学的手法来写墓志，人物性格呼之欲出。墓志与史传文学，形式上皆为庄严文体，要求叙说人物一生，其主角多为缙绅、士大夫之流。但墓志一般叙事简单，多用概述之语，并往往抽象赞美志主，无需形象描绘，也不用展现人物个性，而史传文学则要着重记叙事件的进展，再现人物性情。不过，优秀的唐代墓志突破了自己的局限，如韩愈的《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道：“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门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适，愿见将军白事。’一见语合意，往来门下。”其中便借用了史传文学的笔法，以细节描写突现人物性格，展现其时情景，可谓绘声绘色，跃然纸上。正如刘勰所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⑦

另外，唐代墓志篇幅增长，容量扩大，为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唐代墓志汇编·张氏亡女墓志铭》写道：“及抱疾弥留，忍恨诀别，予与其母亲对之悲泣，乃曰：‘死生之理，彭殤一致，何不思某气绝之后，与未有某时何异。奈何不以此割弃而悲泣如是乎？’呜呼，婉之聪明孝友柔口敏悟也如此。予方求贤口，未遭良匹，天不与命，何哉？”此乃父亲为亡女所作墓志，为父的目睹聪明伶俐的爱女夭折，痛惜之情溢于言表，语言自然不会板滞，而显得情意深长。其铭文也突破了四字一句的板块格式。怨天恨地，韵散二体兼用，哀叹老景凄惨，伤心女儿早逝，感情如潮水倾泻，奔腾澎湃，句式灵活多变，铿锵有力。又《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君墓志并序》，其志文 2200 字，铭文 48 句，真乃洋洋大观。诸如此类长篇巨制的出现，克服了早期墓志体制短小的缺陷。

2、唐代墓志大量用典,形成温文尔雅,含蓄婉转的文风。

委婉语在社会生活中使用得非常广泛,而在唐代墓志中更是频繁出现,色彩缤纷,五花八门。于海江说:“委婉语的产生与语言禁忌有关。语言禁忌起源于人们对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错误认识,即把名和实等同起来。能够引起恐惧的事物,在语言中也不能提及。死是人最忌讳之事,而墓志每篇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于是只好求助婉语。据摩尔根描述的古代社会,先民对死亡甚感恐怖和神秘,因此特别忌讳。汉民族也不例外,他们视“死”字为极不吉祥,千方百计回避此字,这是一种语言灵物崇拜现象,“死”成为根深蒂固的语言禁忌。这种先民的普遍心理,经过代代相传,已积淀为汉民族的共同意识。通观《唐代墓志汇编》,全书400万字,总共3608篇,每篇皆须涉及“死”之含义,且大多数在几次以上,而直接用“死”字的极为罕见(并非没有),故估计其中婉称“死”字当不下万次。这种讳“死”心理延至今天,现代汉语对死亡又有了许多新称呼。除“死”之外,唐代墓志还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婉语,它们多由用典而来。如用“投钓”喻求仕,用“怀橘之年”、“对日之年”指人幼年时期,用“梦楹”、“摧梁”称人之丧亡,用“靡他”、“靡他之志”表示妇女不改嫁。以上皆用事典。唐代墓志还有很多典故来自前代有一定出处的词语,即所谓语典,如用“劬劳”、“劬劳之恩”表示父母养育之恩,用“于飞”喻人怀有远大志向,用“所怙”、“所恃”分别借代父母亲,用“藏山”喻人之生命昙花一现。唐代墓志遣词造句就是如此喜用典故,正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形成了一种庄严肃穆、雍容典雅的风格。客观地讲,墓志语言同日常用语是有一段较大的距离的。部分墓志受古文和史传文学影响,使用了一些口语词,文风比较活泼。但因这种文体本身需要,多数文章还是因循固定的模式,言语深奥雅致,同活的大众语言保持很大差距。因此,墓志此类语言只能流传于高层知识界的圈子里。其长处是语法及用词较为规范,故在知识界易于理解和传诵,且千年之后其所

传递之措辞方式仍然能被人接受。反之,口语词过多之典籍,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通俗易懂,生动流畅,因而传播力强,覆盖面广,但由于时代变迁或地域间隔过于遥远,反而会为自己设置层层障碍,较难让人读懂。文字之重要功能是弥补口头语在时空方面的局限,墓志语言在此显示了特殊的优势,它是一种准共同语,凡具有文言文各种必备的修养,则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准确将其破译。从这个角度而言,墓志语言之生命力是颇为旺盛的。

三、唐代墓志的研究价值

唐代墓志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本文只谈两点。

1、唐代墓志的文化学价值。

语言是文化的反映。唐代墓志有些词语含有文化色彩,透过这些词语,可以看到一幅中国民俗画图。首先,墓志反映了崇尚官位和祖宗的心理。中国封建社会为官本位制,官最能体现个人的身份价值,以官职称人乃对其极大之尊重,所以“大夫”这一官职可用来尊称父亲,另可用“先大夫”、“先夫人”来尊称亡父亡母。古人又重祖宗,“烈曾”、“懿曾”、“曾皇”和“曾皇父”等词语充满敬仰祖先之色彩。唐代墓志还往往极尽其辞虔诚颂扬祖先的显赫地位和光辉业绩,而且在叙述家世时定要攀连历史上显贵之人,时常直至本姓历史上最为显耀者,把他当作家族的开山人物。其次,墓志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一些伦理观念。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制以男性为主体,父亲为一家之主,故称之为“天”,母亲为从属地位,故连带谓之为“地”,二者上下极为分明。又古代社会夫尊妻卑,故“天从”、“天夫”、“夫天”皆为女子对丈夫之尊称。上述这些词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和夫权制,它们享有无上的尊严和权利。不过古人又重孝道,故对子女而言,母亲在“二天”或“天地”之中亦占有一个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墓志中有丈夫称妻子为“良人”的用例,这显示了温良谦让的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词语札记

□王小莘

翹

“翹”本指鸟尾之长毛，在魏晋南北朝引申发展成为活跃的构词语素。

1、其突出、杰出等引申义，组成“翹秀、翹俊、翹特”等，表示优秀人才。如《颜氏家训·文章》：“凡此诸人，皆具翹秀者。”《颜氏家训·集解》引卢文绍说：“翹，高貌。翹秀谓其出拔尤异者。”《抱朴子·汉过》：“官高势重，力足拔才，而不能发毫厘之言，进益时之翹俊也。”同书《正郭》篇又称：“杜宗拔萃翹特”。“翹烁”也指杰出有光彩，如《高僧传》（南朝·梁·慧皎著）卷四：“曜翹烁之姿，于盛明之世。”

2、以发展出殷切、诚恳义，组成“翹心、翹诚、翹感、翹励”等词（均见于《高僧传》）。如卷二：“烧香礼拜，翹感旧迹，如睹圣仪。”卷三：“翹诚恳恻，忻请舍利。”等。

3、又指勤奋努力，特指带着虔诚之心的勤奋努力，组成“翹勤”，为《高僧传》之习用语。如卷一：“慧远法师，翹勤妙典，广集众经，虚心恻席，延望远宾。”卷五：“礼忏翹勤，

除此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墓志中可用“崩”来指一般人之死。而中国早期的封建礼法明文规定：“帝后之死曰崩。”另依等级不同，还有薨、不禄、卒等说法。古代的正统典籍大致符合这个规定，而对“崩”字把关最严。不仅正史及其他官编典籍，即使是私人笔记、诗文集之类书籍，亦难见此用法，而在唐代墓志中却屡见不鲜。究其原因，盖墓志乃私家撰述，墓表文除立碑外，一般不会公之于世，而其它墓志乃是深埋于地下，无被人告发之忧。在这盖棺论定之际，便将皇帝的荣耀移给死者，让其享受平时未有之待遇，也算是对死者一种最好的安慰吧。其中潜伏着自由平等意识，不乏积极意义。

2、唐代墓志的语言学价值。

唐代墓志对于研究汉语之词汇史也有重大价值。研治语言词汇之发展史，应当尽量利用现有的一切文献材料，不然就难于作出周全的结论。而唐代墓志不仅可提供原始材料作为研究其它典籍的佐证，更在于其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宝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唐代墓志拥有大量特殊的词语。这些词语不仅各种辞书失载，而且在其它各类典籍中也较为少见。如用“家门、大门”分指父亲和祖父，用“二天、天地”指父母，用“三从”合称父、夫、子，用“天从、天夫、夫天”指丈夫等。此类用法新颖奇特，为考查汉语称谓提供了语言史的材料。另如“刘兰、珠焚、丧美、藏山、埋金、梦琼、摧梁、梦楹、丁罚、靡他之志”等词语，亦皆为辞书所失收，而诸如此类的用语对研究汉语词汇的演变又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①⑥⑦《文心雕龙·诔碑》。

②《唐代墓志汇编》第7、40页。

③《昭明文选》，中州古籍1990年版第826页。

④《唐语林》卷八第270页。

⑤《后汉书·郭太传》。

作者罗维明，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510400)

责任编辑：陶原珂

誓生兜率。”卷七：“率众翘勤，禅礼无辍。”“翘勤”也指一种虔诚景仰的心情。如潘岳《西征赋》：“心翘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

《汉语大词典》在“翘”的单字条下未列以上殷勤、恳切、勤奋努力等词义；“翘勤”条下仅释为殷切盼望一义，尚未能全面反映“翘”在魏晋南北朝的词义。

细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指出：“曾经有一个时期，‘细’字扩到兼表‘小’的意义。”据魏晋南北朝作品看，“细”字用法的宽泛，可能比上古更突出。如《高僧传》卷一：“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语之曰：支郎眼中黄，身驱虽细是智囊。”“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卷十二：“瑜房中生双桐，根枝丰茂，巨细相似。”卷十三：“初受业广安乐辩公，备得其法而哀婉细妙，特欲过之。”“少于气调，殊有细美。”“欲造丈六金像，用铜不少，非细乞能办。”《六度集经》卷二：“吾有两儿，皆尚微细。”可见“细”可以用来形容声音、书写，人的身体、年龄，甚至物资的备办等，既和“大”相对，又和“粗”“巨”相对。中古是“细”词义扩大的一个重要阶段。大约近代以来，“细”的应用范围逐渐缩小，现代汉语中除少数方言（如粤方言外），“细”只是“粗”的反义词。

穿、著

“著”本义附着；“穿”本义穿凿。关于“著”与“穿”开始具有“穿戴”义的时间，一些汉语史著作（如潘允中先生的《汉语词汇史概要》）把它定于唐代，《汉语大词典》给“穿”字的这一义项首举宋例，让人误以为这个词义迟至近代才出现。《辞源》则未收“穿著”一词。

其实，“著”的“穿”义已是魏晋南北朝的习用义，不仅可用于指穿衣，且可用于戴帽。在《世说新语》此义 28 见，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词典》已有论及，此处不赘。在《高僧传》中，此词也多用，除穿衣戴帽外，还可指穿鞋。如卷九：“时魏且有一流民，莫识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县市乞丐。”卷四：

“潜恒著履至殿内。”卷十一：“俄而有人著帻称珠欺王。”“穿”的穿戴义，在《世说新语·雅量》中亦见：“庾时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穿取。”“著”的“穿”义产生后，使用频率远远高于“穿”，且“穿著”连用，已见于《颜氏家训·书证》篇：“‘擻’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义。”此时已透露了“穿著”凝合双音词的信息。

佳、快

“快”在魏晋南北朝有“好”义。如《三国志·华佗传》：“快自养，一月可小起。好自将爱，一年便健。”《搜神记》卷十一：“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高僧传》卷七：“（观）乃著法华宗要序以简什。什曰：‘善男子所论甚快’。”《周书·达奚武传》：“梦见一白衣人来，执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此义一直沿用到近代，如《夷坚志》卷六：“尊官大好，然须过六十方快。”“好、快”互文见义。元杂剧中“命快”与“命不快”即表示命运好与不好。《广韵》曰：“快，称心也，可也。”成语“拍手称快”保存了此义。

向熹先生在《简明汉语史》中将《颜》书上“佳快”例句释作爽直，程小铭先生《颜氏家训全译》将《杂艺》中的“才学快士”译作“有才学的豪爽之士”，均可商榷。“快”确有豪爽义，如《旧唐书·张延爽传》：“武人性快”即是，但用于《颜》书却未贴切。《汉语大词典》在“佳快”条下引《颜》例，释为优秀；在“快”字条下亦引此例，释为爽直、爽快。一例异训，是为粗疏。

刚、强、软、弱

“刚、强”都是同义词，都有“坚硬”之义，古今如此。然而，“刚、强”在中古另有“干、稠”之义。《齐民要术》卷七用“刚”字此义达 7 次，“强”达 4 次。如《造神曲并酒》：“漉时微令刚，足手揉为佳。”“其和曲时，面向杀地和之，令使绝强。”第一例“微令刚”指调和作酒曲的粉状物时少加水，使之稍稠结；第二例“令使极强”指使酒曲极干稠。《笨曲并酒》：“细者酒不断，粗，刚强难押。”“漉曲欲刚，洒水欲均。”“势盛不加，便为失侯；势弱不减，刚强不消。”第一例“刚强难押”指太干

硬了不好压；第二例“溲曲欲刚”指拌酒曲粉时宜干稠；第三例“刚强不消”指干硬的饭不消融。以上例句用“干”“稠”作释比解作“坚硬”都更为贴切。

这种用法的“刚”“强”和“泽”“淖”构成反义关系，也见于《齐民要术》。如《造神曲并酒》：“大都欲小刚，勿令太泽。”《醴酪》：“煮令极熟，刚淖得所，然后出之。”《饼法》：“泽”“淖”指水份多，“刚”“强”则相反，这也是“刚”“强”与“干”“稠”义近的证明。如此，“刚”和“强”在新的义位上同义，而和“泽”“淖”及“软”“弱”构成了双边的反义关系。

通感

此词《辞源》未收，《汉语大词典》只立“修辞手法之一”一个义项，只引现代用例。其实，这个词早在南北朝已使用，《高僧传》中即数见。如《序》：“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运化，则强暴以绥。”卷五：“终日像圆光奄然灵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谓翼之通感。”卷七：“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卷十三：“法献专志于象牙，竟陵为之通感；僧护蓄抱于石城，南平以之获应”中，“通感”与“获应”互文见义。捉摸文义，“通感”皆指人神间的交感互应，由于人对神的虔诚而取得感应，词义与“通灵”接近。

消息

王利器先生在《颜氏家训集解》说：“是消息为颜书习用语，寻汉魏六朝人消息都作斟酌用”，其下援引十余则用例，于末下断语曰：“义俱作斟酌”。此处不误。然而，“消息”一词不仅是《颜》书习用语，而在魏晋六朝作品中普遍见到，当属时代习用语。

“消息”源出于《易》，是表消长，盛衰的反义并列组合。六朝仍沿用上古义，如《世说新语·政事》：“天地四时，犹有消息。”《搜神记》卷五：“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物”等。由此义辐射引申，在魏晋六朝迅速产生了斟酌、调理、调养、休息、音讯等义蕴，均为此期常用义。

如调养、休息义，《世说新语·品藻》：“往与凯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句为调养义，

《魏书·彭城王刘勰传》：“人挽而进，宴于禁中，至夜皆醉，皆各就别所消息。”句中，为“休息”义。

又如讯息、征兆义，在《淮南子·缪称训》：“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离朱弗能见也。”句中，表“征兆”；在《泰岳府君记》：“从长安还，欲启消息”，《晋书·陆机传》：“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等例中，皆表“音讯”。此义在东汉蔡琰《悲愤诗》：“迎问具消息，辄复非乡里”中已见端倪。

即以王利器先生所列诸例看，也至少包含了五种意蕴：(1)并列组合表增损，如《抱朴子外篇》：“潜初正五，与时消息。”(2)减轻，如《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消息繇赋，政不苛烦。”这当是由(1)义的偏指得义。(3)休养生息，如《风俗通》：“言消息百姓，均其赋役。”又为休息，如陆云《与兄平原书》：“若消息小住，愿兄可试作之。”(4)调养、调理，酈炎《遗命书》：“消息汝躬，调和汝体，”消息与调和互文见义。(5)斟酌，《晋书·慕容超载记》：“其令博士以上参考旧事，依吕刑及汉、魏、晋津令，消息增损，议成燕津。”该例后所引《宋书》、《齐民要术》例同此。以上句例，用“义俱作斟酌”实难函括。

《玉篇》野王案：“消息犹斟酌也，这是对“消息”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核心义位的概括描写，但并非此期的所有义位。除了上面涉及的诸义外，此期尚有问候、照料、敬奉等义，篇幅关系，本文不作论列。中古是汉语许多词语词义迅速孳乳拓展的重要时期，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尽可能对这种现象作出揭示和反映。

参考书目：

《辞源》《汉语大词典》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

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著作

张永言《世说新语词典》

作者王小莘，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510631)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及早期特征

□章权才

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赖以统一、独立和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具体而言,它内涵着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动态系统,它有一个生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萌生阶段;一是汉唐至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阶段;一是近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化阶段;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得到空前大发展。

“中华民族”的概念,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我们同意费孝通的见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多元”性。它是中国各民族包括历史上曾经出现而今已消失了的诸民族的总称。今天,则是指生活在中国版图内的56个兄弟民族以及散居于海外中华儿女的

总称。二是“一体”性。一体性就是共通性,就是归属感,就是稳定性。同祖、同根、同文等等,就是属于一体性方面的内容。与多元性相较,一体性无疑处于更高的层次。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征,在民俗学方面也有充分的反映。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是吉祥的象征。人们把中华文化称为“龙的文化”;把中华民族称为“龙的传人”。在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龙形饰物,但图案不尽相同。图案与各氏族的图腾显然有联系。后来,龙的形象逐渐归一:“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龟,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它“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的众多特征,体现了许多部落部族图腾崇拜的集合和发展,它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我国有一位考古学家叫苏秉琦,围绕中国古文明的发生问题,发表过很具特色的意见。他说:“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所谓“一支蜡烛”,指的是一元发生论,所谓“满天星斗”,指的是文明起源的多元性问题。他的理论取向无疑很具启发性。

我国疆域辽阔,许多地方都适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证明了我国人类进化自直立人(猿人),经早期智人(古人),至晚期智人(新人)的各个阶段没有缺

环,可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深具说服力的进化系列。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记述,中国大地上埋藏着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约 300 处,它们的分布面包括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东南至台湾台南,西南至云南丽江,东北至黑龙江哈尔滨,北方至内蒙古乌审旗都已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在青藏高原 4000 米以上的地方也发现了旧石器,可以说这是考古学史上的新记录。它充分说明,早在晚期智人阶段,中华大地上已普遍有了人类活动,各自缔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新石器时代是以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以及磨制石器与纺织术的出现为其基本特征的。中华新石器文化同样呈现多元性。到目前为止,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均已发现新石器遗址,总共有 7000 处之多。依据各地所发现的新石器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性与相互关系,可以归纳为既是多元区域性发展,又具有统一性与内在联系的特点。

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了中华大地的远古时代实际上存在过许许多多创造这些文化的氏族和若干部落集团。文化史家徐旭生认为,中国远古部落大致是由三大集团构成的:一是地处西北的华夏集团;一是地处东方的东夷集团;一是地处南方的南蛮集团。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可以讨论,但他认为三大集团经过长期交往、斗争,终至融合成为华夏,即后来汉族的前身,这个观点是可取的。

按照《国语》、《世本》、《大戴礼记》中的《帝系》和《五帝德》的记载,中华民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和黄帝。在距今大约 5000 年左右,黄帝、炎帝联合起来与九黎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九黎战败,首领蚩尤被杀。随后,炎帝与黄帝又大战于阪泉(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县盐池),炎帝战败,黄帝当上了大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战争与融合,反映了黄河中下游东西两大氏族部落集团之间的长期交往、相互影响,以至结成较为稳定的部落联盟的历史过

程。

黄帝以后,尧、舜、禹相继成为大首领。这实际上是以选举的方式推举部落联盟的最高领袖。而“华夏”即中华民族的最初形态,也就孕育于尧、舜、禹相继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历史过程当中。

“虞”是先夏的一个世代。据《史记》、《大戴礼记》、《帝王世纪》等载,虞舜母族太昊部落称“华胥”。虞舜又名“重华”。以虞舜部落为首所建立的部落联盟,加入联盟共同体的各部落则称为“诸华”。这也就是“华族”的最初形态。

“华族”以外又有“夏族”。在古史研究中,有“东华西夏”说。大意是:“华族”发端于东;“夏族”发端于西。这个立论是有历史根据的,《孟子》和《史记》都提供了这方面的根据。在舜的时代,华族主要活动于山东一带和河南东部。它的势力逐渐由东向西发展。夏族则主要活动在河南西部和陕甘一带,它的势力则逐渐由西向东发展。由于势力范围的扩展,东华西夏终于出现碰撞。由于碰撞,“华”与“夏”之间也就有了吸收,有了扬弃,新的文化形态即“华夏”形态也就被历史地创造出来。

考史,“华夏”作为特定概念,在先秦典籍中业已出现。比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就有“楚失华夏”的提法。经过夏、商、周三代,“华”族与“夏”族进一步融合,在文化形态的共同性方面又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到春秋、战国时期,“华”与“夏”已相提并论,已经不能把两者明显地区别开来了。

有一种说法:一部先秦史,就是一部“华夷对举”的历史。根据是《左传》定公十年所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句话。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似有偏颇之嫌。事实是:华夷关系是一个变化的历史过程。在虞、夏时代,华夷之间很难区别。《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六国年表序》也说:“禹兴于西羌”。由此可见,虞、夏时代,华夏与东夷、西羌之间并没有划下不可逾越的鸿沟。“华夷对举”,这是春秋以后的事情。这个时候的“华”,指“华夏”,指“中华”,指“中国”;“夷”

则指中原以外的诸边,指诸边的少数族。这个时候的“华夷对举”,体现了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还体现了文化形态上的不同层次。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中国这一名称,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的地区。从历史记载看来,秦以前,华夏族称它的祖国为中国,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这个观点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是同步进行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因果。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跟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这里得天独厚,特点鲜明。首先,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具体而言,其西北为帕米尔高原,西南有喜马拉雅山,北方为广漠无垠的草原与沙漠,东面自黑龙江东部沿海直到东南沿海,足足有二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其次,这里存在自西向东的落差显著的阶梯,西部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第一阶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与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相间分布,海拔在2000米至1000米之间,是第二阶梯;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等,平均海拔不超过500米,是第三阶梯。如此落差显著的阶梯,就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再次,中华大地从南向北,跨越了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五个气候带,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经济区,即东部的农业区与西部的草原游牧区。这两个经济区分布清楚,但又相互依存,互为补充。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中华民族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民族的先民自古以来便孕育出如下几种颇具特色的思想意识:一是自我中心意识;一是安土重迁意识;一是和衷共济意识;一是反对外来压迫和干扰的意识。诸如此类的意识,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萌生和最初表现形态。

水,对华夏各族人民来说,不仅是生命之源,而且是促使各族人民由分散走向联合、由部落联盟走向国家统一的凝聚动力和纽带。黄河是华夏各族人民的母亲河,它给各族人民提供了舟楫灌溉之利,滋润了中原一带农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黄河又是一条喜怒无常的巨龙,每到汛期它便翻腾咆哮,给两岸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因此,中华各族人民很早便走着共同治水的道路。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故事,很早就受到人们的传扬。禹的业绩是了不起的,但他毕竟被神化了。治水是一项艰巨事业,靠少数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中华民族是靠整体的力量治水的。禹之前,各个部落都参加了治水,比如共工氏就曾为整治水灾出过大力。同洪灾搏斗的过程,也就成为氏族社会改造,部落联盟逐步扩大,小的部落逐步融入以炎黄为核心的中原部落联盟的过程,也是中原一带以农业为基础的共同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的过程。

夏代以降,下迄商、周,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如果说,夏代以前中华民族凝聚力有了萌生;那么,夏代以后,中华民族凝聚力则有了初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原一带华夏族以农耕为基础的共同经济生活内涵发展了。夏朝活动的地方,主要集中于河济流域和河洛流域,这里正是适合原始农业生产的地方。从夏禹治水和整理沟洫的传说来看,当时的华夏族已经有了原始的灌溉技术。孔子有“行夏之时”的说法,表明夏朝有关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积累起来。与夏朝相较,商朝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农业生产采用井田制进行。井田就是方块田,这可以从甲骨文中的一些象形田字得到证明。井田制既是一种土地制度,又是农业劳动力的组织方式。这种制度估计起源很早,但到商代普遍推行。商代农业的特点是强迫奴隶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作。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王大令众人曰鲁田!其受年。”的记载。生产规模扩大了,粮食收获更多了,在殷墟发现的用以贮藏粮食的窖穴整修得更加讲究了。周

代的农业更加兴盛。周代的井田制,在商代的基础上更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已经有了较完整的灌溉系统和比较准确的亩制。周代的耕作规模更大,《诗经》中就有“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记载,说明耕作时,有时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出动。夏、商、周三代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发展,促进了国家内部经济部门的分工和彼此之间联系的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安土重迁思想也强化了。如此种种使中原一带华夏族内共同的经济生活有了新的表现形态。

(二)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国家统一局面发展了。夏、商、周三朝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在集权与分权的矛盾运动中逐步加强的。一方面,有中央政府,有统一意志;另一方面,各代又有分封,又有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集权与分权存在矛盾,而矛盾的主导方面则是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意志,夏、商、周三代毫无例外地都曾对地方分权势力实施打击。西周时期,中国在奴隶制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实力比较强大的统一国家。周王成了全国的共主,他统辖着全国的军队,执掌着官吏的任免,控制着全国的赋税财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西周统一政局的深刻描述。西周政治统一造成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统一的政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各家各派在理论体系上千差万别,可是在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这个重大问题上,却是一致或大体接近的。儒家固然力主统一,墨家、法家等也同样赞成统一。这种现象说明,西周以来业已存在的政治统一,已经成为一批政治家的价值取向。

(三)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发展了。中国的奴隶制是宗族奴隶制。所谓宗族奴隶制,就是国家一方面是由一整体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族实施统治;另一方面,所有奴隶都属于基于统治地位的宗族所有。商代是子姓统治,周代则是姬姓统治。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是逐步发展的,到周代则走上成熟。周代确立了一套比商代更加系统的宗法制。在宗法制下,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天子自称是上帝的长子,政

治上的共主,天下的大宗,而各同姓诸侯国则是小宗。各诸侯国对天子说虽是小宗,但在其国内则是大宗。王位和诸侯国的君位一般都是由嫡长子继承。严分嫡庶长幼,立嫡立长,是宗法制的准则。宗法制不仅适用于周室同姓间,而且同异姓诸侯也有关系。周制,同姓不通婚姻,而异姓间则互为婚媾,所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宗法制又被用来区别贵族的等级,形成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阶梯。这样,奴隶主贵族就通过宗法制度建立了一套周密的统治网。这个统治网当然也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由于这种网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存在着认祖同宗问题,因而在促进社会个体的凝聚方面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

(四)以语言文字为纽带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发展了。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字的发明非常重要。人类社会正是有了文字发明和应用才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国的文字发明始于何时?许慎说是始于黄帝,他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他认为,中国的最早文字是黄帝时期的史官仓颉发明的。这个观点的是与非,可以存而不论。又有陶符乃文字起源说。所谓“陶符”就是出土于半坡遗址的陶钵口沿上刻划的符号。郭沫若说:“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这个观点也可以见仁见智。但从殷墟发掘出数量极多的甲骨文,表明商代中国文字已经基本成熟,这个观点是不可辩驳的。从已出土的甲骨文可见,商代人所使用的单字,至少在3000以上。在文字构造方面,前人总结有“六书”,所谓“六书”,就是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通过分析,可知甲骨文是“六书”理论的最早、最基本的实际根据。周人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商代已有比较进步的文献记录。商代流行的文字直接影响到周代。在商、周时代,中原一带流行的文字无疑是统一的,后者之于前者有承袭关系。围绕中原的周边各部落,如巴、蜀、

吴、越、楚等等，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都先后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方块字。尤其是华夏与楚两大语言相异的民族，因文字的归一，最终融为一族，使得内容丰富的楚文化融入了华夏文明。除了文字，还有语言，春秋时期各国的共同语言又称“雅言”。有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当然也就有了共同心理素质的缔造。结果，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又跨前了一步。

(五)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各族人民的交往与融合发展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境内各族不断发展和融合同化的过程。这时候，地处中原一带的华夏族更加发展壮大；而周边各族也在跟华夏族的频繁交往中不断被融合和同化。这种民族大群体的形成，正是日后中华民族主要组成部分的汉族的前身。周朝时期，是华夏族与周边各族的关系空前密切时期。周族与西北戎狄之间的关系一向较好。据载，周族在其先祖不窋时代，曾经“自窜于戎狄之间”而和他们杂处，可以说，周族是在戎狄中发展起来的，彼此互通婚姻，没有什么界限。周朝与东边的夷族，关系也很密切。蒲姑和奄，是东夷族聚居之地，齐国曾都于蒲姑，鲁国都于奄，都促进了周族与东夷族的交流和合作。周族与南方的巴、濮、楚、邓，有时对峙，有时合作。其中实力最强的楚国原是商的盟国，这是后来楚、周一度对峙的重要原因。周昭王曾派兵攻楚，结果死于水滨。但征楚的过程，也就是周楚之间加深了解和加强联系的过程。商周时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居住着古代的越族。商代与越族有接触，但关系还不能算是密切的。但到了周代，情况不同了，周族不仅与越族有了密切的文化关系，而且有了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可以从安徽屯溪和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古墓看出。屯溪古墓出土了一批随葬器物，有些器物与中原出土的西周墓葬器物大致相同。丹徒烟墩山古墓随葬器物十分丰富，其中宜侯矢簋记载了周初分配给奴隶主贵族们奴隶、土地、牛、弓矢等事，说明了墓主人的身份显然是西周贵族。这些事实表明，西周政治势力无疑已达到了长江流域的

越族地区，周族与越族的交流已日趋频繁。后来到了春秋时期，越族的社会经济在和中原地区青铜文化逐渐融合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端期。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有着如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一)崇奉炎黄。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发端期的重要人物，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大作用。他们被中华民族尊奉为“祖根”。夏、商、周三朝族别不同，发祥地各异，但都以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周边各族，许多则是以炎帝为自己的祖先。先秦许多典籍如《左氏春秋》等，都以炎黄为讴歌对象。从此，炎黄文化成为一种反映共同民族感情的联系纽带，体现和包融了华夏多民族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自我意识。

(二)重视血缘。夏、商、周三朝，实行宗族奴隶制，这是重视血缘。三朝实行宗法制度，这也是重视血缘。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的择定，这同样是重视血缘。强调血缘，重视亲缘，重视伦理道德，是先秦时期各家学说尤其是儒家学说的显著特征。它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把分散的社会细胞维系在一起的作用。

(三)向往礼义。先秦时期，各朝各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普遍重视道德理想的追求，普遍强调文化精神价值的可贵，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就是希望把中国建成“礼仪之邦”。但是，实际情况是，地处中原一带的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他们不是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这是一个差异，差异也就是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一个理论主张，这就是高势文化要帮助低势文化，低势文化要向高势文化靠拢的主张。孔子提出的“严夷夏之防”和孟子提出的“以夏变夷”的主张，从精神实质上说，就是旨在解决夷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的主张。“严夷夏之防”，这个“防”，着眼点即在礼义道德。行为不合礼义道德，便以夷狄看待；合乎仁义道德，便以中国看待。这个理论主张和理想追求，在促进民族凝聚方面无疑起到积极的导

·精·神·凝·聚·力·论·纲·

□刘学谦

精神凝聚力是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思想整合现象。当某种精神因素,如对某物、某人发生的崇拜,对某种学说、观念、理论形成信仰,对某种文化、传统习俗给予认同等,使一定范围的群众由某种精神因素而集合、聚集在一起,为同一目标而奋斗时,这就是精神凝聚的力量。精神凝聚力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纵观人类发展史,有无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往往具有重大意义。许多历史事实都表明,人心散而国必散,人心聚而国必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加强对精神凝聚力现象的研究,掌握其特点和规律性,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增强当代中国的精神

向性的作用。

(四)讴歌群体。推崇群体,宣扬群体至上,是先秦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大禹治水无疑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群体行为。《论语·雍也》载孔子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孔子的仁学就是强调个人、部分结合为整体,亦即强调社会的整合。在《王制》中,荀子指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能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这种群体主义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增强显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与群体共存亡的观点一旦转化为民族传统意识,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五)追求统一。夏、商、周三朝,虽然实施分封,小国林立,但在政治上仍追求统一。朝廷仍要确立自身的“共主”地位。防范和治理水患,也必须经由朝廷发号施令,组织力量。小国对中央的权威发起挑战,一般都

凝聚力,实现长治久安,显然是有现实性意义的。

一、精神凝聚力的起源与发展

精神凝聚力作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精神活动现象,它不可能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而独立产生、存在和发展。它是人类群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的思想意识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意识、观念、崇拜物来统一、规范人的思想,形成“我们”区别于“他们”的心理标志,达到群体成员的内在归属和外在合力而必然产生的一种精神现象。但是,精神凝聚力同其它任何精神现象一样,又有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构成了自己独特的起源方式和发展轨迹。

(一)“图腾”崇拜凝聚力的出现是精神

要受到中央的打击。西周建立的王朝,是奴隶社会时期最有权威的王朝。春秋战国之际,群雄割据,而诸侯争霸也是旨在重建统一的局面。这个时候,学术思想界也存在着大量的追求统一的舆论。《公羊传》为《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作注脚,就明确指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曷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儒家者流追求“大一统”的指导思想是一清二楚的。孟子鼓吹“定于一”的思想,这也是大一统的思想。“大一统”作为思维框架和价值取向,春秋战国以后,也就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章权才,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冯生

凝聚力的起源阶段。精神凝聚力就其简明意义来说,是指某种精神对人产生的吸引聚合力。但是如果某种精神只对某个人产生吸引力而不对群体产生吸引力,那么这种吸引力就不能称作凝聚力。根据一些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图腾”意识是人类最早的共同意识,图腾信仰是人类最早的宗教信仰。很显然,当“图腾”意识这个“共同意识”出现时,精神凝聚力这个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也就诞生了。在原始社会,图腾意识作为氏族成员的共同意识,是维系和联结氏族成员的精神支柱,是连结氏族成员心灵的纽带。所以,C·II·托尔斯托夫指出:图腾意识是“群体联系和内部统一的意识形态……。”^①罗伯逊·史密斯在研究氏族图腾动物的功能和作用之后也得出结论说,图腾动物是氏族的神圣动物,其血被认为是氏族统一的象征,是氏族和氏族神统一的象征。图腾像一种粘合剂,紧紧地吧氏族成员凝聚在一起。只要图腾相同,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彼此就能够互相支持、帮助,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氏族精神凝聚力。

(二)宗教信仰凝聚力是精神凝聚力发展的最普遍现象。就图腾的属性来说,它也属于原始宗教的一部分,但真正意义的宗教,还是众多人从众多神发展到有了一个共同的神之后。众人通过对一个特定的神的信仰和崇拜,起着精神上的统治与聚合作用。正因如此,宗教总是被以往的统治集团或统治阶级所利用。当宗教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时,往往宗教本身也获得极大的发展,宗教凝聚教徒的人群范围不断扩大,宗教精神凝聚力不断增强。这种现象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普遍存在。《易经》中就有“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说法。《礼记》中所说的“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更直接地把宗教看成是教化人民,维护统治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西方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位国王、皇帝或总统不是利用宗教来为他们统治民心、聚合民心服务的。艾森豪威尔在其当选总统后宣称:“美国的伟大,它的力量和天才首先是建立于它的人民的宗教精神上。”^②1955年,他又说:“承认

上帝的存在是美国作风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表现。没有对上帝的信仰,既不可能存在美国政治体制,也不可能存在美国的生活方式”。^③宗教所给予统治者强大精神统治力量,是其它手段所不能替代和不能比拟的。正因如此宗教能够在统治阶级的庇护、支持和协力下,成为跨国界、洲界为世人所信仰的、最普遍的精神凝聚力现象。

(三)历史文化凝聚力是精神凝聚力发展的积淀过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往往是有历史继承性的。这种继承性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对该国或该民族所保持的凝聚力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是离不开精神凝聚力的。但要把这种精神凝聚力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保持下去,就必须把精神凝聚力的源泉和动力变成历史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凝聚力就成了精神凝聚力的积淀过程。

(四)科学理论凝聚力是精神凝聚力发展的最高层次。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打破了种种宗教的神话,使人们的精神活动也逐步走向科学化。如果说科学理论凝聚力诞生以前,各种精神凝聚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盲目、非理智、非自觉性的话,那么科学理论凝聚力则是人类群体发展到目前而出现的最自觉、最为科学的精神凝聚力。说其科学,主要表现在形成精神凝聚力的原因和精神凝聚力的作用方向是科学的。从前者说,首先是精神凝聚力之源是科学的,这同宗教迷信相区别。其次是一种理论要形成对人们的凝聚力,大体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接触、理解、凝聚、实践。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而是科学的。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排除盲目信仰或从众行为,但是绝大多数信仰者是在认定理论的正确科学性之后,被理论所凝聚的。这就同以往的各种宗教信仰凝聚力形成过程,构成了明显的差别。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一些理论失掉了指导实践的意义,因而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这也不能否定人们被科学理论所凝聚的自觉过程。因为这是由理论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从后者说,一

种理论如果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科学的,那它的功能也一定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当人们集合于科学理论的旗帜下,从事统一目标下的实践活动时,它将推动人类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凝聚力作用方向当然也是科学的选择。在科学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也会引起科学理论凝聚力的变化,有时还可能出现弱化现象。但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因而它的凝聚力也将不断地强大起来。

二、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与巩固

精神凝聚力作为人类群体共有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现象,有着大致相同的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认识选择阶段。一个群体要形成自己的精神凝聚力,前提是选择一个精神凝聚力之源。这个源可能是前人或先人留传下来的、也可以是本身的实践结果,但不管怎样,总是一个群体在选择了一个精神凝聚力之源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凝聚力。我们这里强调选择性,原因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群体精神凝聚力之源的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就需要进行选择。而选择的依据就是群体的精神需要。也就是说,群体的精神生活需要往往也就是这个精神凝聚力之源。

其次是群体认同阶段。某一种精神因素要成为某个群体的精神凝聚力之源,就必须经过群体成员的认同。群体精神凝聚力是一种群体共有的精神聚合现象,那么只有精神凝聚力之源被群体所有成员所认同,才能对群体所有成员发挥凝聚作用。认同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调整和思想整合过程。它往往有多种形式,有权威指定认同;传统习惯认同;利益驱动认同;分析比较认同;实践检验认同等等。无论何种认同形式,都存在一个时间持续过程。

其三是群体精神化阶段。某种精神因素被确定为精神凝聚力之源后,群体还有一个群体精神化阶段。群体精神化是指把原有的或客观存在的与本群体并不相干或没有直接联系的精神,改造和创新为一个属于自己群体的精神。尽管宗教信仰是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

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神。同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也有许多,但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把党员和人民凝聚起来,还必须创造出符合本国、本党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真正把中国人民凝聚起来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精神凝聚力之源群体精神化的必然性就在于,只有精神凝聚力之源同群体的利益、前途和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发挥凝聚群体成员的作用。

最后是所凝聚的对象内化阶段。精神凝聚力能不能形成,最终还要看精神凝聚力之源对所凝聚的对象的思想、意志能否发挥凝聚作用。而能否发挥凝聚作用的关键,又取决于凝聚的对象对精神凝聚力之源的内化程度。内化的程度越高,表明对凝聚源的认识和理解越深,所产生的信仰和虔诚程度越高,进而被凝聚源所凝聚而形成的向心力越强。否则,就会相反。没有被凝聚对象所内化的凝聚力之源,无论多么权威、伟大、公正、科学,都不可能产生凝聚力。

以上是精神凝聚力形成的四个阶段,当然这四个阶段在时间上不是平均的,在内容上也不是绝对的,但就产生过程来讲,又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还往往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人员文化素质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因此离开不同群体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不同条件来谈上述四个阶段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群体能否形成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是事关这个群体生死存亡的问题,而如何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精神凝聚力,也具有同等重要性。

三、精神凝聚力的社会功能

精神凝聚力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第一,社会稳定器功能。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是由多方面构成的,但精神凝聚力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但如果没

有人民思想的统一和共同的理想、价值观、人生观所形成的精神凝聚力,一个国家也很难保持稳定性。一旦一个国家或群体有了很强的精神凝聚力,也就意味着理想、价值观、人生观的基本趋同,这样的精神凝聚力条件下,经济越发展,人民越是富裕,人们的思想就会越稳定。

第二,社会力量的整合功能。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分散存在的。要把分散的社会力量集合起来,朝着统一的目标而奋斗,就需要精神凝聚力来完成。在社会力量的集合功能方面我们不否认物质利益的驱动作用,因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但是,精神凝聚力有集合社会力量功能上的独特作用。这是因为不同的社会力量是由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素质的人构成或支配的,而人的行为方向又是受其理想、人生观、价值观所支配的。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把人们的理想、人生观、价值观统一起来,就会使受理想、人生观、价值观所支配的人们出现趋同行为。这样,当一个国家、民族、政党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不同的社会力量就会自觉地为实现统一的目标而奋斗。

第三,社会主文化的巩固与维护功能。主文化是反映一个社会的本质和主流的文化,又是人民群众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自己的繁荣和稳定,就必须建构自己的主文化。一般说来,主文化所反映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也是构成社会精神凝聚力的思想基础。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持的功能。这样,当社会的主文化遭到破坏和受到威胁时,在精神凝聚力的作用下,整个社会就会对同主文化所对立的文化进行反击、批判和抵制。这实际上是两种精神凝聚力量的较量,较量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当与主文化相对立的文化的精神凝聚力量大于主文化的精神凝聚力量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同统治阶级更替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第四,对社会的自我完善功能。在精神

凝聚力很强的社会群体中,个体的集体主义意识也是很强烈的。个体在这种高精神凝聚力条件下产生的集体主义意识,往往会产生两种自觉行为,一种是按着精神凝聚力所体现的价值观、人生观去完善社会体系,另一种是按着精神凝聚力所体现的价值观、人生观去完善自我。这两种完善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个体的价值观、人生观趋于一致。另外,精神凝聚力对社会的自我完善功能,还表现为群体在自强不息的同时,能借鉴学习他人的优势、长处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优势,这一点在精神凝聚力强的日本和韩国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第五,御外与强内的功能。古往今来,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侵略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武力入侵,另一种是精神文化的入侵,对于前者自然要靠发展,靠增强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来抵御。对于后者,只有靠强大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来抵御。精神文化的侵略,是通过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人心搞散,最终使群众由对国家或民族的向心力变成对国家或民族的离心力,进而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能够形成以爱国、爱民族、爱集体为核心内容的精神统一体,当敌对势力的敌对文化入侵时,不仅不会削弱民众的爱国、爱民族、爱集体之心,而且还会进一步强化对国家或民族的向心力。

(本文为河北省社科规划课题。)

①C·II·托尔斯托夫:《土库曼人的图腾文化残余和两合组织》,《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问题》1935年第9—10期,第26页。

②《美国文明中的宗教现象》1961年版,第51页。

③《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1996年版,第258页。

作者刘学谦,中共唐山市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063005)

责任编辑:罗 苹

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论思维掌握

□肖君和

我们曾经说过，“中华学是我们中国人建立的从宏观的、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认识自己国家民族，亦即研究、认识中华及其规律，并且与诸多学科研究，特别是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接轨的综合性学科”，这一学科的出现“是中华民族‘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自觉的某种理性反映”，^①因此，中华学是“张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大旗”^②的、致力于中华民族自觉的科学。然而，这样讲还不够。我们还有必要以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理论作指导，来开掘中华学的内涵。只有这样做，才能凸现中华学的学理性。

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借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而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③马克思的这番话告诉人们，人类总是用理论思维、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实践精神等四种方式掌握世界。这四种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各有其特点而互不相同。以马克思的这种人类掌握世界的理论作指导来考察中华学，人们就会发现，就其本质而言，中华学是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论思维掌握。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

第一，中华学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活

动。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都是对世界的掌握，中华学作为人类的一种认识活动，当然是对世界的一种掌握。

第二，中华学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掌握。由于中华民族只是人类的一部分，中华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中华学不是整个人类对整个世界的掌握，而是作为人类一部分的中华民族对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中华的掌握。又由于中华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要内涵的概念，中华自然可以视为中华民族的生活环境，中华文化可以视为中华民族的劳动产品，所以，中华民族对中华的掌握，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掌握，即中华民族的自我掌握。

第三，中华学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理论思维的掌握。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掌握可以有理论思维、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实践精神等方式。具体到中华学的问题上，由于中华学带着“学”字，是一门科学，所以，中华学是中华民族以理论思维为方式对自己的掌握，即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论思维掌握，而不是以艺术精神、宗教精神、实践精神为方式的掌握。

既然如此，中华学怎么代表中华民族实现对自己的理论思维？换言之，中华学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是什么样的掌握（或认识）中华的理论和方法？这要从“怎么掌握”和“掌握什么”这两个方面来看。

二

“怎么掌握”？要抓住四个环节。或者说，要注意四个方面。

（一）理论指导。要实现对中国民族自身的理论思维掌握，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

指导。中华民族及其生活环境(中华自然)、劳动产品(中华文化)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其间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只有运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符合客观实际。这一科学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从科学的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的,是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反映,以它作理论指导就能导致研究的成功,研究的符合实际,所以,它能够成为指导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普遍原理,能够成为科学的方法,能够成为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思想武器。

(二)精神引导。对于掌握者(研究者)来说,有没有科学理性精神的熏陶、影响、引导是很关紧要的事情。如果他受到了科学理性精神的熏陶、影响、引导,就会在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华民族及其生活环境、劳动产品的同时,产生科学理性自觉,进而用理论思维的方式去掌握它们。

何谓科学理性精神?“理性”指的是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或思维活动。“科学”指的是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概括,发现客观规律,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据此,科学理性精神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以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概括,努力发现客观规律,使之成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的精神。近代西方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理性精神的“内核是‘求真精神、批判精神、实证精神’,这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表现为指向未来、指向未知的价值取向”。④中华民族要实现对自身的理论思维掌握,就需要有这种科学理性精神的引导。

在这里有必要着重指出的是,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把伦理道德和“经世致用”紧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而匮乏科学理性精神。⑤因此,我们要强调科学理性精神对于研究中华学,掌握中华民族及其生活环境、劳动产品的重要性。

(三)认识角度。中华民族要实现对自身的理论思维掌握,除了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学理性精神的引导,还要有科学适

用的认识角度。这种既科学又适用的认识角度就是宏观的、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先说宏观的角度。美国人创立并且使之成为“显学”的美国学,便是从宏观的角度认识问题、研究问题的例子,因为美国学是“从宏观上研究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性学科”。⑥借鉴美国学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从宏观的角度认识、研究中华,实现对中华民族自身(以及生活环境、劳动产品)的理论思维掌握。通过宏观的角度来认识和掌握中华(或中华的某一方面),可以使中华民族儿女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形成宏观的、综合的、全面的认识,更好地“胸怀祖国”、“胸怀中华民族”、“胸怀伟大的中华”,为中华的振兴、发展而奋斗。

再说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总体与局部的统一,这就为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认识角度、研究角度,提供了存在的依据。由于作为研究者,他们所在的地区、所属的民族、团体等等,相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局部。因此,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认识、研究角度(如将某个省、某个地区联系在一起研究,将某个民族、某个人物与整个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研究,等等)有助于研究者从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地区、所属的民族出发,将所研究的局部、对象与整个中华联系起来,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沿着总体与局部相联系的路线,把握、掌握中华民族这个“总体”,达到对中华民族这个“大我”、“自我”进行掌握的目的。这么一来,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是最适合致力于中华民族自知自觉和中华民族自我掌握的学问——中华学采用的认识、研究角度。我国从80年代初期开始编写出版的大型丛书《当代中国》⑦就是按照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角度、路子进行编写的。

(四)研究方法。有了科学适用的认识、研究角度之后,还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中华民族要实现对自身的理论思维掌握是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可以用的。调查研究方法、科学比较研究方法、系统方法、理论联系实

际方法等等都可以用。然而,有两种方法需要提出来加以强调。

其一为主体性方法。所谓主体性研究方法就是充分发挥研究者作为认识主体的作用的方法。具体言之,每个研究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如从事的学科、具有的专长、已经拥有的资料等),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来进行中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例如,地理学家可以发挥他的专长,进行中华地理方面的研究,达到对中华民族地理环境的掌握。历史学家则可以发挥他的历史学研究专长,进行中华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从历史的角度掌握中华民族。主体性方法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任何人只要进行认识活动,他就是他的这种认识活动的必然主宰者”,^⑧既然是他的“认识活动的必然主宰者”,就能够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中华学研究,来掌握中华民族。

其二为综合性方法。所谓综合性研究方法就是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它们的长处来研究中华学问题的方法。综合性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第一,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样统一的巨系统(就像钱学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从不同侧面用不同方法对它进行研究;第二,中华学的综合性学科性质也要求具有不同学科专长的学者专家,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中华学研究工作。当今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各种科学、学问互相渗透,结合成各种边缘科学、集团科学,协同攻关,多出成果。作为对这种科学发展趋势的顺应,中华学研究将会更多地采用综合性方法。

三

“掌握什么”?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一)范围。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掌握应该掌握以下几个方面:(1)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的自身,包括生活在中华地域里的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56个民族,以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因为他们是“移居海外的中华民族”,^⑨从民族学的角度看问题,他们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成员。(2)中华自然。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环境,由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以及它们的内容、特性等等

构成。(3)中华文化。这是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儿女的劳动产品,其实质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写的“人”,与“中华自然”这个“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结晶、结果,表现为中华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表现为社会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4)中华。这是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中华自然、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结合体、统一体。对中华民族进行掌握时,也可以对以它为核心的中华进行总体的、整体的掌握。

(二)内容。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理论思维上的掌握,只能是掌握中华民族及其生活环境、劳动产品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理论思维掌握”的特点和中华学的科学性质所决定的。人们都知道,理论思维要掌握的就是“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⑩至于“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本质和规律。人们也知道,科学的使命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和概括,以发现它的本质和规律。中华学作为科学,当然得这样做。

(三)关键。要掌握到中华民族(以及生活环境、劳动产品等)的本质和规律,其关键是要掌握到它的真实情况。这是因为:第一,科学理性精神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求真。以科学理性精神为引导的对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掌握,能不以求真为关键?!第二,以往,人们对我们国家民族的研究,不时带有某种盲目性、片面性,甚至偏离我们国家民族的实际,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对于我们国家处于什么历史发展阶段的研究就曾经偏离过客观实际,做出过错误的判断,乃至出现过1958年“大跃进”之类的错误行动)。从吸取历史经验的角度看问题,也应该把关键放在“求真”和“掌握真实情况”上。

四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⑪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有了理论思维,就有可能登上科学的高峰。据此,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对自己进行理论思维掌握的目的,中华

学研究的目的是,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在对待自身的问题上,登上并且永远屹立在科学的高峰上。围绕着这一目的的实现,中华学至少有以下两种基本功能。

(1)激发中华民族儿女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每个民族成员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之所以能够树立,就是因为他“在认识本民族积累起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的过程中,看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久经磨砺而又一直保持着生机和活力,看到了在严峻的环境中,她艰苦奋斗以求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因而对她的前途和力量产生了积极的、肯定的评价,确信她的力量,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民族的尊严感”^⑫(重点为引者所加)。使中华民族成员“认识本民族积累起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正是中华民族对自己进行理论思维掌握的目的、任务,也是中华学研究的目的是、任务。这么一来,中华民族儿女通过对自己民族进行理论思维掌握,通过对中华学的研究、学习,而能激发自己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2)使中华民族儿女在对待自己国家民族的问题上具有稳固的科学理性态度。2000多年来,在“忠孝节义”、“三从四德”之类封建律令、观念的桎梏下,中华民族儿女在对待自己国家民族等问题上,很难具有科学理性精神、态度。新中国建立以来,也在对待自己国家民族的问题上,长时期地缺乏科学理性精神、态度。其表现主要是:相当一部分中华民族成员不能正确看待我们的国家民族,一会儿沾沾自喜,把我们中国说成是“世界革命中心”;一会儿又自轻自贱,把不同的外国捧得高高的(如50年代捧苏联,80年代开始又捧日本、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似乎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唯书唯上,激动盲从,忽“左”忽右,从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地跳来跳去,总是不能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正确地看待我们的国家民族。搞中华学研究,强调用科学理性精神作引导,以理性思维方式掌握中华民族及其生活环境、劳动产品,就能在中华民族儿女中形成

一种科学理性的氛围、气氛。可以预期,只要坚持以理性思维掌握我们国家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久而久之,中华民族儿女的科学理性态度就会成为稳固的科学理性态度。

在这里还要指出,上述两种基本功能还会派生出许多非基本的功能。例如,中华民族儿女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激发出来之后,就会产生增强爱国心的功能。又如,中华民族儿女中的决策者,一旦在对待自己国家民族的问题上有稳固的科学理性态度,又会产生促进科学决策的功能。

①肖君和:《中华学论纲》,《佛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又见《新华文摘》1997年第6期。

②肖君和:《关于创建“中华学”的若干问题》,《贵州民族报》1997年7月31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页。

④韩月香:《求解李约瑟难题》,《科技潮》1995年第12期。

⑤参见李世闻:《理性精神:李约瑟问题的钥匙》,《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但要说明的是,李世闻所说的“理性精神”实际上是科学理性精神。

⑥张光忠主编:《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2页。

⑦《当代中国》丛书系《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主持编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⑧叶知秋:《超越虚无,走向真实》,《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

⑨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86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5页。

⑫陈世松、周群华:《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2期。

作者肖君和,广东佛山科技学院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528000)

责任编辑:罗 苹

《丘逢甲研究—— 1984年至1996年专集》简评

□ 裘汉康

丘逢甲是杰出的爱国志士、卓越的教育家、著名的诗人。对于这样一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应该怎样实事求是地给予公正的评价,在内地学术界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也曾流传过一些对于丘逢甲的不实传闻。过去几十年对丘逢甲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资料分散,有关论著亦少。

开放改革十多年来,内地对于丘逢甲的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开始结出硕果。除对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比较重视(如花城出版社1994年出版《丘逢甲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和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先后整理刊行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抄》等)外,《丘逢甲传》和《丘逢甲评传》也相继在北京、广州出版发行。随着内地学术界对丘逢甲研究的日益重视,近12年来在海峡两岸还举行了三次学术研讨会(1984年12月丘逢甲诞辰120周年之际,内地学术界在广东梅州举行全国首次丘逢甲研讨会;1994年又在梅州市举行“丘逢甲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3月台湾逢甲大学在台中市举办“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吴宏聪、李鸿生主编的《丘逢甲研究——1984年至1996年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以下简称《专集》)就是从上述三次研讨会的论文中选辑而成。这本《专集》共收论文42篇,并附录丘逢甲年谱、墓志铭、行状等5篇重要史料。像这样内容丰富充实的论文集,在内地还是第一部。这本《专集》的价值不仅仅是第一次编辑出版了有关评论丘逢甲的文章,使读者对丘逢甲其人有了比较全面的了

解,而且其中大多数论文作者能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资料(包括丘逢甲本人的诗文作品、有关信函、电报原文,以及当时人对丘逢甲的记述文字等)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对丘逢甲抗日护台、拒倭守土的光辉业绩、爱国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与特点,作了具体的中肯的论述,在史料的选择、观念的转换和评价的尺度等方面均有所突破,从而澄清了一些过去曾经流传的有关丘逢甲的不实传闻,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评价,对其兴学育才的教育实践和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研究。具体来说,该书所收论文着重论述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详尽地评论了丘逢甲在抗日保台斗争中的表现。许多论文作者通过对当时丘逢甲的有关信件、奏疏及函电的研究,充分论证了丘逢甲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出,丘逢甲“拒倭守土”,表明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意志和台湾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决心。此后,他虽因敌众我寡,被迫内渡,但他仍时时不忘收复国土台湾,时刻怀念台湾。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他内渡后的诗文及行动中均有所表现。对于过去有人对他兵败内渡的问题颇有微词,甚至严加抨击,并由此而全盘否定丘逢甲在抗日保台斗争中的爱国思想与积极作用的观点,一些论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丘逢甲率领少量台湾义军是不可能打败入侵大军的。在无法扭转危局的情况下,丘逢甲转移到祖国内地,对此不应横加苛责。一些学者详细分析了丘逢甲内渡的历史条件及多种因素,认为:这

是他在做了应该做和能够做的许多事而终不能挽救败局之后不得不走的一步棋,而不是“怕死逃跑”,其中包含着采取另一途径、另一方式来继续保台、复台的积极动机。有些论文作者认为,应充分肯定丘逢甲领导的抗击日军侵占台湾的斗争,它是我国特别是台湾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丘逢甲在抗日保台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抹煞。

对于过去有人认为丘逢甲等在台湾倡导自主,成立“台湾民主国”是不可取的观点,一些论文作了很好的辨析。指出:持有上述论点的人,是把丘逢甲等当年成立“台湾民主国”与今天有人鼓吹“台湾独立”、分裂祖国的行径混为一谈。丘逢甲等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出于反对割让台湾,不甘臣服日本,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的,而不是要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是在“宰相有权能割地,百姓无力可回天”的条件下,在“台湾属倭,万民不服”的情况下,为表示“义不臣倭”,才“愿为岛国”的。但即使自主,丘逢甲仍表示“永戴圣清”。因此不应对此加以责难,更不应由此而否定丘逢甲。

其次,这本专集选入了多篇论述丘逢甲教育思想及兴学育才的论文,评析了丘逢甲内渡以后爱国思想的发展与贡献。不少论者都充分肯定丘逢甲回到广东以后,在思念台湾之余,竭力思索强国复台、雪耻复国之道,他认为“欲强国,必先兴起人才为先”,将兴办教育事业与国家强弱密切联系起来,在家乡大力兴办教育,尤其着重创办新式学堂,培育了不少人才。辛亥革命前后不少仁人志士都出自其门下,为广东的教育事业,也为当时革命党人的活动作出了贡献。有些学者还著文高度评价了丘逢甲在兴学育人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改革、创新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至于有人因丘逢甲认同当时维新派“变本之法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办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的主张,就认为丘逢甲的教育救国思想不值得赞扬,一些专家学者撰文对此作了辨析,指出:从本质上说,教育救国是改良的,但在当时却是一股时代潮流,而且他的教育思想的实质与在教育实践中的创新做法,是与维新派大相径

庭的,具有积极意义,是他爱国思想在不同条件下的另一种表现,并为同时代的人所认同、肯定,从而成为广东最有威望的教育家之一。他晚年从同情维新变法转向赞助和参加民主革命,可以说是他爱国思想发展的高峰。从他后来的思想和行动来看,丘逢甲晚年已从维新派转为革命派。论者对丘逢甲能顺应历史潮流,随着时代而前进,并为培育革命人才,掩护革命党人推翻清朝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有的论文认为:这正是作为爱国主义者丘逢甲的可贵之处和至今仍为人们怀念景仰的重要原因。

再次,这本专集收有十多篇详细具体地论述丘逢甲诗歌创作成就的论文。学者们对这位被梁启超推崇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著名诗人及其作品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据记载,丘逢甲平生创作了近万首诗歌,留存下来的有二千余首,其中不少诗抒发了对台湾被日军侵占的悲愤不平,以及光复故土、统一祖国的深沉热望。这些用血和泪铸成的作品,至今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以诗歌为武器,愤怒地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无情地鞭挞了昏庸卖国的清朝政府;在鞭挞抨击中外反动黑暗势力的同时,丘逢甲的诗歌还热情地歌颂了光明和进步,对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一些论文引用丘逢甲同辈诗人对他的高度评价,突出丘逢甲诗歌苍凉悲壮的真谛,并对丘诗的美学特征、艺术风格、诗歌理论等作了认真的探索和分析。学者们的论文一致认为:丘逢甲的诗歌创作是一份非常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很好地继承下来。

这本专集还收有几篇专门就丘逢甲在台湾任职、内渡时“挟款以去”等史实进行仔细核对核正的考证文章,以详尽确凿的史料加以证实辨析,澄清了一些过去流传的不实传闻。

作者裘汉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郭秀文

评彭立勋《美学的现代思考》

□程文超

彭立勋教授长期致力于美学和艺术学研究。新时期以来,他陆续出版了《美感心理研究》、《审美经验论》等富有创意的力作,颇得学术界好评。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美学的现代思考》,更全面地反映了他对当代美学研究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和独特见解。

该书论及审美理论、艺术理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外比较美学、西方现代美学、城市美学等方面的研究,显示了作者研究的广阔视野。其研究的侧重点在现代美学的两大中心问题——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新的开掘,对中外传统美学思想和西方当代美学作了新的阐发。作者从当代现实出发,紧密结合审美和艺术实践,对现代美学中提出的新问题作了可贵的探索,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在审美研究方面,该书是以马克思关于审美问题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基础的。作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出发分析人的审美活动的根源和本质,从而对西方传统的审美理论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理论进行了根本改造,建立了实践的审美论。这一理论表明:“通过生产实践所形成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是形成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基础,是人的审美活动的原发点。(《美学的现代思考》第128页,以下注页码同此书)”这为我们从哲学层面深入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对美学界争议颇多的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作者认为,它既不能脱离自然规律,也不能脱离人的要求,既不能无视客观法则,也不能忽视主体实践,而只能在这两方面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所谓“内在尺度”,就是自然规律和人的目的的统一。人在生产实践中改造对象世界,既要遵循客观规律即真,又要体现人的目的即善,也要实现美的理想和价值追求。所以,从人类社会实践来说,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人的认识活动、道德活动和审美活动在其历史的深层次上是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的。这和那种试图把审美和艺术活动孤立化、神秘化,使其脱离真和善的内容的片面观点,是根本不同的。

该书对审美问题研究的重点,在于探求审美意识活动与科学认识活动以及道德意识活动的区别,探求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的特点。作者认为,对这个问题不仅要从哲学层面上进行研究,还要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层面上进行研究。针对西方美学在美感研究中往往夸大其个别组成要素特性的片面观点,作者借助现代系统论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成果,提出了“审美心理的整体性”原则,强调要把握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的整体特性。该书提出,审美心理的整体特性不是由组成它的个别要素属性所分别决定的,也不是各个要素属性相加的总和。“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科学认识、道德意识的区别,主要不在于它们的心理构成因素的多寡,而在于各种构成因素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特殊结构方式。审美心理的特性是由各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的那种联系和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第35-36页)”据此,作者提出,审美意识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对审美心理的特殊结构方式的具体分析上。

以此为前提,作者分别对审美认识结构和审美情感结构作了具体入微的考察分析,并对审美中认识结构和情感结构的特殊联结方式作了深入的阐明,从而对美感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直觉性”、“表现性”、“愉悦性”等问题作了新的解释,对美感发生的内在心理机制作了新的探讨。作者不仅采用了西方传统美学的有益思想,而且较多地吸纳了中国古代审美思想中的精华和西方当代心理学美学中的新知识,并广泛吸收了现代科学的相关新成果,将它们熔为一炉,形成了揭示审美心理特殊规律和内在机制的新的话语系统。如在分析审美认识结构时,该书借鉴了康德对“审美观念”这一美学范畴的解释以及黑格尔对“敏感”这一心理功能的揭示,并根据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表象理论,提出了“形象观念”这一审美认识结构的核心范畴,论证了它在审美经验生成中的中介作用。在分析“形象观念”的特性时,作者又融会贯通了中国古代美学和西方美学中的有关论述,提出了“思与境偕”(理性与感性直接融合)、“可解不可解之会”(确定性与非确定性辩证统一)、“寓理于情”(理解与情感互相交融)作为其三大特点,从而厘定了它与科学的认识

形式、道德的认识形式的区别。在论述过程中,作者不仅结合着大量审美欣赏和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材料,而且也从现代控制论、信息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获取了理论支持,从而使我们对审美经验发生中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因素问题获得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科学的证明。这对于深入揭示审美经验发生的内在心理机制,无疑是一个重要贡献。

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把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研究工程来看待和处理。作者广泛考察了当代西方美学将审美研究和艺术研究结合起来的突出特点,认为把艺术哲学、批评哲学和审美理论三者都建立在审美经验基础之上的主张,代表了当代大多数美学家的观点。正如现象学美学家 R·英加登所指出,艺术作品与其创作者和观赏者的审美经验具有内在联系。要了解艺术作品究竟是什么,首先必须对审美经验是什么作出回答。把对艺术作品的一般研究和对审美经验(不管是在作者的创造经验的意义上还是在读者或观赏者的接受经验的意义上)的研究相互对立起来,从方法论上说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在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内在联系和统一中去寻求美学研究的新的出发点,这将更符合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特点。

基于这种认识,并结合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艺术的意识形态本性和审美本性的论述,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设要坚持意识形态论与审美论相统一的原则,既不能排斥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不能忽视文艺的审美本质和特点,并且要把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审美性质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使其意识形态性寓于审美性之中。据此,作者认为,文艺学的发展必须从对审美的深入研究入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意识形态理论过渡到对于文艺本质特征的研究,必须经过审美这个中介。(第 126 页)”书中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审美特殊性质作了多层次的分析,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多角度进行了阐述,认真清理了将两者任意割裂的各种片面观点。在深入研究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者主张用“审美意识形态论”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本质观。这一方面反映出文艺的社会本质和审美本质是互相依存、辩证统一的,有利于突出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独特性,突出文艺审美的特殊本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表明文艺作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集中表现形式,在审美意识中处于高级层次,是审美意识的最集中表现,因而在审美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

用。这样阐释文艺的本质,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内在逻辑和理论特色,也符合文艺史以及创作和欣赏的实际。

为了深入研究和揭示艺术的审美本质和特性,作者认为必须遵照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的研究方式,即把哲学的研究和经验的研究结合起来,一方面深入研究艺术审美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一方面深入揭示创作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艺术形式的审美特征,使艺术哲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形态学三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为此,该书对古今中外美学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和理论生命力的范畴、命题和学说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和研究。其中,对刘勰的情志说、黑格尔的艺术美论、鲁道夫·阿恩海姆的审美知觉说、苏珊·朗格的符号学艺术论等,评述尤为周详,从而为深入揭示艺术的审美特性提供了多方面、多角度的参照。

长期以来,在艺术本质特征的探讨中,一直有所谓“再现说”与“表现说”的分野,争论的焦点是艺术再现客观现实与表现主观情感的关系问题。作者从审美意识的角度,对艺术中认识和情感的关系作了详细考察和论证,认为把艺术仅仅看作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或者把艺术仅仅定义为自我情感的表现,都是违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规律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反映和掌握方式,正是以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解、评价与认识、表现与再现的辩证统一为其显著特点的。作者的立论不仅采取了古今中外大量成功的创作经验材料作为根据,而且运用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各种美学思想资料作为佐证。例如,作者发掘并阐发了中国古代美学中“情志”、“情理”这一美学范畴,并将其与西方传统美学中的“情致”说、“诗情观念”说,以及当代西方美学中的“情感的逻辑表现”说等,加以比较,并使其与当代审美和艺术实践相结合,赋予新的理解和意义,从而演化了对艺术审美规律和特点的研究。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和发扬中外古今美学思想中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融汇创新,对现时代美学发展中的新问题作出新的回答,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美学,是我们当前美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该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了十分有益的尝试。由于该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难度较大,而且至今也还有不同看法,因此,如何通过切磋争鸣,以求得进一步认识,是有待美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

作者程文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陶原珂